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经济学•管理学

- 5 丁汉鹏 毛蕴诗：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 9 曾国安：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 14 刘 昕：中小企业的发展障碍及其对策研究
- 18 李新春 胡晓红：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问题研究

•学苑聚焦•

- 24 谭湛明：探寻粤澳合作关系的新突破
——“新时期粤（珠）澳合作关系”研讨会综述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

- 28 曹绪飞：知识的价值与价值转换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透视知识经济
- 32 左久华：知识价值论
——知识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哲学•逻辑学•

- 39 张书琛：现代西方一般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
- 45 杜志清：费尔巴哈论人的社会性
- 49 程仲棠：引入负名词的三段论系统

录

·历史学·

- 53 李 玉 梅：钱钟书史学观念试析
61 赵立人：客观评价陈炯明
——兼评《陈炯明集》的出版

·岭南文化研究·

- 64 陈乃良：苍梧郡、广信县设治沿革考
69 孙关龙：岭南，中国和世界海洋农业文化的源地

·文学·语言学·

- 74 彭玉平：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座谈会综述
79 左 政：李大钊在《晨钟》报本事考信述要
85 柯自然等：香港与内地社会媒体语用变异分析

·书评·

- 92 张 井：“新路”是新的思路
——读曾牧野《新路》有感
94 柯志军：经学为本 文体为干
——读邓国光先生论文集《文原》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3, 1999

- On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Ding Hanpeng and Mao Yunshi (5)
-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about the Governmental Adjustment in the Market Economy Zeng Guo-an (9)
- An Approach to Our Countermeasures over the Ob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Liu Xi (14)
- About the Problems Appear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Li Xinchun and Hu Xiaohong (18)
- A Summary of the View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Cooper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during the New Period' Tan Zhanming (24)
- Knowledge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Cao Xufei (28)
- On Knowledge Value: the Kernel Theory of Knowledge Economics Wang Jiuhua (32)
-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Value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Zhang Shushen (39)
- L. D. Feurbach's (1804 – 1872) Review on Human Sociality Du Zhiqing (45)
- On a Syllogist System with Negative Nouns Cheng Zhongtang (49)
- A Trial Analysis of Mr. Qian Zhongshu's View of Historiography Li Yumei (53)
- An Objective Comment on Mr. Chen Jiongming Zhao Liren (61)
- The Evolusion of 'Cang Wu' Prefecture and Guangxin County in Ancient China Chen Nailiang (64)
-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s a Source of the Chinese and World's Culture of Maritime Agriculture Sun Guanlong (69)
- Main Points from a Forum of Literary Doctors in Guangdong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Peng Yuping (74)
- Mr. Li Dazhao's (1889 – 1927) Anecdotes During His Work for 'Morning Bell' News Paper Wang Zheng (79)
- An Analysis on the Pragmatic Variances in the Social Media i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He Ziran and so on (85)
- New Ideas in Mr. Zeng Muye's Work 'New Road' Zhang Jing (92)
-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as Foundation and Literary Forms as Stem in Mr. Deng Guoguang's Paper Collection 'Wen Yuan' He Zhijun (94)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 丁汉鹏 毛蕴诗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05-04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自 1979 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的经济迅速增长,其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此外,对外开放与社会进步(包括技术与信息方面的变化)也在不断取得进展。这些都影响到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的变化。农民生活正在实现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由单调的生活方式向较为丰富多样的方向转变。在这种过程中会体现出某些趋势性的特征。本文试图以经济理论为指导,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上述消费总量及其构成变动,并分析其主要原因。

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都有“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统计数据。这些分地区(30 个)的资料构成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的断面数据。其中生活消费支出又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为了提出一个较为简明的消费结构研究框架,考虑到现阶段农村居民在家

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数额较小,我们将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合并为一项,并称之为其他类支出。而每人纯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即为收入结余。这样有利于研究农村居民家庭作为消费总量的人均消费支出,及其中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其他类支出、收入结余之间的联系,从而研究其结构性的变化。

上述结构关系用等式表示为:

$$\text{(农民) 人均纯收入} = \text{人均消费支出} + \text{人均收入结余}$$
$$\text{人均消费支出} = \text{人均食品类支出} + \text{人均衣着类支出} + \text{人均居住类支出} + \text{人均其他类支出}。$$

二、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经济理论认为可支配收入或预期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尽管经济理论也认为其他因素如价格也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但一般而言,价格具有短期的效果,此外价格变量更多的是在单个产品

* 本项目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需求方面起作用。在西方的一些研究中,例如休茨(Suits, 1962)的美国经济模型,在解释汽车、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方面并未采用价格作为解释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从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农村收入水平是从很低的起点向上增长的,并且目前的水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显低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仍远远落后于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其总体消费远未饱和,尚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未能解决。

根据经济理论和一些经验研究成果,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收入的增长,温饱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收入会流向使生活内容丰富的文化娱乐方面、住房建设方面等。就此而言,收入是促进消费结构变动的最重要因素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再进一步分析,虽然诸如社会进步、观念变化、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会对消费行为,进而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同时也受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收入水平较为低下,许多消费远未满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收入水平作为决定农村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可以被假定为是唯一一起决定作用的解释变量。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仅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人均消费支出及其食品、衣着、居住和其它类支出,收入结余的解释变量。

三、研究方法 with 模型格式

根据上文的基本假设,可以提出以收入为唯一解释变量的消费函数格式,并采用线性关系与变量取对数后的线性关系两种模型格式对农村收入——支出

(与支出构成)——收入结余关系进行研究。

采用经济计量方法中的线性关系建立人均纯收入与各类支出和收入结余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Fam_j = \alpha + \beta_j FamI \quad (1)$$

其中, Fam_j 依次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其他类支出和收入结余, $FamI$ 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按(1)式可以求出有关消费或收入结余在收入中所占份额,即 β_j 。

采用对(1)式变量取对数后的线性关系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text{Log}Fam_j = A + \epsilon_j \text{Log}FamI \quad (2)$$

按(2)式,则 ϵ_j 就是相应变量 Fam_j 的收入弹性,即人均纯收入每变动1%,相应支出或收入结余的变动百分率。

作者(1990年)曾利用1986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就上述两种模型进行拟合,讨论了当年的收入——支出(结构)——收入结余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采用1983年至1995年历年的地区断面数据进行分析,用1996年数据进行事后预测检验,通过时序分析与断面数据分析的结合,以更好地考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趋势及其决定因素。

四、分析与结论

根据本文的基本假设与两个模型格式,我们对1983年至1995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计算,限于篇幅,在此仅将1983年、1986年、1990年和1995年的结果列示如下表1。

从四个时点的拟合结果看,1990年、1995年的拟合优度 R^2 值比1983年与1986年的 R^2 值有明显改善,更为接近于1,特别是收入、人均结余的拟

合优度及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均有提高。

另外，为了检验模型的可靠性并对 1996 年的消费支出变动作事后预测，在下表中列出了按 1996 年人均纯收入 1926 元的实际值代入 1995 年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列出的 1996 年模拟值，以及 1996 年各项消费支出及收入结余的实际值。从事后预测结果看，除人均住房支出外，相对误差均在 2% 以下。

1996 年	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食品支出	人均衣着支出	人均住房支出	人均其他支出	人均收入结余
实际	1572	885.5	113.8	219.1	353.6	353.9
模拟预测	1558	868.9	112.9	238.8	345.7	368.0

1983 年至 1995 年按模型 (1) 和 (2) 的上述回归结果分别绘出曲线图 1 和图 2，其中 1984 年和 1988 年的数据是用其前后两年的数据平均得出的。

图 1. 模型 (1) 一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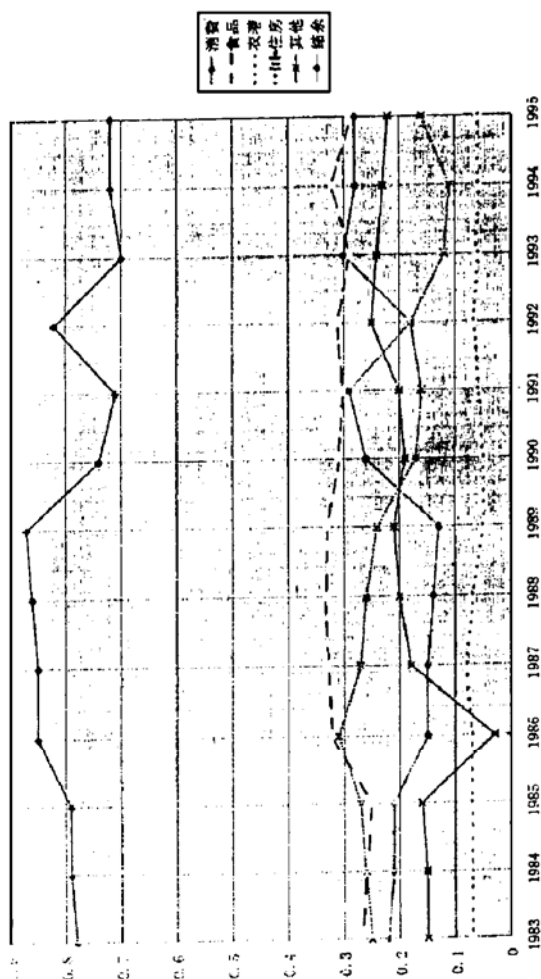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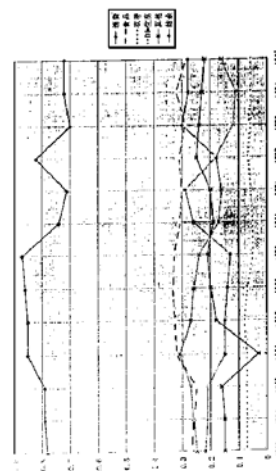


图 2. 模型 (2) 一变量取对数后回归分析结果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分析与结论。

1、从回归分析曲线图 1 看，在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类的支出占整体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大体上围绕 30% 波动，其在 80 年代后半期有所上升，之后又有所下降，但基本上处于第一位。这表明虽然农村居民每人纯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民以食为天”的消费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从图 1 可看出，食品支出比例随消费在收入中的支出比例同步波动。从收入弹性来看，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食品支出的弹性与消费支出的弹性自 1990 年以来均呈明显下降趋势，食品支出的弹性比居住类、其他类支出和收入结余的弹性都低，表明纯收入在食品类支出流向方面呈非主流趋势。

2、衣着类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也较为平稳且始终处于最小的支出比例，大体保持在 0.6 左右。从图 2 可以看出，其收入弹性非常平缓，变化不大，也大体保持在 0.6 左右，说明农村居民在衣着消费方面较为平稳。

3、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住房类支出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其他类支出则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从量上看，住房支出下降的速度远快于其他类支出

增长的速度。弹性分析结果也表明，住房类支出的弹性呈最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983年的大于2的弹性值，下降到1993年、1995年小于1的水平。农民纯收入中在其他类支出的比重逐年有显著的增长，其弹性系数从1988年开始就超过1，即其他类支出的增长率超过收入的增长率。这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流向变动向小康方向转化，生活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

表：线性回归结果 取对数后的回归分析结果

支出	解释变量系数		R ²	D.W	解释变量系数		R ²	D.W
	与 t 值				与 t 值			
	人均 纯收入	C			人均 纯收入	C		
1983年人均消费支出	0.7839 (40.2)	-	0.76	1.12	0.9585 (245.1)	-	0.77	1.09
人均食品支出	0.2698 (5.9)	61.6 (8.9)	0.55	1.18	0.5912 (2.53)	1.59 (2.53)	0.53	1.24
人均衣着支出	0.0687 (5.6)	7.14 (-1.7)	0.53	1.02	0.5830 (93.05)	-	0.48	1.02
人均住房支出	0.2526 (6.2)	-52.1 (-3.7)	0.58	1.45	2.1637 (5.87)	-9.30 (-4.37)	0.57	0.90
人均其他支出	0.1456 (49.6)	-	0.82	1.6	0.9561 (12.10)	-1.67 (-3.66)	0.85	1.72
人均收入结余	0.2161 (11.1)	-	0.31	1.12	0.7128 (49.43)	-	0.27	0.89
1986年人均消费支出	0.8514 (65.23)	-	0.94	1.79	0.9727 (442.2)	-	0.94	1.88
人均食品支出	0.3196 (11.3)	66.5 (5.0)	0.82	1.17	0.68 (9.8)	1.19 (2.86)	0.78	1.18
人均衣着支出	0.0657 (7.48)	7.78 (4.88)	0.67	0.99	0.5891 (86.3)	-	0.5	0.93
人均住房支出	0.3108 (12.4)	-81.02 (-6.89)	0.85	1.77	2.091 (8.28)	-8.88 (-5.8)	0.72	1.96
人均其他支出	0.0252 (21.85)	-	0.53	1.51	0.96 (4.1)	-3.47 (-2.44)	0.38	1.75
人均收入结余	0.1486 (11.38)	-	0.26	1.79	0.6731 (49.24)	-	0.27	1.75
1990年人均消费支出	0.7367 (23.46)	60.92 (2.62)	0.95	1.17	0.9713 (442.32)	-	0.94	1.33
人均食品支出	0.3133 (11.17)	95.91 (4.63)	0.82	1.61	0.8803 (222.50)	-	0.76	1.38
人均衣着支出	0.0529 (6.84)	13.89 (2.43)	0.63	1.02	0.5966 (90.57)	-	0.51	0.87

人均住房支出	0.1737 (11.25)	-46.25 (-4.06)	0.82	1.12	1.5875 (8.85)	-6.18 (-5.32)	0.73	2.05
人均其他支出	0.1936 (80.47)	-	0.82	2.02	1.1429 (5.20)	-2.63 (-1.84)	0.49	2.14
人均收入结余	0.2633 (8.38)	-60.92 (-2.63)	0.72	11.17	1.3906 (5.11)	-4.42 (-2.51)	0.48	1.23
1995年人均消费支出	0.7205 (22.07)	170.32 (2.83)	0.95	1.15	0.8405 (16.71)	0.99 (2.68)	0.91	1.53
人均食品支出	0.2917 (14.67)	307.04 (8.35)	0.88	1.46	0.6435 (11.85)	1.92 (4.80)	0.83	1.58
人均衣着支出	0.0586 (21.95)	-	0.69	1.15	0.6156 (85.89)	-	0.53	1.16
人均住房支出	0.1563 (10.20)	-71.15 (-2.51)	0.79	1.19	1.1688 (7.72)	-3.49 (-3.14)	0.68	2.18
人均其他支出	0.2202 (17.56)	-78.40 (-3.39)	0.92	2.1	1.1817 (11.62)	-3.14 (-4.20)	0.83	2.30
人均收入结余	0.2795 (8.59)	-170.32 (-2.83)	0.72	1.15	1.9346 (5.49)	-8.90 (-3.4)	0.56	2.42

4、收入结余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自90年代以来呈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比80年代后半期增加了12个百分点以上；收入结余弹性自1989年以来开始大于1，并在此后年度均保持迅速上升的趋势，到1995年其弹性值已经接近2。弹性分析说明收入结余增长最快，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流向。与此相关，1983—1990年生活消费支出弹性大体保持在0.95左右，并较为平稳，但从1991年起该弹性值急剧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1992年又有所上升）并基本上保持这一格局。

因此，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及收入结余可得出以下基本判断：9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收入结余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收入增长部分的流向排序80年代初依次为住房、其他、收入结余、食品和衣着，90年代后则是收入结余、其他、住房、食品和衣着。用1995年的线性回归模型的事后预测结果也支持了上述分析结论。

本文进一步的研究结论为：尽管中

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 曾国安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09-05

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近年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引起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界不少学者的关注与介入。但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政府调控经济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

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调控，但其中不少人并不清楚政府调控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不是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出发来探寻政府调控经济的理由，而是从意识形态、政治控制、社会伦理等这样一些外在的因素来提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

调控。按照这种观点，政府调控经济是由外在因素所规定的，是外在因素所提出来的要求。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并不是外生的，不能从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来探寻政府调控的理由，那样只会对政府的经济职能作出不正确的界定，就会造成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边界任意扩大或缩小，就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作出科学的界定，从而也就无法对政府履行经济职能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是说无法分清政府有效与政府失效。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或强加的，不是由意识形态等外在因

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用收入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所建立的模型很好地模拟了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是由收入的变动所决定的。这可能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其总体消费远未饱和有关。●

数据来源：本文所用的 1983—1996 年的有关数据，引自 1984 年至 1997 年

的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参考文献：

马洪主编，《中国市场发展报告》，中国展望出版社，1997 年。

毛蕴诗，《中国宏观经济活动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

Suits, US Econometric Model, Readings in Managerial Economics, Prentice Hall, 1977。

责任编辑：韦前 谭湛明

素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利己经济、交换经济、竞争经济、分工经济、合约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这些性质笔者已在一篇论文中做过论证），①市场经济的这些性质使其具有自动地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相适应，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优越性，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市场经济本身就能够导致这些经济绩效。这正是我们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原因所在。但也要看到，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是双重的：即不仅导致上述各方面优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方面缺陷，也就是说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缺陷的存在使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而弥补市场缺陷不能靠市场与政府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尽管第三种力量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它只能作为政府力量的一种补充，因为它不具有政府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威性，也不具有政府所能利用的各种调控手段。因此要弥补市场缺陷必须要依靠政府的调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政府调控是不可分割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发挥必须有政府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只能是既有市场，又有政府调控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二、政府调控经济的任务是弥补市场缺陷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负有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任务，但不少人对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并不清楚，往往是就事论事，或者

凭主观臆断来认定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理论研究的这种状态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换政府经济职能是不利的。界定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给政府的调控“定位”，讲白点就是政府应该干什么。

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早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原则性的说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而是主张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应由市场解决，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于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才需要，也应该由政府来解决，也就是说政府的“角色”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代国家干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凯恩斯也不是主张政府代替市场。他在名为《放任主义的经验》一文中写道：“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或者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有人去做的事。”②这就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差别不在于对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的主张不同，它们都不主张政府替代市场，而只是对政府的具体的经济职能的认识的不同。

笔者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不是替代市场，并不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家秉持这种主张，而是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政府替代市场，是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这样，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其结果必然是市场优越性的消弭。对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来说，如果借口政

府调控经济的必要，而采行政府替代市场的政策，其结果将是一方面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改革所期望的市场的优越性，从而不能实现改革的初衷。因此，政府的调控只能在不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下进行，政府调控经济的任务只能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即限定在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具体应该履行哪些经济职能呢？这需要弄清市场缺陷，即市场不能有效地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市场不能有效地解决垄断、经济的外在性问题；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充分供应；不能有效地解决由信息的不完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不能保证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宏观经济的稳定；不能有效地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不能形成和维持公平交易与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不能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制度；也没有能力消除“非市场品”和“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形成和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在迅速纠正重大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也往往能力不足，^③因此，政府应该在、也只能在这些方面采取调控措施。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条件下，政府还应促进市场的成长。

政府调控经济，就其性质来讲，是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发挥创造条件，是要补充、配合、帮助和支持市场，从其职能来看，可归结为微观规制、宏观调节、制度维持和支持市场这四个方面。政府在履行这些经济职能时，一方面不能采取改变市场经济性质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即主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市场力量，从而实现在不损害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机制的条件下，弥补市场缺陷。

三、政府调控经济不是向计划经济

复归

有人担心政府调控经济会导致向计划经济的复归。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 90 年代初就有人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主张回归到旧的计划经济。必须指出，主张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和主张向计划经济复归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并不是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并不是实行计划经济。

能否向计划经济复归呢？这要看实行计划经济的后果。过去的历史证明，实行计划经济必然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国民经济下降和国民福利下降。计划经济运行的绩效已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得到有力的证明。因此，绝不能再回到旧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 20 年成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从国民福利的提高，还是从中国国力的增长，都可说明这一点。

国外那些长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无一不对经济进行调控，但这种调控并没有导致计划经济。为此关键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对经济进行调控，而在于应该明确地界定和限定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一方面要使政府从其已越出应处的调控边界之外的领域退出来，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政府要从沿袭过去的计划经济中的，但不属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领域中退出来；另一方面对政府新采取的调控经济政策必须限定在政府应处的调控边界之内，而不能越出边界，否则，就会使计划经济渐渐地复生。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存在的，因为存在着政府的一些部门借加强调控之名，扩展权力到政府调控边界以外的领域。所以必须防止政府向其应处的调控边界以外的领域扩张。世界银行 1991

年度发展报告曾明确指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效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④为了建立和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从而获得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限定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而要使这种限定成为现实，靠政府行政部门的自我限定或自我约束是做不到的，必须依靠法律的保障，因为对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或行为能够进行约束的只有法律的力量。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来看，凡政府滥用权力的，都在于缺乏法治，而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府政策或行为的，都在于有强有力的法治。德国二战后之所以能长期实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法律限定政府调控经济的权力范围。因此，中国要建立和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必须现在就转向法律的途径，通过法律来规定和限定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一方面保证政府必须履行其应负的调控经济的职能，另一方面，保证政府的调控不越出其应处的边界，这样才可在使政府对经济进行应有的调控的条件下，不出现向计划经济复归，并按预期目标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

四、政府调控的必要性不等于政府调控的有效性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存在缺陷，但在对待政府调控的认识上，除以市场缺陷作为主张政府全面管制经济的观点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政府进行调控，政府就能够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政府调控采取一种十分简单化的态度，即不考虑政府能力、调控方式、调控力度等是否合适。另一种观点则是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或者是将政府的调控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依据主要建立

在存在政府失效 (government failure) 的思想基础上。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归结到一点，它们都将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同政府调控经济的有效性等同起来。

虽然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但它与政府调控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完全是两回事。政府调控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即要使政府有效，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 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处在其应处边界之内；(2) 政府具有充分的调控能力；(3) 政府采用的调控方式恰当；(4) 政府调控的力度恰当；(5) 政府机构本身能协调地运行。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必然会出现政府失效。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政府的调控，就能解决一切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政府失效，则应从上述方面寻找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改进政府调控。

同时，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存在政府失效就否定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因为：(1) 虽然存在着政府失效，但也存在着政府有效，而且政府有效是大量存在的。不能因为政府失效的存在，而漠视政府有效。(2) 有一些政府失效导源于政府机构本身未能协调运行，这要求对政府组织机构进行重新安排或改进管理，从而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小政府失效，而不是否定政府调控经济本身。(3) 有一些政府失效导源于政府调控力度不合理，或者是导源于政府调控方式不合理，由此引起的政府失效说明把握好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选择正确的调控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不能因为存在由这两方面原因引起的政府失效而否定政府调控经济本身。(4) 有一些政府失效导源于政府能力不足，对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失效一方面说明政府不能做其所没有

能力做的事,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政府能力的提高,政府有效会相应增加,政府有能力做,也需要政府做的,政府就应该去做。5)有一些政府失效导源于政府调控范围过宽,也就是超过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应处边界,这种政府失效说明政府应该从超出边界以外的领域退出,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政府的全部调控职能。6)尽管政府实行调控经济的政策有些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情况会更坏。例如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够使其迅速赶超经济发达地区,但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落后地区的经济可能会更落后。再如,政府不一定能保证公共物品的充分供应,但若无政府生产或采取鼓励措施,公共物品的供应会更加不足。所以不能一看到存在政府失效,就全盘否定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政府应该调控经济并不意味着调控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任何国家都须不断改进政府调控,以不断增强政府调控的有效性。同时笔者也认为,市场能力和政府能力都存在局限性,两者的有机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市场能力和政府能力都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两者能力的增强可以进一步减少存在的经济问题,但不能要求解决所有的问题。

五、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应是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选择性配合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以直接调控为主,市场经济应以间接调控为主。笼统地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政府在所有经济领域都主要采取直接调控方式,那就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但严格地说,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政府调控应以间接调控为主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领域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许多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适用的调控方式是存在差别的。有些领域政府应该完全采取直接的调控方式,如对“非市场品”与“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对那些会产生外部经济负效应的经济活动,政府就必须采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完全禁绝的直接调控方式;有些领域则应该完全采取间接调控方式,如对总需求的调节就只应采取间接调控方式;而有些领域则应混合采取两种调控方式,如准公共物品的供应,就应采取两种调控方式。其实大多数领域都应同时采用两种调控方式。政府选择何种调控方式取决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时效,不同调控方式的效力、成本。在目标和时效一定的条件下,应选择调控效力大、调控成本低的调控方式。总之,政府在进行调控时,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调控方式进行比较、选择,适宜直接调控的就采用直接调控,适宜间接调控的就采用间接调控,适宜进行搭配的则应将两种调控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①曾国安:《论市场经济的性质》,载《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凯恩斯:《放任主义的终结》,载《凯恩斯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291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

③详见曾国安、宋奇成、郁文达:《论市场缺陷的评价标准与市场缺陷》,载《经济评论》,1998年(5)。

④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韦前湛明

中小企业的发展障碍及其对策研究

□ 刘 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讲师 北京 100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14-04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就业、增长与竞争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各国政府所追求的共同目标。而中小企业则因其对实现上述目标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具有的深厚潜力而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障碍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无疑有着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一、中小企业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障碍

中小企业通常是指雇员人数在 500 人以下的企业, 与较大的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在各国社会经济和市场竞争中都面临着类似的约束或障碍, 这些障碍或约束有的来自中小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有的则是来自中小企业自身, 概括地说, 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经济制度及行政管理环境约束。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法律约束的需要, 很自然地会形成一系列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法律制度以及经济、社会管理制度, 比如企业登记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制度、职业安全与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环境保护制度

等等。尽管这些制度及其相关规定本身并不是仅仅针对中小企业的, 但是为了遵守和执行这些法律制度或规定, 中小企业所付出的代价却往往比大企业要多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 通常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处理这些事务, 同时又囿于自身物力资源的约束而无力求得外部专业服务机构的帮助。

比如, 根据德国的一项研究, 雇员人数不足 9 人的小企业为了满足各种行政管理的需要, 平均每年要在每个员工身上花去 62 个小时, 而较大的企业只需要 5.5 个小时。此外, 小企业在每个雇员身上所花费的相对行政管理费用比例要比大企业高 20 倍以上。另据一项关于英国的研究估计, 最小的那些企业要把自己营业额的 2% 用于支付增值税, 而对于较大的企业来说, 这一比率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EU, 1995)。

2、资本与信贷约束。

现代企业的存亡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所处的金融环境, 而资本与信贷条件对于中小企业所产生的约束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在当前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为世人所瞩目, 然而因为这一类企业不仅在初期的资本投入较多, 而且市场前景更为不确定,

从而投资的风险较高,所以资本所有者或私人投资者往往不大愿意轻易投资,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在创办和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和信贷约束非常高。显然,仅仅依靠资本和信贷市场的自发作用往往无法解决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在创立以及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资本约束的。

3、管理质量约束。

中小企业在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没有能力实现管理职能的专门化,管理工作不少是由企业所有者自己兼任的,或者是把各种管理职能尽可能地加以简化合并后集中于少数几个人手中。由于管理者缺乏专门的职业训练,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大多比较低,在管理方式上明显地表现出集权和简单化的特点,其结果往往是造成企业内的劳资关系紧张、人员流动频繁,这样,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就不可能不受到损害。在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以及经营比较顺利的时候,这种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危害性往往还比较容易被隐藏,而一旦企业面临业务迅速扩张、组织结构必须重组的时候,或者企业的经营落入困境的时候,管理技能的缺乏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马上就会非常突出地显现出来。事实上,管理能力不足恰恰是大约 50% 左右的中小企业在成立之后的 3—5 年之内就经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感到自身管理能力薄弱或无法把握组织变革的时候,中小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借助外部专家的管理咨询服务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由于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原因,同较大一些的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接受这种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机会要少得多。

4、技术水平约束。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的途径通常有两条,一是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究开发,二是通过技术市场来购买现成的研究成果。然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小企业都受到一定的约束。

首先,相当一批中小企业根本就不是依

靠技术因素起步的,因此在以后的生产和经营中也因惯性的作用而缺乏对技术的关注,不愿意投入资金和人员去进行研究工作,结果导致企业的技术含量一直得不到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慢。相对来说,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机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中小企业通常更为强烈,然而一方面,这一类企业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打出有市场销路的新产品并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企业,以便占领市场和积累资本,所以企业的研究开发往往着眼于短期项目;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在初创时期甚至在发展时期所能够投入的研究开发资金毕竟有限,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素质和知识结构也很难做到优化,再加上它们很难像大企业那样轻易地找到可以进行联合研究开发的合作伙伴或可以依靠的研究开发网络,因此它们的研究开发工作通常都比较艰难。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对于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无疑都是不利的。

其次,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购买现成的技术专利无疑是一条提高自身技术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可行途径。然而,除了资金方面的困难之外,另外一种情况也有可能阻碍中小企业的这种努力或尝试,这就是,技术转让过程本身有可能要耗费时日,并且因涉及到法律等一系列部门和办理各种手续而使得中小企业觉得无所适从,从而放弃利用技术市场的努力。

最后,中小企业在技术升级和进行研究开发以及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障碍,这就是信息的缺乏,即它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技术合作伙伴,不知道怎样去了解以及购买适合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技术专利。这就涉及到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约束——信息约束。

5、信息约束。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价值被迅速推到了前台。信息革命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实际上是

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在信息革命中应运而生的国际互联网络和全球信息系统不仅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包括国际化都提供了无限商机,而且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拓展了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只有尽快改变传统的信息搜集以及处理方式,迅速掌握和适应先进的信息技术,才能充分利用经济的高度信息化为它们带来的种种机遇。

中小企业在接受和适应新的信息技术方面大都落后于大企业。这种情况通常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购买和建立信息通讯系统以及进行人员培训的成本较高,中小企业可能会遇到资金方面的困难;二是中小企业对信息技术缺乏了解和接触,对于从应用信息通讯技术中所可能获得的收益持怀疑态度;三是中小企业的所在地本身缺乏相应的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中小企业自己孤掌难鸣。此外,在那些已经开始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中小企业中,也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只是企业中少数人的事情,其他人与之没有关系。这种状况必然会限制信息技术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导致中小企业为引进信息技术而付出的成本无法产生最大的收益。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小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的价值评价。

6、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约束。

中小企业在产品(服务)上所受到的约束集中体现在市场进入障碍和不正当竞争的威胁。这种情况有时是由于政府的法律 and 政策的疏忽或不当所造成的,如阻止中小企业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或在进出口权方面对中小企业施加限制;有时则是由于某些大企业利用自己已经形成的垄断力量来阻止中小企业进入或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此外,在公共工程的承包、政府所需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方面,中小企业的利益往往会被忽视。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小企业本身在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质

量上不占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小企业在宣传以及公关能力方面的不足所造成的。

中小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受到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由于中小企业所提供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往往不及较大的企业,并且需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在劳动力雇佣方面往往无法同大型企业竞争。其二,中小企业的生产往往不十分稳定,对劳动力需求有较强的灵活性。如果由于法律、政策或劳资关系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过于僵化、就业条件以及解雇员工的刚性太强,那么中小企业在劳动力调整方面的弹性就会丧失。其三,在中小企业中,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占了大多数,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大企业,一旦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那么中小企业所受到的压力将会是首当其冲的。

二、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研究

1、建设有利于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对容易构成中小企业发展障碍的部分进行完善、修改或补充。同时在以后的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对中小企业的影 响,尽可能地让中小企业也参与到相应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来,从而充分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其二,减轻中小企业在税收以及各种社会以及行政管理事务方面的过重负担,消除因行政管理程序和税收制度等原因而对中小企业所造成的结构性歧视;提高政府各项行政管理规定以及办事程序的透明度,简化中小企业的创办手续和等待时间。其三,在政府公共支出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中小企业的利益,增加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订货和中小企业的政府合同持有量;为中小企业提供进出口方面的政策优惠,帮助中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2、通过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以及

建立专门的政府贷款计划,为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提供切实的保证。中小企业在启动、扩张等不同阶段以及在出口、研究开发以及培训等都存在不同的资金问题,尽管风险资本市场的存在有助于大大缓解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本不足和资金紧张问题,但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和短期信贷帮助也是必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高级专业人力资源等多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因而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资本市场完善之后再发展中小企业的策略无疑是不现实的。况且,风险资本市场的发育本身实际上还有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投资风险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分散。另一方面,由于风险资本市场仍然是以投资利润为中心的,而许多中小企业都是抢机遇的产物,它们在成立之初往往不可能经过充分的论证和仔细的研究开发,因而即使是在存在风险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很多时候也仍然难以获得及时的资本和信贷。在这种私人资本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发挥作用。

3、在信息通讯技术、专业咨询服务、职业技能训练以及研究开发等各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其一,积极建设信息通讯基础设施,通过对中小企业进行实用的技术培训和使用指导,鼓励和帮助它们了解、熟悉和掌握电子商务以及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功能和应用。其二,为中小企业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专家咨询服务系统,集中各方面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它们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遇到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三,帮助企业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通过设立适合中小企业需要的各种培训课程以及引进先进的培训手段,帮助它们进行管理人员的技能开发以及相应的雇

员职业技术培训。其四,为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设法建立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和开发网络,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的各种研究开发计划,加强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人员交流、合作开发等手段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强化它们的竞争力。

4、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与社区环境。一是产品(服务)市场环境,一是劳动力市场环境。在产品市场方面,应当努力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健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努力降低交易成本,防止一些大企业的垄断力量对中小企业产生危害。同时,鉴于中小企业对未来产品市场的预测能力往往不足,因此需要帮助它们学习和使用较为先进的市场预测方法和技术,从而提高它们的风险防范能力。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则应在保护劳动者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同时,努力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注意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面临自身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在中小企业周围如果存在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那么无疑会有利于它们借助社区网络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事实上,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存在一种聚集优势,即越是在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越有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区,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网络比较健全,而且彼此之间的资源可以实现互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聚集为企业家文化的培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小企业的繁荣离不开一个有利的社区环境,如果不仅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能源、电力、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体系,而且能够培育和创造出浓厚的企业家文化氛围、运行良好的中小企业合作网络和服务支持体系以及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那么中小企业必然会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问题研究^{*}

□ 李新春 胡晓红

(中山大学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18-06

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这和市场化改造的进程相互推进,从而为企业成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企业规模成长是企业外部的市场结构、制度和经济——技术环境变迁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经验学习过程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本文将企业规模成长主要看成是企业经验学习过程与外部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主要考虑市场化改造(所有制结构变动),同时,广东与国际经济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还要考虑外资进入或进出口。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分析广东的工业企业成长问题。

一、不同规模、所有制企业的成长差异

广东乡及乡以上工业在1992—1995年间获得迅速增长,1992年产值为2769.13亿元(1990年不变价),1995年则上升到5743.42亿元,净增长107.4%,翻了一番。这比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明显为慢,企业的规模增长率也明显偏低。以1995年与1992年的工业企业平均规模看企业规模增长率,尽管不同规模的企业都显示出增长的势头,但其间差异很大。小企业规模

扩大了82.6%(按平均产值计算),大企业规模增长30.1%,而中型企业规模则只增长了5%。这与殷醒民(1997年)从企业获取资金能力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小企业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政策后,迅速发展壮大,无论在资金还是政策优势以及人才资源获取上,都有不可忽视的成长优势。大企业则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扶持,或政策倾斜,或成为改革重点,企业的规模扩张也是可解释的。而中型企业的规模几乎没有增长,可能的解释是,大多中型企业为国有(集体)企业,一方面受到制度限制(就业与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中型企业也很少受到政府优惠的激励,而且资金短缺。

从企业进入的情况来看,1995年,广东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为41509家,比1992年的32168家多出9341家,考虑到乡以上的企业被兼并、破产的数字很小,则可以认为,这9341家企业为新进入的企业。这样,企业数增加为29%。考虑到大量进入的是小企业,则小企业的规模扩张是很快的,在大量进入的情况下保持了82.6%的规模成长。这进一步说明广东经济增长中,小企业

^{*} 本文为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课题“广东中小企业研究”部分成果。

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产值来看,大企业占工业产值比重从 1992 年的 22.9% 上升到 1995 年的 27.1%, 小企业则从 51.3% 上升到 58.2%, 但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则从 25.8% 退却到 14.7%。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广东工业大型企业的数量在 1992—1995 年期间从 274 家增加为 515 家 (增长了 87.9%), 远远高出中型和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速度 (分别为 12.7% 和 29.1%)。由于考虑的时间很短 (仅为 3 年), 大型企业的数量激增主要应当是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 市场的进入壁垒或阻止进入的障碍很低。中型企业数量增长缓慢恰好说明了, 大量中型企业在这期间迅速成长而跨入大型企业的行列。

所有制变动情况为: 1995 年与 1992 年相比, 国有企业数量从 6927 家 (1992 年) 减少至 6873 家, 降低 7.8%, 企业规模 (产值) 仅提高 2%, 这表明国有企业从数量和产值在绝对值上都在下降, 其占工业产值比例则从 1992 年的 39.3% 下降为 1995 年的 19.2%, 国有企业的收缩和退出是明显的。这一方面是政府有意识的企业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则是新生的产业大多为非国有部门所把持的结果。集体企业的数量也同样有所增加, 从 20587 家 (1992 年) 增加为 23556 家 (1995 年), 上升了 14.4%, 企业平均规模则从 360 万元上升为 542 万元, 扩大了 50%。这其中主要应是乡镇企业的作用 (这在下一节论述), 占产值比例则从 1992 年的 27.1% 下降为 22.2%, 减少的部分主要由其它非国有经济 (私营、联营、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及其他经济) 补充。非国有企业数从 4654 家增加到 12251 家, 增加了 163.2%。企业平均规模从 2000 万元 (平均) 扩大到 2700 万元。非国有企业平均规模 (产值) 已近乎国有的 2 倍, 为集体企业的 5 倍, 在工业企业产值中占据一半以上 (58.5%) 的比例! 广东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是

明显的。

二、迅速成长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是支撑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这尤其表现在“八五”期间 (1991—1995 年)。据统计, 广东乡镇企业总产值已从“七五”期间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约 50% 提高为“八五”期间的 76.95%,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七五”期末的 23% 上升到 40%。同时, 乡镇企业也是广东外向型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有意义的问题是, 广东乡镇企业在广东经济总量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 企业规模成长情况如何呢? 根据 1980—1995 年的不完全统计计算情况可知: 乡镇企业数量在 1990 年前迅速增加, 从 1980 年的 9.73 万家上升为 1990 年的 119.65 万家。而 1990 年之后的企业数量增长则相对放缓, 1995 年甚至比 1994 年还减少了 1.09 万家, 这表明, 乡镇企业的改造和兼并重组趋势加强。这里, 企业平均规模用两个指标衡量, 一是企业平均人数, 二是企业平均产值。从企业平均人数上看, 1985 年与 1980 年相比上升很快, 平均规模扩大了 1 倍多。但 90 年代初, 由于新增企业数的大幅上升, 企业平均规模反而小型化了, 直到 1992 年, 企业平均人数才超过 1985 年的 5.8 人, 但到 1995 年, 企业平均就业人数也仅为 7.4 人, 尽管比 1985 年规模平均扩大了 1.4 倍, 但绝对规模仍然很小。这主要是由于数字中包括了大量小型的联户和个体企业, 这从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的平均就业数。而企业平均产值则增长迅速, 尤其 1992 年后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的环比增长速度为: 23.0% (1991 年)、41.3% (1992 年)、49.0% (1993 年)、41.1% (1994 年)、37.7% (1995 年)。另外, 从企业年平均固定资产原值的数据看, 则企业的资产装备规模扩大是迅速和明显的, 1994 年比 1992 年就增加了 1 倍以上 (从 4.30 万元上升到 8.62 万元)。

而出口企业数增长速度又明显快于乡镇企业总数增长速度,出口企业的规模无论从平均人数还是平均产值来看,都比乡镇企业总水平高出 10 倍以上。1994 年,广东乡镇出口企业平均就业人数已达 99.1 人,平均产值为 272.3 万元,比乡镇企业总体平均的 7.0 人和 22.3 万元分别高出 14 倍和 12 倍。

三、分地区的企业规模成长比较

从广东省 21 个市的工业企业发展情况可看出企业数量增长的几个层次:高出全省增长水平 (32.7%) 之上的市区有:广州 (76.8%)、珠海 (45.4%)、韶关 (38.5%)、惠州 (44.6%)、东莞 (93.2%)、中山 (66.7%) 和清远 (36.3%)。除韶关和清远外,其余均在珠江三角洲黄金地带,而深圳的企业数量增长极为缓慢。这只有对比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来综合考虑,企业规模 (平均产值) 在 1992—1995 年间扩大了 1.7 倍多。从 1995 年企业绝对规模平均值来看,佛山为平均 5500 万元,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后的有深圳 (3800 万元)、中山 (3120 万元) 和江门 (2800 万元)。而企业平均规模处于较小水平的有:河源 (270 万元)、梅州 (520 万元) 和清远 (360 万元)。从工业轻型化程度 (轻工业产值/重工业产值) 看,1995 年轻型化程度较大的有汕尾 (4.67)、潮州 (3.66) 和汕头 (3.05),而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则有韶关 (0.61) 和梅州 (0.86)。1992—1995 年期间轻型化程度下降较大的有珠海 (下降 1.85)、汕尾 (下降 1.81)、潮州 (下降 2.58),这几个城市都从很高的轻型化程度 (4.38、6.48、6.24) 降下来。从总体看,广东的工业轻型化程度从 1992 年的 2.06 降到 1995 年的 1.66。

各个工业企业规模成长的差异一部分是历史的原因和产业传统所致。但在 90 年代以来,则主要还由于各个城市获取资源、享受政策优惠 (反映在珠三角和山区的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结构以及政府管理上的差

异。传统工业城市——广州在 90 年代,尽管工业企业数量有大幅上升,但企业规模增长缓慢,广州工业企业在 1995 年的平均规模不仅低于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而且也比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的企业平均规模为低。而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的企业成长迅速,进一步反映出其宽松的企业成长环境和获取资源优势 (包括人力资源) 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中山、佛山、东莞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发展,90 年代以来,已发展成为广东省的工业重镇,以名牌产品为导向,形成不少有实力的规模企业,似乎突破了乡镇企业的传统局限 (保守的经营意识、家族企业制度),不少企业正在向大型企业规模成长,而且,国际化倾向明显。深入的调查将会发现,其中不少企业已跨入技术或资金密集型的新兴产业,代表着我国未来竞争的主要力量。

可以认为,各个地方在企业数量增长、平均产值增长和工业轻型化程度的变化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该地区市场进入障碍、企业规模扩张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这里,根据这三个指标,对广东省 20 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城市组在发展上的类似性。

如果将聚类结果分成五组,则分别为:第一类:深圳、汕头、河源、惠州、江门、茂名;第二类:肇庆;第三类:梅州、佛山、珠海、阳江、湛江、潮州、中山;第四类:广州、东莞、韶关、清远;第五类:汕尾、揭阳。

基本上,可以将各地的工业企业扩张归结为三种主要形式: (1) 数量扩张型:这主要以广州、东莞、韶关为代表。其企业数量高速增长,而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缓慢。这表明新企业大量进入,而老企业规模成长很小。这类城市工业企业结构性调整的变动很小。

(2) 规模扩张型:以深圳、汕头、惠州为典型。这类城市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很少,而企业规模扩张迅速。深圳的企业数量增长率

很低 (0.2%), 而企业规模增长速度则达到 171.4%, 是这期间广东企业规模增长最快的城市。这类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同样很小。

6) 均衡扩张型: 主要的代表有佛山、中山和珠海。这一类型城市企业成长的特征是在新企业大量进入的同时保持了企业规模的高速成长。在这类城市中, 则可以看到其工业轻型化程度在较大幅度地下降 (在几组中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 有几个城市是比较特殊的, 被单独列为两组。一组是汕尾和揭阳, 其企业平均规模 (产值) 在 1992—1995 年期间有大幅度的上升, 而工业轻型化程度也在迅速降低。作为单独一组的肇庆是广东山区发展工业的典型, 其企业成长迅速, 1992—1995 年间, 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大了 90%, 而企业数量则主要由于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重组改造而有所减少, 企业数量下降了 22.2%, 工业结构则少有变动。

四、广东工业企业成长模型

在 1981—1995 年期间, 广东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约一倍 (从 2.32 万家到 4.27 万家), 而工业总产值则从 1981 年的 250 亿元增长为 1995 年的 5745 亿元, 增长了约 23 倍。由此可以看出, 在经济快速成长期, 不仅伴随着大量新企业的进入, 而且, 企业规模成长迅速。从企业规模扩张的角度来看, 可以归结为主要的三方面因素: 企业经验学习曲线、制度因素和对外经济联系因素的影响。

企业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 就经验学习曲线导致的企业规模扩张模型分析可得出结论: 就同质的企业来说, 1) 较大的企业比较小的企业增长慢; 2) 企业规模增长速度随时间而递减 (Schwalbach, 1993)。这里是就企业平均规模成长而言的, 一方面由于统计各个工业企业的生存时间上的难度, 这在计算企业平均规模成长上也意义不大, 另一方面, 可以假设, 我国企业的规模成长

学习效应在计划经济时期 (1978 年之前)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当时的企业规模扩张只是政府计划的函数。因此, 企业规模学习效应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是有意义的, 而且, 可以认为, 企业经验学习主要不是企业内部积累的过程, 而更多的来自于向国外的管理和技术学习, 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是如此。显然, 经历改革开放的时间越长, 企业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而达到的规模成长效应就越大。因此, 可以简单地提出假设, 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的速率与改革开放的时间成正比, 而与企业现有规模 (按平均规模计算) 成反比。数学式表达为:

$$y = y (T * N_t / Q_t) = a_1 + b_1 * T * N_t / Q_t = a_1 + b_1 * X_1 \dots\dots\dots (1)$$

其中, y 为企业规模成长速率, $y = (Q_t - Q_{t-1}) / Q_{t-1}$ 。

T 为时间, 1981 年为 $T=1$, 1982 年 = 2, 依次类推。

Q_t 为 t 年的工业总产值 ($t = 1981, 1982, \dots, 1995$), N_t 为 t 年的企业数。

a_1, b_1 为系数。 $X_1 = Q_t / (N_t * T)$, $X_1' = 1 / X_1$ 。

附图一是对 y 和 X_1' 之间的散点分析, 由图看出, 企业规模成长的学习曲线呈现出较好的双曲图形, 这是与理论相吻合的。因 y 是 Q_t 的双曲函数, 因而, 为回归分析的必要而取其倒数。

影响企业规模成长的第二项因素是制度变迁, 显然, 最为重要的制度变革是市场化改造, 这里, 简单地用一个非国有化指标来衡量。从附图二的散点图来看, 可简单假设为在企业规模成长与非国有化程度之间有线形相关关系, 则:

$$y = y ((1 - Q_{gt}) / Q_t) = a_2 + b_2 * Q_{gt} / Q_t \dots\dots\dots (2)$$

定义: $X_2 = Q_{gt} / Q_t$

其中, Q_{gt} 为 t 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 Q_t 为总产值, Q_{ft} 为非国有工业产值。

第三个影响企业规模成长的因素是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这里，用当年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来衡量。同样，由附图三的散点图可得出在企业规模成长与外向化程度之间的线形相关关系。由此，可给出函数式：

$$y = y(P_t/P_n) = y(X_3) = a_3 + b_3 * X_3 \dots\dots\dots (3)$$

其中， P_t 为 t 年广东的进出口总额， P_n 为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后，用 X_3 替代 P_t/P_n 以便于进行回归分析。 a_3, b_3 为系数。

综合 (1) (2) (3) 式，将企业规模成长速率看成是学习效应、制度变迁和经济外向性三方面贡献的几何相加的结果，并将常数项相加，则可以写成：

$$y = a + b_1 X_1 + b_2 * X_2 + b_3 * X_3 \dots\dots\dots (4)$$

其中， $a = a_1 + a_2 + a_3$ 为常数。

本文分别对广东工业企业总体以及不同的企业规模（分为大、中、小企业）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下表为回归结果。

表：对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的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b	b1	b2	b3
工业企业	0.17	0.39	0.43	-3.92
总体	0.93)**	0.76)	1.40)	1.11)
大型企业	0.24 0.57)	0.63 0.32)	1.19 0.99)	-6.65 0.89)
中型企业	0.53 1.58)	-0.03 0.76)	0.24 0.32)	-4.08 0.92)
小型企业	-0.10 0.57)	0.81 1.70)	0.25 0.45)	-1.00 0.29)

* 根据散点图的情况，将其中一个特异点（1990年的数值）剔除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这是考虑到所选数据在80年代是以1980年为基年，而90年代则以1990年为基年，因此，1990年的环比增长率是不真实的。

** 括号中数值为 T-检验值。

由上表给出的回归系数可得出广东工业企业在1981—1995年期间的企业平均规模成长曲线函数分别为：

广东工业企业总体： $y = 0.17 + 0.39X_1 + 0.43X_2 - 3.92X_3$

其中，大型企业： $y_1 = 0.24 + 0.63X_1 + 1.19X_2 - 6.65X_3$

中型企业： $y_2 = 0.53 - 0.03X_1 + 0.24X_2 - 4.08X_3$

小型企业： $y_3 = -0.10 + 0.81X_1 + 0.25X_2 - 1.00X_3$

首先，企业的规模和时间学习效应在大型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总体企业中有所体现（为正的系数值），中型企业呈现出微弱的负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企业依靠内部管理知识的积累和经济规模效应而达到企业扩张，一般来说，规模较小和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具有较大的内部学习成长效应（靠自身的经验积累）。因此，这里，小型企业具有较大的学习系数是与理论一致的。模型同时表明，广东大型企业的学习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型企业由于人才、获取资源以及政策的优势，通过加强管理和提高规模学习而加速成长。而中型企业则呈现出微弱的负学习效应，或者说，其学习效应非常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中型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企业规模大和时间长并不是成长优势，例如，时间长，则可能企业冗员多，负债高，历史问题严重，又不能像大型企业那样得到政府的支持。总的来说，它既不具备小企业的快速学习成长优势，也不具备大型企业的管理和规模经济能力，因此，影响了其学习成长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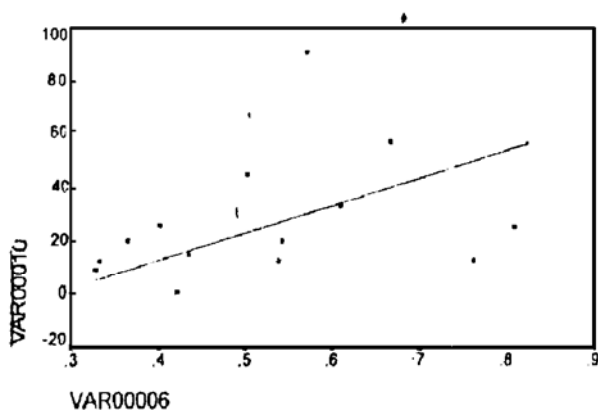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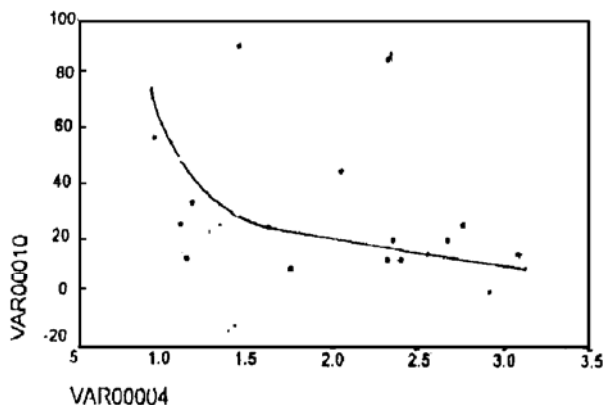
制度因素对所有类型的工业企业成长都有正面作用，而影响最大的是大型企业，其企业扩展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化（非国有化程度）。而制度因素对中小企业的贡献基本相同。这与直观的看法有差异，一般人们认为中小企业更多受惠于制度变革，但本文提出的模型却表明，中小企业在规模成长速度上受制度影响远比大企业小。可能的解释是，市场化改造的制度变革给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的更多是进入市场的机会，这加大了市场“原子竞争”的强度，企业的规模成长速度因此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而市场化改革对大企业来说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潜在市场，

而大企业的进入障碍较高，因此，这一发展主要就贡献于大企业的规模成长。

最后，外向化程度（以对外贸易强度衡量）对所有类型的企业规模成长都呈现出负面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大型企业（系数为 -6.65），其次是中型企业（-4.08），影响最小的是小型企业（-1.00）。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市场上加强了竞

争，竞争压力的加强总的效果是限制了企业的规模扩张。显然，受到国际竞争冲击最大的是大中型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经营灵活、处于拾遗补缺的市场领域，因而，受到的冲击也小。这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短期）的结论，长期的效果则必须进行长期的时间序列研究。●

责任编辑：谭湛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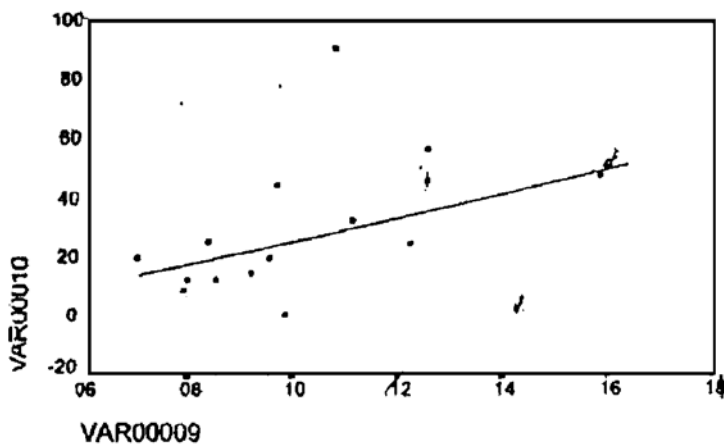


附图一 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学习曲线

VAR00010 = 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成长率 % ;
VAR00004 = $X1' = N * T (Qt)$

附图二 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制度相关性

VAR00010 = 广东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成长速率 % ;
VAR00006 = 工业产值非国有化程度



附图三 广东工业企业规模成长外向型经济相关性

VAR00010 = 广东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成长速率 % ;
VAR00009 = 广东经济外向型程度 = 进出口总额 / 国内生产总值

探寻粤澳合作关系的新突破

——“新时期粤（珠）澳合作关系”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谭湛明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24-04

旨在探索澳门回归前后经济社会发展路向和粤澳合作新发展的“新时期粤（珠）澳合作关系研讨会”于1999年元月3至4日在珠海市隆重召开。来自粤澳的专家、学者100余人云集一堂，深入论证，研讨较以往又有新的突破和拓展。这次研讨会由广东省政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社科联、华南师范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珠海市政研室和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

有着400年东西方文化交汇历史的澳门九九回归祖国，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制订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它标志着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占领中国的历史痕迹，随着澳门的回归将最后彻底消失，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具体体现，将极大地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对实现台湾和平统一，进一步加强两岸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定位和发展路向，应根据澳门的特点、优势和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学区位优势 and 比较优势的原理，扬长避短，发展澳门的独特优势，提升微型经济的竞争能力，深刻认识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制约、历史条件、传统影响和文化惯性，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要大而全，而要有特色，正确确立未来发展路径。具体来说，澳门回归后应继续依托香港和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强港澳、粤澳、澳台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旅游博彩业，重点突出澳门旅游业的文化特色，将澳门发展成以多元化旅游业为先导产业的区域性、国际化旅游城市，让东方的“蒙特卡罗”演变成东方的“拉斯维加斯”；以创新和高新技术改造澳门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行多元化发展，提升澳门出口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再造澳门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将其建成为区域性的贸易和航运中心；利用澳门连接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的独特桥梁作用，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澳门营造为亚太经济区域高科技信息中心。

二、粤澳合作关系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粤澳合作关系包括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各方面的合作，以往重点放在经济合作发展方面。由于粤澳两地经济互补性强，因而合作的意义重大。近 20 年来，粤澳经济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贸易往来到相互投资，发展很快，至今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现实的等多种原因，两地的合作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难点：1. 合作的层次还不高，自发性的合作多，协调型的合作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合作多，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合作少；2. 合作的范围仍主要局限在第二产业范围内，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旅游业的合作亟待加强；3. 由于广东、珠海属“地方”政府，凡事都要通过中央，循外交途径与澳葡政府联系解决，也影响了直接沟通和协调管道的顺畅；4. 以往重点放在经济合作，而诸如教育、文化、科技、司法、治安等其他方面合作少；5. 产业合作方式仍局限于零星合作与行业性合作，缺乏策略联盟性的合作。

由于澳门是外向型微型经济，决定了政府的经济影响力较弱，加上长期受殖民统治，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策略，一直存在“小而全”、自成系统的思想。广东尤其是珠海市产业与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也忽略了与澳门在规划上作为区域联动发展的必要衔接与协调；在产业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建设、城市功能设置等，未能与澳门形成明确的合作分工。如澳门路环岛与珠海横琴岛的共同填海开发，特别是澳门的填海造地主权归属问题；广珠铁路、广珠高速公路与澳门的衔接问题；

澳门深水港的选址及与珠海港口的布局与内地货物输出的合理分工问题；澳门与邻近的珠海、深圳、广州机场航线的划分、合作、联营问题；澳门的资讯信息中心与广东信息高速公路的联网问题等等，均迫切需要进行协调，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否则，将会导致恶性竞争，重复建设，造成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妨碍两地经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粤（珠）澳合作关系的新突破

澳门回归已日益临近，粤（珠）澳合作关系必将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回归后，由于主权统一，使原来的因为主权原因而形成的合作障碍将完全消失，这对于两地由低层次、市场导向、自发的民间合作上升到两地政府高层次自觉的整体协调式合作将极为有利。澳门应充分发挥自由经济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广东的土地和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技术人才，背靠庞大的国内市场，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上，构筑粤（珠）澳经济合作的新格局。（1）建立政府高层次的协调机构。回归后，应积极谋求建立一个由粤澳两地经贸发展机构、企业、研究单位等组成的具权威性的经贸合作协调机构，协调社会分工、资源配置、产业政策、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科学研究以及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推进广东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澳门接轨。（2）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回归后，粤澳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将会更高。粤澳两地将在整体协调、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分工，在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粤澳应通过合作、求同存异、互补互利、共

同发展。3) 以旅游业为突破口, 加强相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和合作步伐, 避免恶性竞争, 推动两地经贸合作, 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粤澳经济关系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粤澳地理区位相近, 天然的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些主要产业如贸易、工业、金融、交通运输和旅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两地合作的实质应在于加强协调, 充分发挥合作优势。如珠海的旅游景点可与澳门配套, 吸引香港、台湾和海内外游客, 搞“珠澳连环游”, 游完澳门再游珠海; 又如目前拟建的港澳大桥问题。受到港珠澳各方的普遍重视, 先后提出多个建桥方案, 上述方案中, 均肯定在珠江口架建连接香港大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大的分歧则是桥位走向的选择。可以预测, 按照目前港珠澳三方的经济实力和各地经济发展, 如果各方不能真诚合作, 在珠江口耗资几百亿元同时兴建两座 30 公里的跨海大桥, 重复建设, 形成恶性竞争, 其投资效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定是很低的。建议在修桥问题上, 各方应从全局出发, 从长计议, 不要急于立项、动工; 两地政府应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反复论证, 进行协调, 在此基础上选择或形成最佳方案, 作出决策。其他如澳门深水港的选址和建设也应如此, 慎之又慎。

4) 合作范围应进一步扩大, 并由局部合作向全方位合作推进。回归后, 粤澳经济合作要在以往的基础上, 在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在推动粤澳两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 结合澳门实际, 有选择地、分步骤地发展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又如可设法推动澳门资本与广东大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合作, 兴办一批技术含量高的跨区域外向型大型企业集团, 与国际市场上世界级企业相

抗衡。5) 在探讨粤澳经济合作新发展的同时, 必须展开和加强粤(珠)澳教育、文化、人才培养、老人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一是从取长补短和借鉴的角度来确立合作与交流的内容。如探讨如何充分利用广东有关技术理论教育的师资力量和选择澳门的一些新兴产业和优势行业建立相关教育的实习工场, 开展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 二是从发展需要和共同开发的角度来确立合作与交流的内容。如合作研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粤港澳教育发展一体化问题等等。

6) 加强粤澳区际司法协助, 联手打击跨境犯罪活动。澳门近年来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暴力罪案大幅增加, 但澳门警力却严重不足且内部管理混乱, 致使效力大减; 而粤澳边境的跨境犯罪活动仍十分频繁; 因此回归前后, 必须加强粤澳两地的区际司法协助, 联手打击跨境犯罪活动和危害治安的黑社会势力, 促使澳门治安环境趋向好转。

四、澳门桥梁作用的全面认识

数百年来, 澳门与欧洲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贸易、投资合作的伙伴关系; 由于澳门人口中的一部分是欧亚混血的澳门土生葡人, 另外是华人和归侨占了澳门人口的绝大多数, 其海外关系遍布美、加、澳、拉美、非洲、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这种海外网络可用于促进内地、台湾、亚太地区、欧洲以及拉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高新技术转移, 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华经济圈的进一步形成, 增强华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 在跨进新的世纪里, 澳门将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继续承担中国内地与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拓展经济贸易、投资合作、文化交流的

桥梁，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桥梁中介作用至关重要。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点：1. 发挥澳门的贸易中介作用。澳门是国际自由港，经澳门转运出口的货运成本又比香港低 15%，一旦其深水港条件改善、机场航线的不断增多，及其铁路、高速公路网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善，其转口贸易将获得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珠三角西部城市的出口货物经澳门转口会更有利。关键在于加快连接粤澳两地铁路、高速公路及澳门深水港的建设，两地政府高层应加强协调与合作。2. 充分利用澳门的商业服务信息网络功能，将广东和内地的产品推向世界，同时相应地澳门也可利用广东将欧盟的产品和自己的产品推向中国内地市场。“澳门欧洲资讯中心”使澳门可以同欧洲 250 多个信息中心直接联网，成为欧盟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桥梁。广东可利用澳门的资讯条件与世界各地密切联系，将广东的信息通过澳门传向世界，尤其是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同时又通过澳门收集世界各地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澳门同欧盟的“欧洲投资伙伴计划”，使亚洲地区（包括内地和台湾）的中小企业可利用澳门作中介，同欧洲投资者结成伙伴关系，有利于吸引海外资金、取得无息贷款、培训人员等优惠

待遇。广东应充分利用澳门的条件，吸引欧洲、拉丁语系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3. 发挥澳门旅游服务的中介作用。由于澳门是国际自由港，人员进出自由，货币自由兑换，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免签证，加上近期澳门国际机场的投入运转和珠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澳门具备了发挥旅游中介服务的硬件条件，要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不断完善澳门自身的旅游环境外，还应加强粤（珠）澳官方的沟通，民间旅行社的合作及双方海关的合作等，从而既使“澳门—中国内地游”的游客不断增加，也使反向即内地到澳门的游客及内地经澳门到世界各地的游客不断增加。4. 发挥澳门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澳门是具有 400 多年悠久历史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澳门的文化具有浓厚的拉丁色彩，并形成独特的风格，历史上，澳门起着传播东西方文化桥梁的重要作用，回归后，这种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5. 发挥澳门人才引进的中介作用。由于澳门具特殊的地缘、人缘关系，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广东可通过澳门引进发展经济所需的金融、管理、外语、信息行业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并为广东的技术人员赴海外（尤其是欧盟）留学访问等作好中介联络服务。●

知识的价值与价值转换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论透视知识经济

曹绪飞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28-04

关于知识经济，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一些问题是应该予以澄清的。虽然知识经济以高科技为其着眼点，或是为其核心，然而知识经济并不等于高科技。高科技只是它的一极。它的另一极是基础教育，是全体公民知识水平的全面提高。这是它的立足点。另外，知识经济虽然与信息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知识经济毕竟是从人这个主体出发的，它的要义是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信息经济则是从信息这个客体出发的，它强调的是信息的传输及相应的技术的发展。本文将主要探讨知识的价值及转换问题，这里涉及的一些经济上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应该是认识、理解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必要前提。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所揭示的将是最根本的问题。

一、知识价值层次论。科学技术的发展揭示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的反思。过去被看作附加值的知识现在已被作为主体来认识和考察。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知识的商品化和资本化提供了外在的环境。但知识的商品化还远不发达，而知识的资本化也只能看作局部的偶然的事

实。知识劳动者已司空见惯，而知识资本家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科学技术作为知识显示了极高的价值，但科学技术知识并非是知识的全部。它是知识中的精品。它在整个社会知识中的含量及价值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目前，在大部分的国家 and 地区，科学技术还没有能够成为知识的主体。市场在青睐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继续包容人类一切知识，给它们提供实现其价值的环境和规则。人类的知识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常识层次、系统的专业知识层次和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层次，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不同的价值。

常识层次的知识呈现出非系统性、实用性和浅易性。它是人类生存活动所必备的最基本的知识。它是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最基本的事实和最简单的联系的认识。常识一般以“赠与”的方式而不是以交易的方式在人际间传播。常识主要通过家庭启蒙、社会交往和个人经验来获得。它在经济上的价值最低。但随着知识的商品化的加深，常识的经济价值也会随之增长。因为常识可以被整理加工，转化成为一定形式的知识产

品，比如那些系列的“十万个为什么”。少儿则成为常识的消费主体。常识的传播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少儿教育主要是一种常识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常识也会加快其商品化进程。

系统的专业知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如果说常识的获取主要是一种生活消费的话，系统专业知识的消费则是一种生产性的消费。因为系统专业知识的积累将直接为现实的生产服务，并成为创造新知识的工具。系统的专业知识是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不同领域的深刻的系统的认识。它是人类对这些领域长期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改造世界和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基础。专业知识的形成是个价值积累的过程。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学习需要特定的设施，经过系统化的阐释和训练。专业知识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它经常性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维持人类现有的生产水平。与常识层次的知识相比，它具有更高的价值。

科学技术创新知识是价值含量最高的知识。作为一种新知识，它表现为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它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正确、更精确、更完备，从而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科学技术创新知识会使人类生产能力急剧增长，使产品更加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使物质本身获得新的价值。由于它使人类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满足，它对人类原有的较低层次的需要就产生淘汰性的作用，从而迅速占有并垄断市场。任何领域的科技创新都将使该领域甚至整个社会的面貌被这一创新所全面改造，使该领域以至社会发生突破性进展，走上一个新的高度。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在开拓新世界方面的巨大力量，它被奉为第一生产力是理所当然的。

据以上分析，常识层次的知识、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创新知识，在实践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处于不同的价值层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层次分明，地位稳固，也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价值只能在各自的层次中实现，这些还要取决于其它因素。

二、知识的价值、价格与供求关系。知识经济的前提是知识的商品化，甚至资本化。知识作为商品必须经过知识的应用即知识的消费才能实现其价值，并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当知识还只是处于储备状态，它不过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它的现实价值能否实现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其中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对知识的价值从虚拟形态向现实转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1、供不应求。当市场急需某方面的知识的时候，该方面知识的虚拟价值就容易转化为现实价值，而其市场价格会超出其价值。改革开放后，外语人才极为短缺，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使拥有外语知识的人才身价倍增，所学的专业知识可以迅速实现价值转换。

2、供过于求。当某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复制超过了社会需求量，就会使这方面知识贬值，使其价格低于价值，并使一部分拥有该种专业知识的人才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无法实现价值转换，同时也使已工作的该专业人才面临严峻的挑战，即竞争与失业压力。

3、供而无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某方面的知识的生产超过了需求量，但仍有一部分能够进入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实现其社会价值。而在供而无求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还没有产生某方面的需求，不为社会所需的知识生产便成为一种无效生产。这种知识只能束之高阁。供而无求可能是因为该种知识

超出现有的生产水平的消费能力,从而无法实现其价值转换,也可能是源于一种人为的拒绝,才陷入“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况。

三、知识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一致,知识也经历着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无用的知识将不会被再生产,有用的知识则被世代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所谓无用的知识,就是一种不再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从而不再有社会价值的知识。有用的知识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知识。社会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可能是社会生产所必需,也可能是生活娱乐所必需。总之,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关于风水相术的知识居然能够一度流行,说明它还在为社会所需要。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心理需要,也给其拥有者带来一定量的收入。这也是一种价值转换。

人类知识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有着某种类似性,那种为人类世代所需要的知识总是被不断地重复生产出来。对原有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就是知识的简单再生产过程,而知识的创新则是知识的扩大再生产。当社会知识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说明知识生产不足。当知识过度地简单再生产出来,超出社会的需要量,就说明知识生产过剩了,可能引发危机。

四、知识的消费。知识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作为生产性消费的知识将进入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产过程,成为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增值的源泉。生活性消费的知识主要是常识的消费。生产性消费的知识主体是专业知识。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消费则带来远远超出一般专业知识所能带来的巨额财富。

知识的消费是生活的需要也是生产

的需要,知识不能进入消费过程则是知识生产的无效或知识生产的失败。知识的消费是维持现有生产水平的前提,也是提高现有生产水平的前提,没有知识的消费就没有知识的价值转换。知识的消费也有正常消费和高消费。当用人单位拥有知识量巨大的人才,而现实需要的量只是其知识中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则被闲置起来,不予开发和利用,即是知识的高消费。但高消费毕竟优于不消费。在这里,更需强调消费即是生产。

五、知识的边际效用。在知识的生产和使用上,亦存在着边际效用问题。当某种专业知识的生产超过了社会分工对该专业知识的需要量,随着该专业知识的不断复制,其应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就会逐步减少,对该专业知识的投资的有效性不断降低,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趋势。

对个人而言,当其专业知识已适应工作的需要,其知识量的再增长对其工作而言就会有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会处于有效性降低或无效状态。是故有人觉得没有必要学那么多东西,有一技之长足矣。甚至在一技之长方面也不求其精深。但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个人知识量的不断增长虽有效用递减的表象,但知识的大量储备却是其专业知识升华或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如何处理好知识应用和知识的大量储备的关系,如何把握个人知识的现状与未来,对于个人及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六、知识的折旧。有人认为知识无所谓磨损的问题,因为知识的传播范围越广,使用的程度越深,其效用也会越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知识这种无形资产也会不

断磨损，是一种无形磨损，无形损耗。当某种知识的使用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种拓展生产空间的力量，只能够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而不能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这时就需要知识的更新和升级。这一过程往往使现存知识部分地或全部地被淘汰。这就是知识的折旧过程。正因为如此，学习才应成为人的终身事业。因为知识内容和结构的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个人只有让现有的老化的知识不断折旧，更新知识的内容和结构，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另一角度来看，知识的折旧也应成为社会性的自觉行为。当旧知识只能让生产徘徊不前甚至成为生产发展的阻力时，就没有任何理由死守它。我国旧纺织机器的销毁可以说就是这种自觉行为。销毁旧机器意味着与其使用相关的知识的迅速折旧。那些知识成为不再有用的东西。我们也看到，在电脑迅速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关于相对落后的电脑的一些知识也就从有用的知识变为无用的知识。有的知识在形成之后，甚至还进入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便已失去其效用，这在知识爆炸的年代是一种正常现象。知识创新与知识折旧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要有创新就必然有折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知识又作为合理的要素被转移到新知识中去了。正是这一点使一些人感到知识似乎是没有磨损与折旧可言的。

七、知识的投资风险。人类一代又一代为知识的获取支付报酬，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投资。知识投资行为的目的在于知识的应用，也就是使知识从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虚拟的价值变为现实的价值。但能否达到这一目的，是难以有绝对把握的。因

此，知识投资有一定风险。对于常识层次的知识的投资往往无所谓风险，因为它在经济上影响较弱。对专业知识投资会有一些风险，可能会出现投资低效或无效的结局，但这种风险也不是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专业知识投资能够得到预期的回报。对创新知识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投资虽然可能有极为丰厚的回报，但风险也会增大。一方面，投资额度大，周期长，另一方面科技的迅速发展可能使投资的项目因落后而贬值，致使投资回报率大大降低。对那些潜在的科技成果进行投资的风险则最大。因为科学研究是难以确定日程的。虽然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符合逻辑，具有可预见性，但研究的进程却难以把握。从投资到科研成果的取得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这里投资的意义属于未来。对于现实的巨额投资来说要冒绝对的风险，但这又是必要的，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未来，不能不为未来开辟道路。人类在一些未知领域的巨额投资在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值得的。前人的在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有的直到目前才化为现实的价值和生产力，这正是前人为未来投资的结果。至于我们应为未来投入多少，倒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八、知识与政策导向及制度设计。要发展知识经济，就必须造就一大批知识企业家、知识管理者，并使大部分的劳动者成为知识劳动者，让白领远远超出蓝领。美国学者塞缪尔和乔伊斯在其所著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谈了教育、识字、出版、词库等问题。他们从各国知识水平的对比中看到了收入差异的根源。知识水平是个根本的问题。只有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才能为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才能使新的知识容易产生也容易被接受。但知识

知 识 价 值 论

——知识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王久华

河北省保定市科协 河北 保定 071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32-07

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价值观,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土地、劳动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价值观,也在逐步撞击以原材料、金融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价值观。相应地,人们在知识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模式也随之转变。故此,知识价值问题正成为人们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问题。

一、知识价值的基本内涵

(一) 知识价值的含义

依照知识经济学的观点,知识是力量、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是无价之宝。知

识价值是用知识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价值,是知识经济的尺度。依照现代价值科学的观点,知识价值是以知识作为客体,以人作为主体所构成的价值关系。也就是说,知识价值是在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与功能。知识价值的客体既指融进知识的各种物品等硬件,也指融进知识的各种政策、法规等软件。知识价值的主体是指个体、群体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集团等。知识价值是知识客体与知识主体之间的一种统一状态。具体些说,知识价

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努力,国家的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起着杠杆作用。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境况下,知识的价值转换难以正常进行,甚至经常受阻,知识的学习必然受到抑制。知识只有在顺利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得到合理的回报时,知识的进一步学习、积累和创造才能得到激励,才有动力,才会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为什么人才会纷纷涌向一些地方?因为那里具有较好的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环境。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人才大量流失?因为在那里知识并不受重视,难以实现价值转换。创

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就是对求知的鼓励,而这需要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近年来我们的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人才流动、学历升温、高薪招贤这些新现象都是新政策的产物。当然究竟如何进一步开发智力资源,如何更新、优化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如何把政府调控和市场引导有机结合起来,还需要继续研究。总之,在人才管理和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必须不断开辟新的途径,促进全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必要的前提。●

责任编辑:冯生

值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五点：一是知识价值模型。指知识价值主体对客体进行评价的综合标准、尺度——知识价值认同、评定的依据；二是知识价值关系。指应用知识价值模型来度量、对照、评价、权衡的知识价值主体与客体关系；三是知识价值认定。指把知识价值模型用到知识价值主体、客体之中，作出知识价值认定，如好与坏、高与低等；四是知识价值效应。指知识价值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并表现出来的知识价值效果；五是知识价值目标。指知识价值主体的价值活动指向，是引导人们进行知识价值活动的路标。总之，知识价值活动作为一个实际动态过程，是由知识价值模型、知识价值关系、知识价值认定、知识价值效应和知识价值目标构成的评价体系，这是知识价值的基本内涵。

（二）知识价值的特性

知识价值的**不灭性**，是指一种知识原理或一个知识评价公式等，不论在知识经济活动中如何反复传播和使用，都不会使它的价值有丝毫的磨损；相反，它还会在吸收后人的智力中有所增加。这说明知识价值可以延续传递和扩散，成为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价值源泉。

知识价值的**时效性**，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知识价值水准不断地改变、更新、转移和提高。在全球，木柴、风、煤、石油、原子能、太阳能和热核能先后成为能源的主要对象，正是人们的能源知识价值水准不断提高的结果。在我国，50年代的电子管、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的集成电路、80年代的微机和90年代的多媒体，是不同时代对领先新技术知识的要求，也是知识价值水准不断提高的具体体现。实际上，知识价值的时效性包括及时性和持续性，它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

知识价值的**多维性**，是指主体的人对知识价值客体多种多样的需要和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主体人不仅有衣、食、住、行等自然需要，而且有政治、法律等社会需要，多种需要形成各

种各样知识价值关系。知识价值关系的**多维性**，不受具体维数限制，尤其是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扩大，知识价值的多维性也会不断扩大。实质上，知识价值的多维性是人的本质的全面性，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全面性意味着多维之间的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相互统一。

知识价值的**独特性**，是指依知识价值主体人的不同层次而表现出来的每一主体对知识价值客体需要的特殊性或个性。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同群体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价值关系，如某民族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心理，使这个民族表现出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知识价值个性；不同的个人，由于社会地位、需要、利益和生活上的个性差异，通过知识价值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更为明显。因此，在知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知识价值的表现是多层、异向、不同质的。

知识价值的**目的性**。知识价值能够被看作是需要、期望和兴趣，能指导人们在设定目标、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和估计风险中作出决定。也正是知识价值决定了人们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和行动等。

除上述特性外，知识价值还具有客观社会性、主体主导性和潜在性等。

（三）知识价值的类型

知识价值有多种分法和多种类型。从某个时点上对知识价值的认同与认定划分，知识价值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数量型知识价值。即对体现知识价值的事物作出精确的数量计量的认同和认定，这是知识经济学领域以必要的知识为尺度的知识价值认定与认同。它清晰度高，一般用货币等经济数字计量。第二种是规范型知识价值。为发展知识经济制定的各种政策、制度、法规、准则等就是知识价值的体现。它具体表现有软硬两种形式：软化（非强制）认同与认定的道德性知识价值形式；硬化（强制）认同与认定的法律性知识价值形式。这两种形式好与坏、是与非比较明确，但一般

难用精确数字计量。第三种是意向型知识价值,这是一种既不能从数量上精确度量,又不能给予具体规范性权衡的知识价值意向。如我国知识型企业联想集团公司的名誉、资信等,它多是只表现为人们的一种意向、形象、内心评价等。

从知识价值主体人的需要划分,有知识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综合价值(物质—精神综合价值)三种,所谓知识的物质价值,是指知识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如知识的经济利益、物质生产与生活、肉体生理的维系、生态条件、社会人身保障等。在知识的物质价值中,又有物质消费价值与物质生产价值。能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叫知识的物质消费价值,如营养知识在高级饮食消费中的价值;能满足人的物质资料生产需要的价值,叫知识的物质生产价值,如高技术知识在自动化设备生产中的价值等。所谓知识的精神价值,是指知识对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如知识对人们的娱乐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种种心理的满足、理想的作用、志趣的联系等。知识的精神价值还可分为精神享受价值和知识生产价值。知识的精神享受价值包括知识艺术品鉴赏、求知得知、知识经济利益实现的满意等,它是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自我实现;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对知识产品进行储存、传播和新的创造,具有这方面性质的精神现象、活动及其物化形式,就具有知识的精神生产价值。所谓知识的综合价值,是指知识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共同需要的满足,或知识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这种知识价值含有精神和物质两种价值各自不能完全包含的境界,如知识的社会价值、知识经济实践活动的价值、知识推动全面发展的价值等。

二、知识价值观的变革

知识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知识经济深层结构的观念体系。它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又对知识经济基础有着重大的反作用。在

此过程中,既要看到知识经济增长中的变革,促进新的知识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又要看到新的知识价值观,把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对人们进行知识经济活动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加快知识经济发展。

(一) 知识价值观的实质

所谓知识价值观,是人们在知识经济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知识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它本质上是知识经济中客观存在着的知识价值关系的反映。以人为主体的,以知识为客体建立起来的知识价值关系,是形成各种知识价值观的基础。通俗些说,知识价值观是知识价值主体人用以判断和衡量知识价值客体的基本标准和尺度。所以,知识价值观通常是与其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评判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一种知识价值取向准则。如农业经济的价值观体现于劳力和土地占有,工业经济的价值观体现于资源和资金的占有,而知识经济的价值观体现于知识和智力的占有。这也显现了社会价值观的取向和变革。

从知识价值观的实质看,知识价值观具有动态性,并可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在人们需要变化的情况下,知识价值客体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知识价值量的大与小、有价值与无价值、正价值与负价值之间也就会发生转化。如起初创造的大型计算机对人类是很有益处的,它使计算数据的速度和准确度比珠算、笔算和口算都提高了许多。这时作为知识客体的计算机同主体人之间发生联系而形成的效果,是受欢迎的。这也体现了人们采用并获得了大型计算机的知识使用价值。而当电子计算机经过几次更新换代,用高新知识设计与制造的新型电子计算机,比原大型电子计算机占地体积小了,运算速度更快了,准确度更高了,尤其是将要问世的智能计算机,能通过无线收发数据,并从遥远的地方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还会辨认出你的声音、听从你声音的指挥。面对这种新情况,人们自然弃掉旧的计算机,而选用这种新型电子计算机,很自

然，人们的知识价值关系和知识价值观也转化了。

（二）知识价值观的提高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知识价值观应当不断提高和更新。在当前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之际，无论是个人或者群体，在知识价值观的提高和树立上，首先应当注重以下几种观念和追求：

——知识是财富的观念和追求。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比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汇率更重要的发展因素。知识正在成为首要财富，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化和知识产业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1998年已拥有51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就是用高智慧开发软件知识产品而来的。

——“以人为本”的观念的追求。知识与人是不可分的，知识的生产、传播、运用都离不开人，人才是发展知识经济、实现知识价值的关键因素。所以，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意识，建立人才培养成长机制，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局面。

——创新的观念和追求。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开拓创新不但表现在知识生产、知识管理、知识密度高的产品开发及其服务上，而且表现在建立健全知识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知识价值观的提高上。如无锡小天鹅空调器有限公司追求产品创新和个性发展，坚持“非世界先进技术不引进，非国内领先产品不生产”，确保了产品知识价值含量高，销路好，1998年前8个月，销售量递增115%。

——最佳的观念和追求。制造知识产品、进行知识服务、开展知识经济活动的行为和声望等，都应该是最佳的。北京大学方正集团公司“创造最佳效益”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就是最佳知识价值观和最佳知识价值追求的典型。

——优质的观念和追求。一切知识产业、知识型企业和服务业，其知识价值观追求，最终要体现在产品质量高、服务质量好和管理质

量优上，春兰集团在“质量第一、面向世界”的知识价值观的导向下，使名牌产品一举打入世界多个国家，1997年实现销售额120亿元，就是优质观念和追求的实证。

——科教兴国的观念和追求。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战略，它体现了知识价值观，“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得越快越好，知识经济发展也就越快越好，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会越快越好。

三、知识价值的构塑

知识价值的生成与增值过程，就是知识价值体系的构造和塑造过程。在知识经济活动中，构塑知识价值要注重挖掘增长点、选准转化点、抓住闪光点、优化组合点、开发创新点。

（一）挖掘知识价值的增长点

知识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形态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科学利用及知识价值的增长。目前，许多企业通过大量生产某些知识价值低的产品已不再能带来高收益，通过减价或重组资产和保护市场等办法也不能恢复收益。面临这种景况，应当注重扩大知识含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挖掘和寻找知识价值的新增长点。如在炼钢业中，发展最快最能赚钱的部分，不再是生产大量钢锭，而是生产含高科技知识的供特种用途的钢，如用于飞机的涡轮和压缩机圆盘及其他高温元件合金。在塑料业中，高收益不再来自聚苯乙烯这样大批量生产的基本聚合物，而是来自用高科技知识的独特分子化合合法生产的特种聚合物，它可铸成复杂的蜂窝式电话和计算机中的部件等。知识价值提高最快的是高科技企业，如美国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95”或“办公室软件97”就是一张光盘或软盘，光盘是用聚碳酸酯做成，物质成本每张大约3元人民币，可一张“办公室软件97”光盘价格是8000元人民币，这明显看出了知识的价值之高。这些产品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价值，就是

因为企业挖掘了知识价值新增长点,把精力放到用专门知识提高产品知识含量和服务质量上,相应地也提高了知识价值。

(二) 选准知识价值的转化点

在知识经济活动中,运用知识的关键就是把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价值高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知识价值的转化。故此,要首先选准知识价值的转化点,也就是选准知识价值增与减之处。尤其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之际,个人或集体在知识价值的追求上,必须转轨变型。要克服“短期行为”的知识价值意识,树立知识价值长远目标和更高知识价值追求意识。要看到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服务,其知识价值增减的转化点不尽相同,必须认真研究和选择。日本的本田汽车公司,是80年代从汽车业脱颖而出的明星。可是,随着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碎,本田汽车公司赖以生存的轿车销售额迅速下降,1995年该公司汽车销售额竟滑落到日本汽车行业第五位,而且衰退兆头还很严重。在这危机关头,公司新上任的总裁敏锐地意识到,由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田公司必须进行转轨,于是决定用高技术知识开发跑车新产品,很快开发出一种传奇式的以轿车为基础的体育用车,人称“重塑车辆”,深受国内外客户欢迎,收益大增。由此,本田公司股票也在东京证交所红火起来,到1996年6月底为止的12个月中,上涨了157%,公司年440亿美元的销售额震动日本汽车行业,使本田公司在日本汽车行业排名由第5位上升到第3位,并跃居全球500强企业的第46位。很明显,由于选准了知识价值的转化点,高新知识型“重塑车辆”带来了高知识价值。

应当说明,要选准知识价值的转化点,关键要选准社会需求转换期。以人们对产品需求为例,产品的知识功能多少和质量高低,标志着知识价值在产品中附加的大小和高低。人们的社会需求往往从对产品的数量需求转向对产品的功能和质量需求。这种需求在任何国家、

地区、民族、家庭中都会表现出来,差别仅在于什么时候(转换期)到来。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如一个家庭已经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录像机,当家庭经济收入再增长一倍的时候,不会考虑再买一套彩电、冰箱、洗衣机和录像机(数量型需求),而是考虑买摄像机、VCD和电脑等(功能型需求)。所以,转换型(转化点)的特征是收入增长一倍以后,不会产生对同种产品的倍增的数量需求,而会产生对知识型新产品或者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这个转换期也是知识价值增加的转化点。

(三) 抓住知识价值的闪光点

知识价值体系是在人们的认同和实践中构塑的。而这里有唤起人们肯定、称赞和传颂等之处,就是知识价值的闪光点。科学家的知识创造智慧与精神;教育家的知识传播学识与品格;企业家的知识运用才干与风度等等。还有知识产业部门的知识产品,知识型企业的高知识密度型产品等等,都可以含有使人们倾倒和认同的知识价值闪光点,也可叫魔力点。如美国设计了一种奇异的皮动潜艇,艇体如蛇似鳗,恰似鱼类的带状尾巴,不仅可以摆动,全身各环节也可以自由扭动,整个潜艇外层包了一层极有弹性并可吸收声、光、热和磁等的皮,行走速度很快,扭动的声音微乎其微,可以逃避各种侦察手段。这种潜艇的设计可以说闪烁着高科技知识价值光彩的魔力点。从知识价值构塑角度来说,体现了既善于捕捉住仿生学的闪光点,又善于追求新知识价值,还善于诱发军事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和肯定。

(四) 优化知识价值的组合点

知识价值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价值体系,在知识价值构塑中,要特别注意搞多元化要素构成,不能单打一。如在知识经济产业结构上,要注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优化组合;在知识经济所有制上,要注意国有、集体和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化组合;在高知识密度产品开发、生产上,要做好效用与花费之间的最佳组合。如从价值工程的

角度来构塑知识型新产品的知识价值,其优化组合点的匹配是处理好知识型新产品功能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按其知识价值规律可选五条捷径:第一条是知识型新产品成本不变,既提高知识型新产品功能,也提高知识型新产品知识价值;第二条是知识型新产品功能不变,既降低成本,也提高知识价值;第三条是知识型新产品功能提高,既降低成本,也提高知识型新产品知识价值;第四条是成本略有增加,功能大有增加,也提高知识型新产品价值;第五条是功能略有降低(或消除多余功能),成本有较大降低,也提高知识型新产品知识价值。从这五个途径看出,通过降低成本和改善功能,都能实现知识型新产品的成本和功能的优化组合及知识价值的提高。

五) 开发知识价值的创新点

知识价值的创新点,是知识价值创造开发之处。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多水平越高,知识价值也相应增值越多。人们的知识价值创新过程,是知识价值目标外在化和现实化的过程。新知识价值目标的确立,包含着创造知识价值活动的因素和动力。人们要想获得现实的知识价值对象,实现知识价值目标,就必须善于开创高知识价值的可行形式,具有开创高知识价值的新技能,还要强化知识价值创新点的投入。

在开发知识价值创新点的形式上,有刷新式和积淀式。所谓刷新式,是指新的知识价值推翻、取代原有的价值,如美国专家正研究一种高知识密集的新建筑材料,当感应力超过额定值的时候会发出警报,这一新功能正是创新知识价值的明显体现。所谓积淀式,是指新的知识价值在更大范围或更高程度上扬弃旧价值,把它的有效成分作为新知识价值的因素继承和发展,使旧价值得以沉淀、升华。如高知识密度的挂壁电视机,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工具,也是计算机的监视器,能够与其他计算机联网,成为一台交互的电视会议设备。

在开发知识价值创新点的技能上,要特别

注重三种新技能:一是具有把现存事物综合的新技能,创造出高知识价值。二是具有研制新产品、新材料等满足人们需要的新技能。三是具有把识别和解决问题联系起来的新技能。

在开发知识价值创新点的投入上,要加强知识经济和科技发展高新化投入。如青岛海尔集团把技术创新、质量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名牌创新、制度创新作为创造高知识价值的投入点,每年仅科研资金就达销售收入的4%,至今科研投入已达16亿元之多。目前,海尔集团平均每1.5天出一个新产品,每一天申报1.8个专利,已形成27个系列7000多个规格品种的国内最大的家电群。从全国来看,近年来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0.5%,仅为世界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5%)的1/3,与西方七国(美、日、英、法、德、意、加)2.2%的平均水平差距更大。由此看出,我国在开发知识价值创新点的投入上,急需研究和强化。

四、知识价值的实现

(一) 知识价值实现的实质

知识价值的实现是指应用知识研究开发成果满足多种需要的实际过程,是隐含在知识成果中的知识价值得以展现出来的过程。知识劳动创造了知识价值,确立了知识能满足人们多种需要的价值关系。但是,在知识研究开发成果完成的时候,除了知识研究开发者个人精神价值(如志向、兴趣、真理认识等)得以实现之外,知识价值的绝大部分还潜藏在知识成果之中没得实现,所以,需要把知识价值从潜在的价值转化为显现价值,转化为应用价值,转化为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用知识来满足各种实际需要、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实际也是知识经济实践活动的复杂过程。就我国各地来说,应当按实际国情、省性、市情,既看到劳力经济、资源经济大量存在和仍有市场前景,又要看到知识的强大力量和知识价值在迅速增值。故此,要抓住知识经济到来的机遇,实施加速赶超战略,通过自己

的知识创新和充分利用世界各地先进新知识成果, 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知识经济水平, 实现知识价值的创造和增值。

（二）知识价值实现的阶段

在知识经济活动中, 知识价值实现的过程一般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知识价值的显现。是指知识经济实践活动的需要, 认识到了某一知识价值的重要性而开始考虑应用某种知识的过程。如生产某种新式宇宙飞船需要某种高科技知识和新型材料, 认识到了这种高科技知识和新型材料生产知识价值的重要性, 并考虑应用这种高科技知识和新型材料。第二阶段是价值目标的确立。这是在显现了知识价值之后, 开始为实现知识价值而进行计划安排和组织筹措的过程。第三阶段是知识可行性的确认, 就是通过一定科学方法, 对拟用知识进行可行性研究, 确定知识价值能否实现。第四阶段是提供知识应用的物质基础。如应用某种高新技术知识生产某种新型自控高速轿车, 把所需的一切物质材料、机械设备等提供齐全。第五阶段是建立人们的承受心理。对于大型知识项目的采用及其知识价值的实现, 人们的心理状态制约着知识价值的实现过程。所以要通过各种形式, 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意识, 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三）知识价值实现的条件

强化对知识的需求。知识价值实现的关键是靠社会需求。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但是, 这种需求往往受到物质条件和实践水平的制约, 也就制约着知识价值的实现。为此, 要克服需求上的障碍, 做到三个强化: (1) 强化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认识, 懂得没有知识价值的提高, 就不会加快知识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 (2) 强化人们投身科教事业积极性, 懂得没有科教事业的发展, 就不会加快知识的创造、传播和运用, 也不会加快知

识价值的实现; (3) 强化知识产权等法制建设, 懂得没有对知识劳动者及其成果的合法保护与及时转让推广应用, 知识价值就很难实现。

建立知识价值实现运行机制。要使知识价值得以实现, 必须在知识经济活动中建立良好的科学决策机制、资金投入机制、人才建设机制和适度调控机制: (1) 知识经济活动的好坏和知识价值的增减, 关系到各级领导层的认识水平和科学决策能力的高低, 要想在实现知识价值进程中趋利避害, 必须加强各级领导部门对知识经济规律及其价值转化工程的学习研究, 努力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系统化和程序化。(2) 基础研究是知识创造、生成的关键处, 目前我国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金投入不足。1997年我国科技活动支出总额为961亿元, 其中研究开发经费为368亿元, 约占国民总值的0.29%, 既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投入的科技研究开发经费中, 55%分配给政府科研机构, 30%分配给企业。而发达国家却把90%的资金分配给企业。韩国过去曾是政府投入为主, 近些年发生逆转, 民间投资高达80%。我国应当建立有利于发展知识经济和知识价值实现的资金投入运行机制。(3) 实现知识价值和发展知识经济需要有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群体。尤其需要有高等数学知识、计算机基础知识、外语与社会科学知识及知识管理的人才。这就需要建立新的适于知识价值实现的人才选拔、培养、交流、激励机制, 用新的机制调动人才的创造性。(4) 在知识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种人、财、物的支持和保证, 故此, 要建立适度的调控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将知识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加快知识价值的实现。●

责任编辑: 冯 生

现代西方一般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

□张书琛

(广东商学院现代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39-06

现代西方价值理论不但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植根于时代背景和思想传统的当时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哲学和科学自身发展状况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和价值学(这里将价值哲学和价值学统称为“一般价值论”)是哲学和科学的双重运动而又彼此接近的必然结果。

一、西方哲学的困境和价值哲学的兴起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至80年代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产阶级的虚伪,通过反复的、无休止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残酷的殖民政策和国际战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的“理性的图画”被撕破了;被称为“非理性主义”(实质上是非理智主义)的人本主义各派(如价值学派、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生存主义等等)也随之兴起,成了与作为传统理性主义之现代形式的科学主义相抗衡的哲学两大思潮之一,并从此形成了双峰对峙、二元演进的局

面。同时,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1848年)之后,在政治上反抗资本主义的压榨、在经济上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的工人阶级,开始以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发动了联合攻势。随着两大对抗阶级价值冲突的升级,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方面的问题也随之突出出来,价值问题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关注。价值哲学也应运而生。正如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立者文德尔班在当时所说的那样:价值哲学不是与世无争、面壁虚构的,而是和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一切活生生的知识密切相关、处于不断交流之中的。①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向传统的哲学提出了挑战,现代西方哲学正是适应解决现实生活中价值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状况来看,在19世纪下半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看,古代和中世纪的那种作为各种知识之总汇的状况,自近代以来已经被逐步地改变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中的许多专门学科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

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专门学科，已经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而一门接着一门地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了。按文德尔班的说法，哲学似乎像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李尔王一样（李尔王将自己的王国全部分封给三个女儿），自己什么具体的研究对象也没有了。面临这种困窘的状态，在 19 世纪末的德国出现了两种较为流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以哲学史代替哲学；另一种倾向是主张把哲学归并到其他经验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知识学中去。这两种哲学倾向实际上都是要取消哲学。

那么，哲学的出路何在？文德尔班在两股取消哲学的横流中，极力维护哲学的独立地位。他认为，哲学史只是哲学的一个工具，是属于哲学的一个部分，因而哲学不能归于哲学史。哲学不能也没有必要跻身于特殊的经验科学之中，“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如果哲学想要独立存在并能满足一般意识和专门科学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哲学就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要求，从价值着手，对一切价值作重新评价，去解决那些在专业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康德已经证明形而上学之路行不通了，“哲学只有作为普通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②

面对现实对哲学的挑战和两股取消哲学的横流，文德尔班从价值问题这一方面为西方哲学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应当说，这在西方哲学面临双重挑战的情况下，是西方哲学家当中所作出的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既很有针对性地应答了西方社会现实所提出的挑战，又维护了哲学的独立地位。

与文德尔班把价值概念提升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价值

论的哲学体系不同，更多的哲学家（如摩尔等）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仍然使用系统“伦理学”、实践理性学说中的“善”的概念去研究已经日益突出的价值问题。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的概念虽然早已超出了狭义伦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学说）中“善”的本义，但仍难以全面地涵盖各种价值问题和一般价值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善”作为一种传统的概念工具，又适应说明和解决问题的需要，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又继续被运用这个旧概念的新时代的哲学家最大限度地扩展、泛化了，狭义伦理学中作为“恶”的反义词的“善”的概念，被扩展、泛化成了可以囊括一切正面价值的一般价值论的概念，基本上与“好”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相等同了，实际上也就成了“价值”（正价值）概念的代名词了。同时，这些哲学家们又以这个已被扩展、泛化、一般化（普通化）了的“善”的概念去同化、统一其他学科领域的个别性的价值概念，而且又把“善”等同于“内在价值”，并进而又用这个提升为一般性价值的“善”的概念去给“美”下定义，“美”被定义为人们喜爱并且希望得到的某种具有“内在价值”的整体。

价值哲学的兴起及其在哲学各分支中的应用和推广，以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伦理学中“善”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泛化，一方面促使一般价值论逐步形成，另一方面又通过一般价值论向各门具体的特殊学科的运动、推广，促成了哲学与具体学科的趋近、融合。首先是与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包含着特殊价值概念和价值思想的、因而与一般价值论有较强亲合性的具体学科相趋近、融合；接着又逐步与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分支学科相趋近、融合；最后又延展到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从而使价值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联成一体。

二、哲学与科学在一般价值问题上的汇合

在近代一系列的重大自然科学成果改变了传统的宇宙概念和世界观之后，达尔文进化论的迅速传播又进而冲击了传统的人的概念和人生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对人的研究由宗教最终转到科学中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又被一些人们当成了可以到处流通的货币，把人也只看成生物界的一员

（尽管可以是较为特殊的一员）。这样，古代哲学中对人的尊崇不见了，连中世纪由神学赋予的人在尘世中的特殊地位也被取消了。在生物进化论的自然必然性的因果链条中，似乎没有人的特殊价值存在的余地了。这种自然主义的进化观首先引起了人文科学家的恐惧和不满。他们为了摆脱人被贬低为动物的危险，从各自的使命出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价值论的旗帜之下，研究人的不同于动物的特殊价值，寻找人类在自然界中（当然不是在自然界之外）的位置，从价值方面去理解人生，努力在自然中为人类找一个舒适、惬意的家。这就促使各方面的人文科学家（如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等）去着力研究本学科中的特殊价值问题，促进了这些学科中的价值理论的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也发现自己学科中有着一些价值问题。又至50年代中期，连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各学科也发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有价值问题。这样，就以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不适当的推广及其导致的极端结论为契机，各门学科中的价值理论先后在本学科内发展起

来了。

像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在研究了具体物体之后又进而寻找各种物体的统一性及万物的始基一样，这些科学家也在研究本学科中价值问题时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并进而发现了各种价值的统一性，由对个别价值的研究扩展到对一般价值的思考、追寻。同时，他们在研究特殊价值之时，也感到需要有一个能够贯穿所有这些特殊价值问题的一般价值理论，因而也希望能找到一个能打开各学科价值问题之门的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的研究就都集中在解决一般价值这个问题上了。大家都承认有一个涵盖所有特殊学科的一般价值问题，但又感到凭自己特殊学科的价值概念难以解决一般价值问题。而当时从哲学方面走来的价值哲学正好堪当此任。于是，哲学和科学这两路大军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一般价值论的旗帜之下了。一般价值问题研究一时间也就成了哲学和科学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了。一般价值概念成了解决价值方面的共同问题和诸多特殊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尽管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他们毕竟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视角、观点、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因而，争论、论战自然不可避免，五花八门、异彩纷呈的各种理论也就随之出现了。但从这两路大军区别的角度看，一般可以把从哲学角度、以哲学方式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统称为“价值哲学”；把从科学角度、以科学的方式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统称为“价值学”。当然，这两种研究方式在实践中又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同一学派也可能同时运用这两种研究方式。即使是“价值学”，也

有较为浓厚的哲学意味。因而，我们可以把二者统称为一般价值论或哲学价值论，也可统称为价值哲学。

三、一般价值论的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过程

价值意识作为一种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是随人类的诞生而一起产生的，它最初是以原始宗教、神话的形式出现的。至公元前5世纪，最初的价值理论已经产生，并成为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哲学史上价值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起于普罗泰戈拉，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代表，终于亚里士多德。近代从洛克、休谟开始，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为高峰，终结于费尔巴哈，为哲学史上的第二个价值理论发展的高峰。其中，休谟提出的著名的“休谟法则”，成了现代一般价值理论努力解决的难题和主题之一；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则为现代价值哲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

但是，一般价值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兴起的。

价值哲学的开创者是称自己的哲学为“目的论唯心主义”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洛采。他于1864年出版的《微观世界：论自然史与人类史，试论一种人类学》，可认为是价值哲学提出的标志。他把可提供观察和研究的领域分为经验事实、普遍规律、各种价值三大领域，并且认为价值才是一切的目的，而经验事实和普遍规律只是达到价值目的的手段。洛采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进一步发挥了康德的实践理性优先的思想，把价值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到了思想的中心地位，从而引出了一个价值哲学学派，所以西方哲学界一般将他看作是“价值哲学之父”。

继洛采把价值提到思想的中心地位之后，洛采的学生文德尔班又把价值提到了哲学的中心地位。作为现代西方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哲学史专家（他的《哲学史教程》至1957年就已出版了第15版），他首先是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的。他认为，从康德到尼采的哲学发展已经指明，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和评价问题；哲学是关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学说，哲学也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文德尔班还把世界分为“事实世界”（亦即“表象世界”）和“价值世界”（亦即“本体世界”）：关于这两个世界的知识也有“事实知识”（亦即“理论知识”）和“价值知识”（亦即“实践知识”）；而这两个世界、两种知识在科学体系中则分别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在这两个世界、两种知识、两类科学中，前者（事实）是从属于后者（价值）的。文德尔班的这些思想，曾在他的《序曲》（1884年）、《历史和自然科学》（1894年）、《哲学概论》（1914年）、《哲学史教程》（1892年）中多次加以阐述。他把哲学的对象归结为价值和评价问题，这一观点对后来影响不大。但他的关于事实和价值的二重分离的观点在一般价值论的研究中却有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后的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相对主义都持这种二重分离的立场。60—70年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力图消除这种二元分离，但二元分离的观念至今仍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文德尔班提出的上述观点，又被他的学生李凯尔特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与文德尔班稍有不同的是，他在

1921年出版的《哲学体系》一书中，提出了“三个王国”的理论。他认为，第一个王国是由主体（自我）和客体（世界）构成的“现实王国”，掌握这一王国的方法主要是“说明”。第二个王国是超验的“价值王国”，掌握这一王国的方法主要是“理解”。第三个王国是将前两个王国结合、统一起来的“内在意义王国”，掌握这一王国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主体的感受活动和评价活动将前两个王国统一起来，并找出价值的“解释”。他还指出，说明主体和客体怎样统一在现实世界中固然也是哲学的任务，但真正的哲学始于价值问题开始的地方，而找出“内在意义”则是哲学的真正任务（目标）。

李凯尔特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哲学体系而最终未能如愿。从他逝世以后，以建立价值哲学体系为目标的巴登学派开始衰落。巴登学派的后继者闵斯特贝尔格于1907年出版《价值哲学》一书，这是第一部以“价值哲学”为书名的专著。1932年，巴登学派的又一位后继者科斯又以《价值哲学》为名出版了一部专著。但他们建立价值哲学完整体系的尝试也都未成功，这两部以《价值哲学》为名的专著影响也不大。根据有关资料，最早使用“价值哲学”或“价值学”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拉皮埃和德国哲学家卡尔·哈特曼。拉皮埃在1902年出版的《愿望的逻辑》使用了“价值哲学”（VALUE—PHILOSOPHY）这个概念，卡尔·哈特曼则于1909年出版了《价值学大纲》。在洛采之后，德国哲学家尼采则以意志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将意志的活动作为精神活动的中心，将意志的实现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继叔本华把意志作为世界和人生的本体之后，

将作为“生存感觉”的意志作为价值的评价尺度，认为驱动人去积极行动的权力（强力）意志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者即“超人”。他在《查拉图斯特拉》（1883—1885年）一书中强调：“让世界围绕新的价值发现者转”，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以新的价值体系去摧毁传统的没落的价值体系。唯意志主义的价值论虽然不像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那样，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但它却开创了近代非理性主义（非理智主义）的传统，给以后的人本主义及实用主义哲学以很大的影响。

大致与德国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同时或稍晚的影响较大的学派，则是从心理学出发研究一般价值的奥地利的“现象学的价值论伦理学”学派。奥地利的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同时也是注意心理分析和伦理研究的哲学家，可以说是价值论研究中“心理主义”的典型代表。

奥地利价值学派的开山祖师是意动心理学的鼻祖、奥地利的布伦塔诺。布伦塔诺在他的《道德知识的起源》（1889年）一书中，将人的心理现象分为表象、判断、情感活动三种，同时又认为价值是独立存在的现象。而人对价值的把握，只能通过爱与恨、适意或不适意的情感活动；并且这种情感活动对价值的判断也是具有自由性质的，这种情感活动的自由性正是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的源泉之所在。

布伦塔诺的价值论思想被他的几个学生（如迈农、埃伦费尔斯、胡塞尔、弗洛伊德）继承下来，并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发展。迈农在《价值论的心理学——伦理学探讨》（1894年）一书中认为，足以使我们喜欢、产生快乐的东西

就是有价值的，他把价值理解为一种产生快乐的感情的对象。埃伦费尔斯在《价值论体系》（2卷，1897—1898年）等书中则认为，一种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并能产生快乐，而在于我们追求并垂涎于它。舍勒则认为，价值既然和存在相分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意向性的感受，在感情中加以直观的把握。胡塞尔和弗洛伊德的价值思想也是十分丰富且各有特色的。

在美国，新实在论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论十分引人注目。1906年，美国哲学家乌尔班的《评价：其性质和规律》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英语系国家同时也是美国关注一般价值论的开始。新实在论主要代表之一、美国哲学家培里在1926年出版的《价值通论》中，以价值兴趣说风行哲坛，也是一般价值论领域的鸿篇巨著。

在英国，一般是从传统伦理学的“善”出发，并对其加以扩展、推广而由传统伦理学趋向一般价值论的。其中，在摩尔的《伦理学原理》（1930年）中，关于“善”是不可定义的，“善”是可以通过直觉把握的，以及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批判，在价值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在法国，生命哲学则发挥了尼采的价值观并影响了以后的非认知主义价值观和存在主义价值观。此外，带有唯心主义和宗教意味的雷蒙·博兰、让·皮塞勒和勒·塞纳的价值论也值得注意。前者认为价值是创造意志的表达，后者则把价值看成是自我与自我之外的来源（如上帝等）的关系或“关系的统一性”。

一般地看，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在德国主要是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这两个价值哲学学派，在奥国则是现象

学价值论派，在英国则有摩尔的对“善”的研究。这段时间主要是从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三个方向上研究一般价值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地位以及应如何对待价值之类的问题。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哲学学会理事会为该学会于1913年12月召开的会议提交的论题，对美国的价值论的“热化”并在此后成为一般价值论研究最富成果的国家，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至30—40年代，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涉及到了一般价值问题。40年代后，语言、心理、伦理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普遍承认存在着将各种价值统一起来的一般价值，并且讨论趋于热烈，观点也很丰富。至50年代中期，对战争原因及过程的痛楚的回忆和思考，以及世界格局（两大阵营的形成）的变化，使各学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价值问题上，并且缩小了研究范围，更接近了实际。价值观念和价值冲突这类较为具体而又反映时代横剖面的问题，由于两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冲突的明朗化而受到了各学科的普遍重视。同时，通过对自然科学技术在战争中非人道主义的应用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反思，“自然科学只处理事实而与价值无缘”的传统自然科学观也受到了冲击，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注意并研究本学科中的价值问题，价值研究已不仅仅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事了。这又使价值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更全面的研究。至本世纪60—70年代，事实和价值二元分离的观点开始受到批评，二元对应的观念开始被打破。在政策研究、决策研究和关于行为、认识的研究中，已经把事实和价值实际地综合起来了。而哲学，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马斯洛的事实价值——价值事实

费尔巴哈论人的社会性

□ 杜志清

河北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45-04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学，把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的哲学处处显示着人本主义的性质，他所推崇的人既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纯粹“自我意识”，也不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感有欲望的真实的人。但是人们也看到费尔巴哈过多地在自然界中考察人，更多地注意了人的自然基础和自然属性，为此受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传统观点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是生物学上的实体，这种批评无疑是切中了费尔巴哈人学的要害。然而，我们统观费尔巴哈的人学理论，也欣喜地发现，他在某些方面也注意到了人的社会性。他明确指出人只有自然属性是不够的。他说，不能够把人从自然界中抽出来，但是“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①

的研究，则是企图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的可贵的努力。在 60 年代的苏联和东欧、80 年代初的中国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则是价值论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转折，尽管起步晚，还不够深入，但却预示着价值论研究的一种新的前景。

2. 刘继：《现代西方价值理论概述》，《人文杂志》1988 年第 2 期。

3. 王克千：《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述要》，《辽宁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

4. [美] 弗兰克·梯利：《伦理学概论》，何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5.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1992 年版。

6. 江畅：《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7. 冯浚：《当代法国的价值哲学》，《哲学动态》1992 年第 7 期。

8. [美] 埃德尔：《二十世纪美国的价值概念及其发展历程》（上、中、下），《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 年第 7、8、9 期。

责任编辑：罗 苹

①参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50—51 页。

②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 46 节，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主要参考资料：

1. 杨慎钦：《价值学简介》，《现代外国哲学》③，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一、人不能是孤立的，要生活在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

费尔巴哈认为，人要依赖于世界，人之所以感到自己是依赖于世界的，就是因为人首先感到要依赖于别人，另一个人是自己跟世界之间的纽带。只有借助于别人，才使自己跟世界和解、和睦。他说：“对我来说，没有了别人，世界就不仅显得死沉和空虚，而且也显得无意义和无理智。人只有在别人身上才了解自己和意识到自己；但是了解了自已，才能了解世界”。^②在他看来，一个单自为地生存着的人，他必定既不了解自己，又没有分辨力。所以他把人看作人的第一对象。他强调指出，人之所以能存在着，应归功于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人之所以能够是人，却应归功于人。没有别人，人无论在形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无所能的。费尔巴哈强调了人和人的联系。他十分赞赏人的联合的力量，认为人的联合的力量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不同于每个人各自的力量。人的力量各自看来是有限的，结合在一起却成为无限的；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人类共同活动、共同参与的理性、科学是无限的。“机智、敏慧、幻想、感情、理性等一切所谓心灵的力量，都是人类之力量”。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发生冲撞和摩擦的场合下，机智和敏慧才燃烧了起来；只有在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场合下，才产生感情和幻想；只有在人与人说话的场合下，只有在共同的行为——谈话中才产生了理性。在这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人的智慧、情感、幻想和理性无一不是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产物，这正是在人的社会联系中考察人。他进一步指出，人不能孤立自存，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③他说，人的本质是一个，它的实际存在是无限的、相互补充的多样性，以便显示出本质之殷富。而本质之中的统一性，是实存之

中的多样性。他看到了人的本质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人需要和其他人交往，“只有许多人结合在一起才成了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才像人所应当是的和能是的那样”。^④这就是说在社会领域中，每个人各有缺陷，只有人们在互相交往过程中互相补足，才能成为完善的人，“交际有助于改善自己和提高自己”。他十分强调爱和情感是使人完善的力量。夫妻之间互相补足，会共同表现出类或完整的人，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补足，因为友谊是美德的表现。正如古人所说，只有德者之间才有友谊。友谊能够以一个人的德行来补偿另一个人的缺点。费尔巴哈还认为，人一方面为了自己而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了别人而生活，为了公众和公益而生活，全心全意为了人类而生活，甚至认为，人的出生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爱。费尔巴哈所说的团体、集体，绝不是人的自然联系，而是社会联系和关系；他所说的人与人的交往、友谊和互相补足也是一种社会领域内的社会性联系和关系。

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正是这种作为社会的人所结成的普遍性的关系和联系塑造着人，决定着人的本质。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曾提到，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了理论的基本原则。这说明费尔巴哈试图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找人的本质，这比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分析人更显得可贵。但是，他毕竟不懂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关系，因而我们不能说费尔巴哈真正理解了人的社会性本质。

二、人的本质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

费尔巴哈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人的本质是社会生活和环境的产物，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他指出，人的本质不允许离开他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受着生长他和教育他的时代的决定，人只能在幻想中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但改变不了时代所造成的本质。人之所以

为人，所以为他现在本质上所成为的样子，并且思想行为受着自己本质的制约，都是时代和实际生活环境造成的。他说：“我由于自我活动，由于我的工作，由于意志努力，无论变成了什么样子的人，我之所以为我，我之所以成为我，却仍然只在于同这些人、这个民族、这个地域、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的联系当中，仍然只在于同这些环境、这些关系、这些状况以及构成我的传记内容的这些事变的联系当中”。⑤费尔巴哈确实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意识到实际生存环境、教育、时代和自己的实际活动对人的本质的决定性影响。费尔巴哈在考察宗教产生时，阐述人的转变，他说，人由自然界进入社会，就由一个物理的实体变成一个政治的实体，于是那些政治的、伦理的、抽象的力量，法律、舆论、荣誉、道德的力量，就成了人的意识和依赖感的对象，于是“人的物理上的存在成了他的人本的、公民的或伦理的存在的附属品；自然力量、支配生死的力量被贬抑为政治力量或伦理力量的一个附属品和工具”。⑥在这里，费尔巴哈看到了人在自然界中和社会中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和存在状态，并且在社会中是更高一级的公民的存在状态，人要受着政治、法律、道德这些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并且社会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要比自然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大得多。他特别感到了政治对人的影响。他说，他那个时代，无论何人，甚至“最中立不倚的人，都会违反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归属于某一党派，即使仅仅在理论方面”。⑦他认为那个时代，政治兴趣吞没了其他一切兴趣，政治事变使人们经常处于紧张和兴奋之中，那个时代人们都要为了政治而把其余一切都丢到脑后。众所周知，费尔巴哈曾因思想激进而被当局赶下大学讲台。他沉痛地回顾那段经历，说自己在乡村孤寂中度过了整整12年，只埋头研究和著述，因而失去了言谈和口头讲述的才能。他诅咒时局的反动，他说那个时代一切社会关系都如此沾染了毒素和病菌，以致只有放弃一切官职，

一切公务，甚至一个编外讲师的位置，才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健康。他从亲身经历中，真切地感到人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中，社会政治对人们的制约和影响是巨大的。费尔巴哈注意到人的生活环境、与他人及外界的联系、个人的实践活动及经历，特别是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影响作用，这里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三、人的本质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的产物

费尔巴哈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人，他提出这样的口号：艺术、宗教、哲学或科学，只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象和显示。人，一个完善的、真正的人，只要具有美学的或艺术的，宗教的或道德的，哲学的或科学的官能的人，不会排除本质上属于人的东西。他注意到了科学、艺术、哲学等社会文明对人的本质的影响。甚至把哲学、科学、艺术看成人的本质的体现。他还看到人是变化的，在学习、在发展，并且常常发展一些新的品质，人的改变和发展和他活动的范围、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更精辟地指出，只具有自然本质的人，还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⑧这种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同时，费尔巴哈意识到了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认为人的本质、人的属性同祖先有关系，特别是与最近的世代和祖先有关系，如果往上追溯得太远，就找不到什么踪迹了，就像一个17世纪的人，绝不会成为19世纪的人的父亲一样，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性质上的距离和风俗、习惯、观念、意向上的距离。这说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的本质就受着这种背景的影响和决定。他还认为人的知识素质是发展变化的，是可以世代积累的，他指出，个人的知识意志是有限的，但人类的知识意志是无限的，“我感到困难的事却有别人感到轻而易举；对某一个时代来说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对下一代来说，却就是可思议的和可能

的事了。” “我的生活被束缚于一个有限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则不然”。^⑨他指出，人类之历史，正在于继续不断地克服在某一个特定时代里被认为是人类之界限，从而被认为是绝对而不可逾越的那些界限。关于这一点，各门科学，特别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历史，都提供了最令人感兴趣的例证。它们可以证明人类的无限性和人类的历史发展。他明确指出，人类是有文化史的，甚至动物和植物在时间进程中也在变化自己和改进自己。有许多东西，我们祖先不能做到，也不能知道的，我们现在做到和知道了。他举例说，哥白尼临终时，懊恨他一生没有看见过水星，尽管十分渴望，也十分努力。而现在的天文学家用优良的望远镜，连白天都能看到水星了。他肯定地认为：“人的欲望，只要不是幻想的，就可以这样在历史过程中，在将来实现出来”。^⑩他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智力、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这无疑是一种辩证思维。他还运用这种观点看待社会政治领域的状况，“我们要拿人类和人类本性来代替神性，拿文化来代替宗教，要拿人类的将来代替天国和彼世。”他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费尔巴哈也关注到了人的欲望、追求、利益、需要等社会心理因素，并着重论述了人对幸福追求的合理性，使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他的人是在社会舞台上活动着的真实的人。费尔巴哈还提到人和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的目的应该是造就真正的完善的人，即政治上和宗教上都能自由的人。

费尔巴哈能够在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认识人，分析人的本质，这使我们感觉到，他的人不是纯粹的生物学实体，不是仅仅具有自然属性，而是还具有社会属性的。尽管

这方面的论述还很不够。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把批判宗教作为终生的事业，为了批判宗教的需要，他当然要着重地论述自然界的客观性和物质性，论述人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以及人的自然属性。特别是他长期隐居穷乡僻壤，远离社会政治生活，他忽视人的社会本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发现，费尔巴哈在谈到人和自然界的的关系时，也绝不是仅仅看到人对自然的消极依赖，而是看到人和自然的互相作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影响，他说人们“照自己的意识，为自己的利益，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然界”。自然界中诸多植物，甚至动物在人的培育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以致在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它的原形。他说，这不能归功于神力，而只能归功于人的活动和努力。不难看出，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对自然界的主导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费尔巴哈没有能够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甚至他离这一科学论断还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能够在社会关系和联系中考察人，能够在社会环境、文明发展中观察人，使人们从他的人的学说中体会到一些历史的浓重感，是值得欣慰的。●

①③⑧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185页，247页。

②④⑤⑥⑦⑨⑩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12页，190—191页，667页，470页，503页，187页，781页。

责任编辑：罗 苹

引入负名词的三段论系统

□程仲棠

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49-04

本文主要讨论一种历来被人们忽略的现象：在三段论系统原有基础上，再引入含负名词（或称负概念）的直接推理形式，即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就会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些不符合三段论定义和三段论规则的新三段论式。

一、经典三段论系统不含负名词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三段论系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包含负名词。拙著《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下文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或章节）论证过，“亚里士多德逻辑不同于后来的传统逻辑，它没有引入负名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第 42 页）。根据是：亚氏在《分析前篇》所构造的三段论系统是一个公理系统，其全部公理和定理包括了三段论式和换位法（均陈述为蕴涵命题），但不包括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这个系统根本就没有含负名词的命题（参看第二章前三节）。

亚氏以后，三段论式由蕴涵命题转变为推理形式或推理规则，三段论系统由公理系统转变为自然推理系统（下文所谓三段论式也是指推理形式，所谓三段论系统也是指自然推理系统）。但至

少直到 18 世纪初，三段论系统仍然保持亚氏逻辑的特点，即不引进负名词和有关的命题和推理形式。这有两个证据：一个是中世纪由威廉首创的逻辑歌诀所刻画的三段论系统（第 132—137 页），另一个是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所构造的三段论系统（第 147—158 页）。在这两个系统中，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既不是证明的工具，也不能获得证明。

我们可以把不含负名词的三段论系统称为经典三段论系统，把属于这个系统的三段论称为经典三段论。传统的三段论定义和三段论规则，就是经典三段论系统的产物。

在我国，三段论定义表述得最严格的算是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3—154 页）。为了保持本文用语的一致性，我把它改写如下：三段论是这样一种推理，它由三个直言命题组成，两个作为前提，另一个作为结论；并且其中有也只有三个不同的名词，每个名词在两个命题中各出现一次（本文所谓名词是指表示类的普遍名词，相当于普遍概念）。这个定义就是不含负名词的三段论的形式结构

的概括, 可称为经典三段论定义。

在逻辑教科书列举的三段论规则之中, 只有下列四条是基本的: 1. 中项至少要在一个前提中周延。2. 前提中不周延的名词在结论中不得周延。3. 从两个否定前提不能得结论。4. 结论是否定的, 当且仅当有一个前提是否定的。其余的或为三段论定义所蕴涵, 或可从四条基本规则导出。不过, 两条常用的导出规则却也值得一提。它们是: 5. 从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结论。6. 若有一个前提是特称的, 则结论也是特称的。这些规则实际上是用完全归纳法对经典三段论系统 24 个三段论有效式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果, 可称为经典三段论规则。

应该指出, 经典的三段论定义和三段论规则未必完全适用于非经典的即包含负名词的三段论系统。负名词的引入肯定会导致三段论的形式结构产生某种合乎逻辑的变化或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有的框架。

二、负名词引入后, 三段论形式有什么变化?

亚里士多德之后, 人们把负名词引入直接推理, 建立了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但长期以来, 它们总是置身于三段论系统之外, 与三段论式的证明不发生任何关系。大约是上世纪的逻辑学者, 由于怀疑第二格 AOO 和第三格 OAO 两个式的反证法证明的合法性, 就改用换质法和换质位法进行直接证明 (第 160—161 页)。这是含负名词的直接推理形式被纳入三段论系统, 作为推理规则或证明工具的标志。可惜他们半途而废, 没有推出含负名词的非经典三段论式。在传统逻辑史上似乎还没有人建立过完整的非经典三段论系统。

非经典三段论系统就是在经典三段

论系统原有的基础上, 再引入全部含负名词的直接推理形式分别作为基本推理规则和导出规则而构成的系统。就三段论式而言, 在这个系统中可证的除了经典三段论系统确认的 24 个经典式之外, 还有一些新的含负名词的非经典式。按照传统逻辑特定的语义解释, 这些非经典式和那些经典式一样是有效的。

非经典的有效式主要有下述两类:

1. 从两个否定前提推出结论者

这类有效式总共有 16 个。其中第一格有下列 4 个式 (“┆” 表推出关系, 读作 “所以”):

①) MEP, SEM ┆ $\bar{S}OP$

按换质位法, 将小前提 SEM 换为 $MA\bar{S}$, 就可化归为第三格 EAO 式。换言之, ①) 式可用换质位法和这个经典式证明。

②) MEP, SEM ┆ $\bar{S}IP$

此式可从 ①) 式导出, 将 ①) 的结论 $\bar{S}OP$ 换质为 $\bar{S}IP$, 即得 ②)。

③) MOP, SEM ┆ $\bar{S}IP$

将 MOP 换为 MIP , SEM 换为 $MA\bar{S}$, 便可化归为第三格 IAI 式。再将其结论换质, 又有下式:

④) MOP, SEM ┆ $\bar{S}OP$

其余 12 个有效式可用传统的缩写记号 (并在附加的括号中注明结论的主谓项) 表示如下:

第二格: EEO ($\bar{S}P$)、EEI ($\bar{S}P$);

第三格: EEO ($\bar{S}P$)、EEI ($\bar{S}P$)、
OEO ($\bar{S}P$)、OEI ($\bar{S}P$)、
EOO ($\bar{S}P$)、EOI ($\bar{S}P$);

第四格: EEO ($\bar{S}P$)、EEI ($\bar{S}P$)、
EOO ($\bar{S}P$)、EOI ($\bar{S}P$)。

它们都可以用换质法和换质位法化归为经典有效式, 就是说, 用这些推理规则证明。

总而言之, 当两个否定前提均为特

称时不可能得结论；但除此之外，无论两个否定前提的形式为 EE、OE 或 EO，都能够推出含负名词的特称结论，产生非经典有效式。

2. 将经典式的前提或结论变形者

按照换质法、换质位法和戾换法，可以将经典式的前提或结论变形，即换为含负名词的命题，结果经典式就会转化为非经典式。如果一个经典式是有效的，那么把任一前提换为蕴涵它或与它等值的含负名词的命题（就是说，前提的变形命题必须是前提的逻辑前件①或等值命题），或者把结论换为它所蕴涵的或与它等值的含负名词的命题（就是说，结论的变形命题必须是结论的逻辑后件②或等值命题），由此得出的非经典式也是有效的。例如：

$$5) \bar{P}AM, \bar{S}AM \vdash SIP$$

这是将第一格 AII 式的前提变形，即按换质位法将大前提 MAP 换为等值命题 $\bar{P}AM$ ，按戾换法将小前提 SIM 换为蕴涵它的前件 $\bar{S}AM$ 而得出的有效式。此式属于第二格。前提或结论的变形可能导致变格。

$$6) MAP, SAM \vdash \bar{S}OP$$

这是将第一格 AAA 式的结论 SAP 变形，即戾换为它所蕴涵的后件 $\bar{S}OP$ 而得出的有效式。

上述三段论式是一种推理模式，每一个三段论推理模式都包括了通过某种代入使其负名词转移或者消失的特例。例如，5) 式包括了下式：

$$7) PAM, SAM \vdash \bar{S}IP$$

非经典三段论式有两个重要特征：

① 每一个非经典三段论式都有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名词（三段论式中的字母在语形学中称为变项，但从语义学看来，每一个字母经过解释就是一个表示类的名词，故这里称之为名词），除 S

（小项）、P（大项）、M（中项）之外，还有负名词 \bar{S} （负小项）或 \bar{P} （负大项），并且负名词只出现于结论而不出现于前提中，或者恰恰相反。这是非经典式区别于经典式的主要特征。如果一个三段论式只有三个不同的名词，并且每个名词在两个命题中各出现一次，即使其中含负名词，它也只是经典式所包括的特例，不属于非经典式。例如：

$$8) \bar{M}AP, \bar{S}AM \vdash \bar{S}AP$$

这不过是第一格 AAA 式的一个特例（通过某种代入即可消去全部负名词，使其原形毕露），不属于非经典式。可见，非经典三段论有特殊的逻辑结构，它们突破了经典三段论定义预设的形式框架。

② 非经典三段论有效式推翻了全部三段论基本规则。例如 5) 式，中项在两个前提中均不周延，违反三段论规则第 1 条。例如 6) 式，大项在前提中不周延却在结论中周延，违反三段论规则第 2 条。前一类有效式的结论都是从两个否定前提推出的，它们违反三段论规则第 3 条。综观两类有效式，无论前提均为肯定或均为否定，结论都可以为肯定，也可以为否定，这违反三段论规则第 4 条。

但它们不违反三段论规则第 5 条和第 6 条。在全部三段论规则之中，也只有这两条导出规则不失为非经典三段论的正确规范。

人们可能会说，既然所谓非经典三段论不符合三段论定义，就不能称之为三段论。其实，与其剥夺非经典三段论的三段论称号，倒不如老实承认经典三段论定义的局限性，即未能预料三段论形式的变化发展，并非对一切可能的三段论形式都具有普适性。非经典三段论式乃是经典三段论式和含负名词的直接

推理形式的合乎逻辑的产儿，是三段论家族的延续和扩张，没有理由只承认父母的合法性而否认其子女的合法性。不能用三段论定义限制三段论形式的发展，把它当作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刑床，凡超越其框架者便一刀切。

人们也不要因为两类非经典式违反某些三段论规则而怀疑其有效性。三段论规则不是无条件的逻辑戒律，其效用也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有人断言：“不可能有不合乎三段论规则而又是形式正确的三段论”（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第179页）。这一断言在经典三段论范围内是真理，在非经典三段论范围内是偏见。不可把三段论规则绝对化。究其实，它们不过是用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经典三段论有效式的形式特征，随着非经典三段论式的成立，某些特征当然不再具有普适性。三段论规则的主要意义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应用性的。它们既不是三段论式有效性的语义学根据，又不是三段论式可证性的语形学根据。但它们的确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简便工具，使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辨别哪些经典三段论式是有效的或可证的，而不必求助于复杂的语义理论或化归（还原）方法。

三段论式有效性的唯一根据是这样——一个语义学原则：一个三段论式是有效的，当且仅当以任何一个普遍名词的外延即任意的类解释每一个变项，都不会使得所有前提都是真的，而结论是假的。从现代逻辑看来，只要将空类排除于变项的值域之外，在经典三段论系统中可证的24个三段论式都是有效的。空类的反面就是全类（即论域），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解释下，若S是空类，则非S（ \bar{S} ）就是全类；反之，若S不是空类，则非S就不是全类。由

此可以推知，只要将空类与全类都排除于变项的值域之外，所有在非经典三段论系统中可证的三段论式都是有效的。以上是就整个逻辑体系而言的。若分别而论，在所有可证的三段论式中，当以任意的类（包括空类与全类）解释变项时，多数式是有效的，少数式是无效的。要使后者变为有效式，必须在前提中引入某一存在假设（例如，若P不能解释为空类，则可假设“P存在”；若P不能解释为全类，则可假设“非P存在”）。经过这样的修正，我们就可以取消对变项值域的全部限制，这时以任意的类解释每一个变项，所有可证的三段论式都是有效的。

拙著按照现代逻辑的观点构造了一个“修正的三段论自然推理系统”（第368—384页），它主要是在经典三段论系统基础上，再引入一个换质规则（SAP与SEP可以互推）和一个词项双重否定规则（ $\bar{\bar{S}}$ 与S可以互换）作为基本推理规则而构成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非经典三段论系统，经典三段论系统则是其真子系统。不过，著者在推演定理时同样半途而废，没有推出本文论证过的非经典三段论有效式。我相信，经过一定的“修正”（即给那些不能应用于空类或全类的式引入存在假设），它们在这个三段论系统中都可以推出，其有效性也可以用文恩图解证明。●

①这依据命题逻辑的复杂假言三段论律：

$$(A \wedge B \rightarrow C) \wedge (D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D \wedge B \rightarrow C$$

$$(A \wedge B \rightarrow C) \wedge (D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A \wedge D \rightarrow C)$$

②这依据命题逻辑的假言三段论律：

$$(A \rightarrow B) \wedge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C)$$

责任编辑：罗 苹

钱钟书史学观念试析

□ 李玉梅

(香港教育学院博士)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53-08

一、引言

钱钟书先生于 1930 年夏，代父亲钱基博先生序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之《国学概论》，①畅论清代之考据②。基博先生云：

儿子钟书，能承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③

钟书先生评鉴章学诚虽曾引起讨论，④要之，钱学自 1979 年发展以来，⑤内容不尽是环绕钟书先生自称之古典文学专业；⑥亦因研究钟书先生史学观念之专题不多，⑦小文遂意叨陪末座。

所谓史学，可以史法、史观分言之。钟书先生治史之法，主要是从语言着眼，⑧每以举大而贯小；⑨夫子自道曰“打通”、⑩曰“阐释之循环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⑪是也。至论其史观，则可一言以蔽之，曰“心态史观”。⑫正如首倡钱学的钟书先生校友郑朝宗先生所称，钟书先生《管锥编》也许是最先引用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谢来尔 (M. Scheler) 的，前者有关历史阐释的理论，后者有关情感心理的分析；⑬甚至有论者称钟书先生“是中国的诗化哲学家伽达默尔”。⑭按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一书于 1960 年问世后，诠释学遂由方法论发展成一哲学。论者以之喻钟

书先生，不啻是道出了诠释学实是钟书先生之治学法门。

二、具诠释学色彩之史法

钟书先生所谓“阐释之循环”，正是诠释学要义之一，⑮而他释之为：

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⑯

又云：

“一解即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与“阐释之循环”均为意义而发。当世治诗文风格者，标举“语言之循环”，实亦一家眷属。法国哲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累积：“其事盖为反复形成；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自种子而萌芽长成耳”。“先已理解者”正“语言之循环”，所谓“预觉”、“先见”也。⑰

钟书先生“阐释之循环”法，复可得三点而言，一曰具体例证，二曰“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三曰“先见”庶几“有我”。兹按序述之。

一曰具体例证。钟书先生曾谓其感兴趣者，只是具体的判例，⑱盖个别见解往往要比系统经得起时间考验：

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

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①⑨}

并具“警观疏记，识小积多”^{②⑩}之功，这亦正是钟书先生《管锥编》成书由来之一。《管锥编》之著作形式，观其《左传正义六七则》、《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则属“体例严整、恪遵古法，凡例最近解诂、义疏，故、训、传、说、记、注、笺、解相间”。^{②⑪}“札记”体裁，意义尤有多说。重视具体例证，论者^{②⑫}以为足可印证王船山所谓。

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②⑬}及章实斋之以“义理太贯”乃“学者之患”意；^{②⑭}甚或称“札记”体可能终于《管锥编》。^{②⑮}“札记”体之擅载具体事例，“积小以明大”，^{②⑯}实是钟书先生所谓“阐释之循环”其中一端。

二曰“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②⑰}史家陈寅恪先生此语，与钟书先生所称“一解即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者所谓“‘沿波’亦无妨‘讨源’”已“上升到哲理的高度”，^{②⑱}实是“阐释之循环”之另一端耳：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桃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②⑲}

从作品与组成的章节词句，引申至作品及其

所以产生之文化大背景，正是部分与整体之阐释循环关系，^{③⑩}也可说是“一个古汉字就是一个文化原型”，^{③⑪}论者尝述《管锥编》中之“人生论”，分运命、生死、饮食、男女、交友、人生百相等为说，^{③⑫}正充分证明钟书先生从字义入手，揭露文化史之多方；^{③⑬}其中以一士之身，释“士”一字，从“名士”^{③⑭}到“千古名士之恨”，^{③⑮}旁及“隐士”，^{③⑯}就俨然展现了一卷历代士人心态史，^{③⑰}犹如史家之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阐释至此，小大本末，循环具见。

三曰“先见”庶几“有我”。钟书先生援引诠释学概念之“先见”而以“先已理解者”、“预觉”释之，论者于此进一步引申：

……解释者领悟作品之时绝不会是一具木头，必然携有某种“先入之见”、“偏见”或“成见”，必然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的前提去把握本文，因而本文自身的自足性就会在解释中具有开放性。海德格尔所谓“诠释学处境”，即钱先生所说：“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③⑱}

托境、有为之主体即“我”。曾为钟书先生援引的狄尔泰认为：

历史世界始终是一个由人的精神所构造和形成的世界。^{③⑲}

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④⑰}

若把此种自身置入的理解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则有“视域”之概念：

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谁这样避而不见自己，谁

就根本没有历史视域。^{④①}

此即钟书先生所称“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④②}亦如史家陈寅恪先生之“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④③}读者既因自身置入作品之中，虽有我之境^{④④}亦与作品融为一体，则批评亦成了作品之一部分。^{④⑤}如是，诠释学要义如“有我之境”与“视域融合”，竟“打通”^{④⑥}了中国学术史上之注疏传统：

清儒的苦心孤诣、极精辟的见地，就生存在既繁且碎的注疏形态里。又可以说，“注疏”既是用，也就是体。钱先生告诫谈艺者未可轻置汉唐注疏，一书之中，三致意焉。而且，自己的一部治学集成《管锥编》，不正是从清理古已有之的注疏入手么？“不信人间有古今”，这在钱老治学思想中又是一种“打通”的方式，而且也是中国学术传统使然……从思想史的立场来看，传统中国思想家表达其思想系统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这就是说，以注解及诠释经典的方式来建立自己思想体系。^{④⑦}

始于“片段思想”之具体例证，终能破体为用，^{④⑧}由“视域融合”而“打通”中国学术史上之注疏传统，其著诠释学之色彩，不亚于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之言：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④⑨}

三、具现象学色彩之心态史观

钟书先生云：

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

一般人并未搞清有没有某种现象、是什么现象，早已“由表及里”，作出结论，找出原因。心析学派的一个原则是：心理现象是 overdetermined，一个简单现象可以有很复杂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人文科学研究也该注意这一点。^{⑤⑩}

又云：

“现象”“本质”之二分是流行套语常说“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愚见以为“透过”不能等于“抛弃”，无“现象”则“本质”不能表示。^{⑤⑪}

钟书先生并提“现象学”与“心析学派”，旁及其具体例证之“有我”分析，落在史学层面之意义，则与“现象学”关系密切之法国哲学，尤以具“新史学”特征之“心态史观”，最为凑泊。

“现象学”，是“关于意识及其活动的本质的描述性科学”，往往被称作“直观主义”。探讨意识，则无分人我，重视时间。诸项俱属“心态史观”之关注范围。

“心态史学”是今日新史学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所谓“新史学”，基本上是指法国史学，即年鉴学派以及在其影响下之史学新潮流。

“现象学”之重视意识、重视描写、重视直观，就“文”言，是文学之创作、文学之评鉴；就“史”言，直是“心态史学”家“通过食物、服饰、习俗……来研究诸心理性态，然后再进而探索人类精神深层的无意识结构”^{⑤⑫}的史学观点。

钟书先生之主“打通”意味着论者所谓“全体才是真理”^{⑤⑬}的宏观角度，恰与“新史学”之强调“总体历史”相呼应。^{⑤⑭}无论空间时间，为学俱可跨越衔接：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⑤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⑥

何况文史同源，更无论矣。⑦

意识描写，诚然见重于“现象学”，亦见重于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⑧钟书先生更认为史学作品实亦有赖诗歌小说等重意识描写者。言为心声，而：

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⑨

盖：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

⑩

故此：

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例。⑪

“遥体人情”实是一种心理学，钟书先生虽意同司马光据野史小说撰《通鉴》，却基于心态之能得以通解故：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 答范梦得 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观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⑫

论者遂迳称钟书先生“用小说家的眼光看古书史”，⑬若是，则钟书先生称《史记·货殖列传》言民生日用，乃新史学精神之首倡者，益见其具“心态史观”之“先见”：

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其云：“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又《平准书》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正同《商君书·画策》篇所谓：“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

理”。《游侠列传》引“鄙谚”：“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汉书·贡禹传》上书引“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马迁传货殖，乃为此“鄙”、“俗”写真尔。道家之教：“绝巧弃利”；（《老子》一九章）儒家之教：“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迁据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鹜远，既斥老子之“眩民耳目”，难“行于”“近世”，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则“崇势利”者，“天下人”也，迁奋其直笔，著“自然之验”，载“事势之流”，初非以“崇势利”为“天下人”倡……又按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专载朝政军事，而忽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

⑭

《货殖列传》固有类小说及“现象学”等重视之意识描写如陶朱公、白圭、诸贤富之独白；皆史迁“遥体人情”之语也。惟更多的篇幅是叙述地区物产等之差异性、⑮“长时段”的“无意识历史”。心态史学认为：

从物质方面（或者说经济基础方面）的最初冲动开始，到保守的社会结构，最后进入心态的长时段囚牢，存在着一种逐渐由快到慢的唯一演变运动。⑯

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⑰

《货殖列传》可说是“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⑱而无论是经济史或心理史，“都是卑贱者和社群体的历史”，⑲有类强调“群众物质文化”⑳的“日常生活史”。㉑钟书先生早在30年代，已有“以思想解释实际生活”之主张，㉒因为“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

⑦ “是精神决定时代 (Spirit taking its time)”。

⑧既曰“时代”，则属“长时段”之“自然之验”、“事势之流”，断非个别之精英历史，抑又可知。钟书先生力赞史迁《货殖列传》遥辟新史学精神，主要在于《货殖列传》实反映了心态史学中之“集体无意识”重点，⑨则钟书先生之具“心态史观”之“先见”，真可谓昭然若揭。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寂静的生活”，⑩每因史家“人人知之，若不必记”之“先见”而成“历史之缄默”。钟书先生特拈出陆游之叹，以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已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有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著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绕得什一，余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吕侍讲《些时杂记》》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缺。”过去习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曩日一法国史家所叹“历史之缄默”，是亦其一端也。⑪

“打通”之余，更重要的，是透现了钟书先生之“心态史观”。盖“无意识的历史”即“无语言的历史”（l'histoire Silencieuse），⑫亦即钟书先生所称：

论古之士勿识史书有默尔不言处

（les silences de l'histoire），参观《史记》卷论（绛侯周勃世家）须会心文外。⑬而按旨撮要，标志题目的《钱钟书论学文选》即有以“人事论”一目为编者。⑭人事之际无非心理学心态史之一端耳。钟书先生论《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外戚世家》，见宫廷内之嫉美妒贤；论《史记·苏秦列传》、《史记·孟尝君列传》、《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史记·平原侯主父列传》，见天壤间之世态炎凉。凡此周于文内非历史之缄默者，钟书先生自更通过评论此等长时段之人际现象，配合“现在”的兴趣，道出永恒的心态主题，从中寻得现实之意义。⑮

四、结语

钟书先生的史法点染着诠释学的色彩，史观则以心态史观最为瞩目。可以说，其史学是一种“现象史学”：

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理由（What ever is, is right and the existence of a thing is its iustification）……

真讲史观的人总是胸襟最宽大的人，最有容量……我以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⑯

简言之，“现象史学”就是古为今用，于钟书先生来说，可谓“史书皆我注脚”；盖自主观言，没有不带观点（或先见、有我）之史家：

我以为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一）野蛮的事实；（二）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所以叫做史家的事实

(Historians'fact) 而不叫做史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 也有缘故: 因为历史现象比不得自然现象, 既不能复演, 又不能隔□, 要断定彼此间关系的性质, 非常困难; 往往同一事实, 两个史家给它以两种关系, 而且都“特之有故, 言之成理”。我们为谨慎起见, 只能唤作史家的事实。③

是故“述古而强以就今, 传人而借以寓己”④并非罕见。另一方面, 自客观言, “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⑤钟书先生《谈艺录》四七云:

《静修文集》卷十一《读史评》: “纪录纷纭已失真, 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 恐有无边受屈人。”与王荆公《读史》: “糟粕所传非粹美, 丹青难写是精神”, 可相发明。《补订一》夫虚说游词, 如《史通·曲笔》、《书事》两篇所纠者, 固无论矣。即志存良直, 言有征信, 而措词下笔, 或轻或重之间, 每事迹未讹, 而隐几微动, 已渗漏走作, 弥近似而大乱真。⑥

六一云:

Lessing 剧本 Emilia Galotti 第一幕第四场有曰: “倘目成即为图画, 不须手绘, 岂非美事。惜自眼中至腕下, 自腕下至毫颠, 距离甚远, 沿途走漏不少”。要之, 既有“先见”, 势必“走漏”, “我既有障, 物遂失真”, ⑦以我为“的”, 创始成终, 历代意识, 现代兴趣。●

①孔庆茂《钱钟书传》, 页32,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年4月。张文江《文化昆仑: 钱钟书传》, 页105, (台)业强出版社, 1993年6月。

②钱穆《国学概论》, 页1至3,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年5月。

③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 转引自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 《中

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0辑, 页303至304,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78年12月。

④参阅1. 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页109, 中华书局, 1984年12月; 2. 胡河清《钱钟书与清学》, 《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 页97; 3. 李洪岩《钱钟书先生论“六经皆史说”》, 《钱钟书研究》第3辑, 页241至264; 4. 林校生《钱钟书史学观刍说》, 《钱钟书研究》第3辑, 页237至238。

⑤《钱钟书研究》第1辑, 《发刊词》, 页1,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11月。

⑥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概况》, 《访美观感》, 页50。

⑦论者于钱学十年以后, 认为应多以专题形式研究, 参阅黄维樑《钱学十年》, (香港)《星岛日报》1990年1月20日。至于探讨钱氏史学之项目, 参阅④。

⑧马力《钱钟书对〈宋诗选注〉的修改》, 《趵卷》第2卷, 第2期, 总第9期, 页36, 1979年9月。

⑨陆文虎《应当重视〈管锥编〉》, 《福建论坛》1982年第4期, 总第9期, 页111。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罗厚《钱钟书书札书钞(资料)》, 《钱钟书研究》第3辑, 页299、305、316。

①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 页171,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年4月香港第2次印刷。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梁元生《史学的终结与最后的“中国通”——究》, 《学人》第5辑, 页429,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年2月。或曰“心解史学”, 参阅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 页10,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 “《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大会论文, 1994年9月1至3日。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郑朝宗《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 《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页29。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李洪岩、毕务芳《特化哲学与钱钟

书》，《钱钟书研究》第1辑，页183。钱氏自亦尝引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参阅1. 钱钟书《谈艺录》（增订本）补正，《钱钟书研究》第1辑，页30；2. 李洪岩、毕务芳《论钱钟书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与贡献》，注②，《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页17。

⑮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82，（台）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10月15日，又参阅注⑩。

⑯⑰⑱钱钟书《管锥编》序。

⑲钱钟书《管锥编增订》，页18至1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9月。

⑳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氏著《七缀集》，页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

㉑钱钟书《读〈拉奥孔〉》，氏著《七缀集》，页29至30。

㉒李洪岩《读〈钱钟书论学文选〉》（上），《大公报》1990年7月3日。

㉓罗韬《钱钟书与朴学》，《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总第103期，页105。

㉔⑵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

㉕⑶蔡田明《管锥编述说》，页27、148-226。

㉖陈寅恪《致沈兼士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页20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㉗臧克和《〈管锥编〉训诂思想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总第83期，页61。

㉘林校生《钱钟书史学观刍说》，《钱钟书研究》第3辑，页235。

㉙臧克和《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页51、64。

㉚战后法国史学界往往文化、心态史并提，此所以下文以心态史观目钱氏。参阅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页186至1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11月。

㉛⑵⑶⑷⑸⑹⑺⑻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页283—285、276、164、166、271、303—304。

㉜⑽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页1129至1131、910至914。

㉝史家陈寅恪先生释山涛对嵇康子嵇绍出仕司马氏之语“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一段，与通过笺元稹诗，旁及其身世而提出一“通体之社会升降理论”（汪尔敏《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读后》，《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0期，页44，1973年1月15日），是亦一卷士人心态史。参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新一版。

㉞⑿李洪岩、毕务芳《诗化哲学与钱钟书》，《钱钟书研究》第1辑，页191、193—194。

㉟⑻《歌尔泰全集》第7卷，页278，转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01。

㊱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399。

㊲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页611，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5月。

㊳陈寅恪《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岭南学报》第10卷，第2期，1950年6月，后收氏著《元白诗笺证稿》，页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

㊴诠释之际之“有我之境”，说明诠释学实包括心理学之解释技艺。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页259。此与下文以心态史观目钱氏可见钱氏史学之一脉相承处。

㊵臧克和《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页49至50。另参阅黄俊杰《旧学新知百贯通》，《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修订。

㊶钱氏论“体用”，参阅《管锥编》第1册，页8至12。

㊷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

㊸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

派到新史学》，页 325。

⑤陈子谦 《“全体才是真理”——谈谈管锥编的方法论》，《书林》1986 年第 4 期，总第 41 期。

④雅克·勒高夫 《新史学》，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 《新史学》，页 5。

⑤钱钟书 《谈艺录》序。

⑥钱钟书 《诗可以怨》，氏著 《七缀集》，页 113。

⑦钱氏有“诗具史笔”、“史蕴诗心”（《谈艺录 补订本》），页 363）、“是史是诗，迷离难别”（《左传正义六七则之一杜预序：左传》之记言》，《管锥编》第 1 册，页 164）等语。参阅林校生 《钱钟书史学观刍说》，《钱钟书研究》第 3 辑，页 229。

⑧钱氏有“近世心析学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理学专家之先”语。氏著 《左传正义六七则之四七：昭公元年（一）：杂糅情感》，《管锥编》第 1 册，页 228。

⑨郑朝宗 《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钱钟书研究》第 1 辑，页 39。

⑩钱钟书 《管锥编》第 1 册，页 382 至 383。论者引此谓钱氏批评实具历史感，参阅蔡田明 《管锥编述说》，页 366。

⑪⑫姚蒙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世界历史》1986 年第 5 期，页 57。

⑬⑭⑮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 1933—）《历史学和长时段》，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 《新史学》，页 151、144、136。

⑯⑰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 1914—1984）《心态史学》，姚蒙译，丁·勒高夫等著 《新史学》，页 173、195。

⑱李幼蒸 《法国“年鉴派”理论的发展》，氏著 《结构与意义——现代西方哲学论集》，页 323。

⑲蒲慕州 《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学》第 3 卷，第 4 期，页 139，1992 年

12 月。

⑳㉑㉒㉓钱钟书（中书君）《旁观者》，《大公报》1933 年 3 月 16 日，第 3 张，第 11 版。

⑳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心理学和历史学》，杨豫译，氏著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页 10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2 月。

㉑钱钟书 《管锥编》第 4 册，页 1453。

㉒《钱钟书论学文选》第 2 卷，第 2 编“人事论”，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1 月。

㉓钱钟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在中国》，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79 年 6 月，总第 165 期。

㉔引文同注㉑。钱氏此见与本尼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之“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已往的事实”、“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页 29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11 月）十分接近。事实上，有论者的确认为钱氏对历史的看法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唯有沉湎于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中，并在自身经验范围内反复思索过去，才能发现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类型和动力关系”。氏著《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历史哲学论文集》，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5 年，张文杰等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页 149）。

㉕⑳㉖㉗钱钟书 《谈艺录 补订本》，页 38、160、56。

㉘林校生 《钱钟书史学观刍说》，《钱钟书研究》第 3 辑，页 227。

责任编辑：郭秀文

客观评价陈炯明

——兼评《陈炯明集》的出版

□赵立人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61-03

由段云章、倪俊明编的《陈炯明集》于1998年9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陈炯明文集。对于真正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确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事。

陈炯明是何人？今天知之恐怕不会太多。一些自命为学者的人所提供的答案也往往远于事实。1998年广州某大报先后发表过两篇谈张竞生的文章，都涉及陈炯明。其中一篇说陈炯明“三妻四妾”，另一篇则说他是“愚蠢横暴”的军阀。其实，陈毕生只有一妻，私生活极其严谨，颇以“不二色”自豪；且秀才出身，曾在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毕业，能讲英语，略通法文，又好为诗文，多数公文均亲自执笔，不假手秘书。论者所云云，恐怕只是从“军阀”这一概念出发，想当然地套上去的。

在中国近现代，陈炯明算得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担任过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任内严禁烟赌，发展教育，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到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出钱资助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设立由共产党员主持的广

东宣讲员养成所，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会组织；致信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成功，并表示自己尽一切力量推行布尔什维主义；向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派代表到苏俄去，并同意在广州设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改组军队。但另一方面，他主张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民选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对广东介入军阀内战；主张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与孙中山联合奉皖军阀，北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策略背道而驰，酿成政争。孙中山命人刺杀陈炯明，未果，于1922年4月由桂林回师广东，企图一举灭陈。陈宣布辞职，率军退居惠州。驻广西的陈军叶举等部失去接济，亦回广州。孙中山命叶举等部撤离广州，否则将以毒气弹消灭之，陈亦命叶勿与孙冲突，撤回东江；叶不听命，于6月16日举兵进攻孙的广州总统府。孙退出广东后，陈回穗复任总司令。半年后，孙策动滇、桂军由梧州东下，陈军缺饷已久，士无斗志，再退东江，先后与滇、桂军及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对抗，陈的政治取向亦从联共转为反共。1925年，陈军覆灭，

陈炯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在位时生活刻苦，廉洁自持，不蓄私财，故居港后经济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陈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与中共合作，抗日反蒋，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陈炯明晚年虽与中共为敌，但共产党人20年代在讨伐、谴责陈的同时，并不否定其早年的贡献，也不讳言他实际支持过社会主义运动。如蔡和森在《向导》第8期曾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 and 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至于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从其党派利益出发，自然要把陈炯明说成是未出娘胎即已大奸大恶。试看其骂陈的开山兼扛鼎之作《陈炯明叛国史》，第一章就是“陈炯明来路不正”！无中生有地胡扯什么“以牛易马”。该书一口气编造了陈炯明与北军往来的5件“密电”，但无不破绽百出，悖于常理。对此书，公正的学者自有公正的评论：“控告、夸张、张冠李戴之处甚多，使该书降低到几乎不具史料价值的程度。”“讥讽、谩骂、诋毁的文字，几乎是贯通全书。这实在不像一本历史书籍，说它是一本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宣传资料，似更加合适。” 吴伦霓霞、余炎光：《对评价陈炯明的一些重要史料的剖析》，《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就是这样

一本书，以后成了国民党官方史学家“研究”陈炯明的圭臬。加之蒋介石曾在永丰舰上呆了一些时日，为宣传蒋氏“得天下之正”，也为了配合“反共”的需要（陈炯明前期与共产党有些联系，见上文），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不但重印了《陈炯明叛国史》，还做了《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之类的文字来“发扬光大”。本来，昔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诸公为蒋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伪造历史，指鹿为马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算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外人无庸置喙。不过，他们要把一党私定之“案”，冒充天下之公论，并大叫“不许翻案”，企图一手遮天，却是“难矣乎哉”的事情。陈炯明的历史该怎么写，该怎么评价，自有学术规范可遵循，而不会屈从于一党一派的利益。研究者若认真爬梳史料，严格遵从学术规范，多闻阙疑，无征不信，自能得出公允的结论，无所谓“翻”与不“翻”。

《陈炯明集》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全书共两册，88万字，采用图书、报纸、期刊及其他藏件等文献共88种，将已搜集到的陈炯明论著、文告、函电、演说、谈话、公牍、杂录等概行收入，不加改动删节；除加必要的注释外，未作任何评论。编者在《后记》中说：“编辑本文集，旨在存真求实，提供研究资料，希望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全貌，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广东史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矛盾性，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

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求真理总是艰难的，编辑这本文集也毫不容易。如陈炯明在漳州创办的《闽星》半月刊，今极为希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收录了在该刊发表陈炯明诗文12篇的目录，而《陈炯明集》则收录了13篇。虽然仅仅多出一篇，但编者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却不难想见。

该书校勘下了很大功夫，与时下同类出版物比较，校勘质量应属上乘。当然，标点、订错欠妥、注释不当及误植之处仍有。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文体和用语与今日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一些今天已极少用的成语和其他语汇，如不够了解，即易出错。此虽白璧微玷，但仍有注意之必要。

该书收集资料，已相当齐备，惟就笔者所见，以后如出续集或再版，尚有一些资料可供选录或参考。首先，有部分文献该书已采用，但有关内容未全部录入。如长沙《大公报》，是当时粤、港以外报道广东新闻最多的报纸之一，仅1917年，就有引用陈炯明电文、谈话的报道多起，而该书采用该报资料极少，且限于1922年。香港《华字日报》，该书采用甚多，但1924年12月1日所载陈炯明演说词，则未录入。1922年6月18日《顺天时报》载陈炯明劝解诸将勿与孙中山冲突之言，亦未录入。《有关陈炯明资料》中，《癸亡友陈君竞存》、《陈竞存为中国致公党首领》、《吴稚老与陈竞存之交谊》、《定威将军陈公竞存事略》诸篇，分别载有陈炯明与廖仲恺及日本人的谈话，陈所提倡的“中国社会主义”和制订的致公党“建国纲领”，陈挽孙中山联，陈制订的

致公党“三建主义”等内容，对了解陈晚年思想颇为重要，以后可考虑补入。其次，还有一些陈炯明的书信、言论散见于回忆录和书信中。如《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所载冯秋雪《中华革命党澳门讨龙活动杂忆》，收录了陈炯明致陈卓平函全文，及陈炯明在与朱执信会商合作讨龙时的言论；《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所载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军队》及凜之《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均记录了陈炯明劝止叶举发难函件的内容；《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录了陈炯明对马林表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民主政府和社会主义党，要求派代表到苏俄，同意在广州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希望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组军队等言论；《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所载张云史《陈炯明谋再起及其他》记载陈炯明1930年致信冯玉祥的内容及自述拒写“悔过书”的原因；《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初稿》记录了陈炯明一生各个时期的言论，此稿大陆上虽不易寻得，但康白石《陈炯明传》转引了一部分。上述资料虽较零碎，然颇重要。此外，《陈炯明集》所收1912年1月8日致英、美总领事函，系由英文回译，《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录有中文原文，更为准确。

《陈炯明集》没有收录《陈炯明叛国史》所载陈炯明致陈光远的所谓“密电”，具见编者的卓识。不过，集内所收1925年9月20日陈炯明致熊克武函，与此“密电”一样，都只是国民党方面的自说自话，来源可疑。从现存资料分析，所谓“熊克武勾结陈炯明谋叛”，极可能只是蒋介石诛锄异己的惯用手法，故此函之真实性同样可疑。在收录时加以必要的说明，较为慎重。●

责任编辑：郭秀文

苍梧郡、广信县设治沿革考

□陈乃良

广东省工商联 广东 广州 5101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64-05

一、汉代前后的古苍梧与隋唐开始的今苍梧县及梧州

苍梧两字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注》：“仓吾亦蛮也，翠羽，其色青而黄也”。在这里，“仓吾”还是一个南方部族的名称。这个部族首领贡纳的翠羽，被中原统治者视为珍品，因而记载下来。晋人孔晁作注“仓吾亦蛮也”，①说明“仓吾”是越人的一支，是一个族称，后来又引申为仓吾族居住地方的名称。

最初苍梧是泛指南方的。《水经注》：九嶷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就把湖南南部零陵地区等几个郡都看作苍梧的范围。汉武帝最先建立苍梧郡，共领十县，包括今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湖南西南的一部分。②十县当中，处封水（今贺江）流域的“封中”③占其六。其中冯乘、谢沐两县跨今湘桂两省（区），即今江华、富川和江永、恭城等县。此外还包括东面今广东的高要、德庆和南面的信宜、罗定，以及西面广西的藤县和其北的荔浦等地方，范围是非常大的。汉苍梧郡的郡治设在广信县。广东封川古称广信，

广西梧州也古称广信（广东封川县包括原封川与开建两县，这两个旧县从汉朝到南北朝是分别与其他县结合的。封川与梧州合为广信县，开建与信都合为封阳县）。汉广信县即今封川加梧州地方。

《水经注》说贺漓两江分别在广信入郁（西江），亦标明了广信县的位置。广信县东与端溪县（今德庆县）为邻，西与猛陵县（今藤县）接境。从公元前111年起至公元6世纪初，即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宋、齐，直到梁初，这块地方都叫广信县，而且它一直都是苍梧郡的郡治中心。《广西通志·郡县沿革》苍梧郡条：“今广东肇庆府封川县为郡治”。清金鉉《广西通志·沿革》：梧州府“隋初为封州，至唐始有梧州之名”。

梧州的名称始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一说武德五年），在这之前，今苍梧县和梧州一带地方，还建立过几个县治，三国建宁新县，晋建农城县，这两个县治隋代都废了。晋还设遂城县，隋改名戎城县，即今苍梧县城戎圩镇。《苍梧县志》载“隋废宁新入广信，更名苍梧县，置令丞尉。又改遂城为戎城，其猛陵令及丞尉如旧”。梧州府志沿革表对于这几个县的历代变迁均有记

载。所以，古今苍梧的辖区范围变化和差异是很大的，湖南和广东先秦被称为苍梧的大片地方，汉苍梧郡十县中的九个半县（另半个县即广信县西北部那一半），唐初以后都不再叫苍梧。隋朝在梧州地第一次建立苍梧县，从此苍梧之名才开始为广西所专有，并沿用至今。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汉至南朝梁初的古苍梧和隋唐以后的今苍梧，是两个大相径庭的历史地理概念，是切切不可混为一谈的。广东和广西是公元10世纪以后才分开的。封川和梧州相距仅21公里，有西江相连，又没有崇山峻岭分隔，从公元523年梁武帝分设梁信郡和梁信县算起，再往上推634年，封川和梧州共为广信县。600多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应该运用“广信”的概念，而要摆脱这两个地方分别属于广东、广西的习惯概念。这样，才便于我们把有关苍梧郡的一系列问题的头绪理顺。

笔者不厌其烦地谈论苍梧的沿革，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概念不清，造成了不少历史误会。唐朝以后的地理方志，一些史籍的近代注释，198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都说广信县设治梧州。1982年出版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的《辞海·地理分册》亦主张自汉至南朝，苍梧郡治在今梧州。而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汉至晋代交州地图，都把广信县标在梧州的位置上。在这些权威的工具书指引下，不少新书，包括近年出版的《岭南文库》丛书，凡提到广信县，都括注“今广西梧州”。都是值得商榷的。

1995年出版的《广东历史地图集》两汉至南朝的地图中，已将广信县标回封川位置。该书主编司徒尚纪的创见，目前还属少数派，但我以为他并不孤

立。早在1947年，历史学家罗香林就曾指出：“现时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④

二、广信县设治问题

广信县的设治问题向有梧州和封川两说。唐至清代的地理志书，可以概分为三说：

（一）梧州 “汉苍梧郡之广信县”，部分志书有“兼置交州治”之说；封川 “汉苍梧郡之广信县地”。此说认为梧州是广信县治，且为交州治所；封川只是广信县辖区。持此说的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唐杜佑《通典》、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明应槩《苍梧总督军门志》、明李贤《明一统志》、明陆应阳《广舆记》、清金鉷《广西通志》、清和珅《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等。

（二）“封川县即汉苍梧郡之广信县”；梧州“兼置交州，领郡七”。此说认为封川是广信县治所，而梧州是交州治所。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宋祝穆《方輿纪胜》持此说。

（三）封川县 “汉苍梧郡之广信县，元丰五年初，置交州刺史治”。此说认为封川是广信县治所兼交州治所。清郝玉麟《广东通志》、清蒙起鹏《广西通志稿·地理篇》持此说。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封州临封郡，本广信郡，天宝元年更名”，可视为此说之雏型。

我是主张广信县治、苍梧郡治和交州刺史治都设在封川的。根据如下：

（一）由汉至隋苍梧郡中心为封川。

1. 《史记·南越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南粤王传》、《资治通鉴·世宗孝武帝》等史籍所载元鼎五年秋下濊将军“下（抵）苍梧”，是沿潇水贺江一线而下，其会师地点，在贺江与西江

交汇的封川，故“下（抵）苍梧”即“下（抵）封川”，实有别于“下漓水”。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几位史学大师，是以严谨的史笔，忠实地纪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的，显然他们都认定古封川可代表苍梧。^⑤

2. 汉苍梧郡辖境北至今江华、江永，东至今高要，南至今信宜、罗定，西至今藤县、荔浦地；三国将苍梧郡北部的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另划临贺郡，而南界今新兴县地划入苍梧郡；东晋穆帝时将苍梧郡一分为四：苍梧、晋康、新宁、永平，苍梧郡只得原来的四分之一；^⑥南北朝苍梧郡进一步缩小，西部今荔浦、平乐地划入始安郡；而隋朝的苍梧郡更缩小到仅得封川、都城、苍梧、封阳四县。^⑦苍梧郡的辖境逐朝缩小，却一直保持以广信（封川）为当朝苍梧郡治的中心。其间有一些迹象应引起我们注意，王莽篡汉建国号新，便把广信改名新广，东汉光武帝恢复广信原名。南朝梁武帝得天下，又以本朝之名改广信为梁信，从此结束了广信县之称。新广和梁信在《广东通志》、《封川县志》和多种志书中，均记在“封川”条下，足为广信县设治封川的佐证。而《隋书·地理志》进一步明白地记载苍梧郡治在封川。这些都有力地证明自汉至隋苍梧郡治、自汉至南北朝广信县治是在封川的。而事实上梁武帝正是在封川设梁信郡和梁信县，而梧州地方才开始接过苍梧郡之名的。

3. 汉武帝选择潇水封水线作为通往岭南的交通命脉，以密集设县来经营和保障之。既然在县治设置问题上，汉武帝重贺江，而轻漓江，^⑧广信县治的设置，不可能离开贺江出口地封川而西移到漓江出口的梧州之地。

为什么元鼎六年汉武帝在岭南置郡

县时，重贺江流域而轻漓江流域呢？这显然和元鼎五年秋“下苍梧”和“下漓水”两路兵的实地考察有关。著名的灵渠开通以后，秦汉两代仅史禄和马援修通时通航了一段时间，其余时间实际上是不能通航的。唐李渤和鱼孟威再度修通，又经历代频频维修才能维持通航。但漓江有360滩的天险，迟至明万历疏通险滩之后，始较安全地航行。而潇水贺江一线，先秦已有多条古通道连结两水。秦始皇在道县与富川古城之间开辟“新道”，形成一条潇水—“新道”—富江—贺江水陆联运交通线，此线两汉至南北朝的交通相当旺盛。我想汉武帝选择贺江流域重点经营的主要原因，是贺江的交通条件远比漓江优越。^⑨

（二）考古和地名方面的证据。

1. 封开县从距今14.8万年的“洞中岩人”开始，丰富和系列有序的考古发现证明近15万年以来，封开古人类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勤劳操作、进化发展，较早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氏族社会。汉代生产水平处岭南的领先地位，文化亦能代表当时岭南的主流和最高水平。^⑩而据清吴九龄《梧州府志》记载：“梧州僻在边南，古称瘴地。土广民稀，土木蔚荟。则虺蛇出没，其间岚雾之所蒸，毒气之所酿，积而为瘴”。“一岁之中，五瘴迭作，人若感之，暴则生瘴热霍乱；缓则生痲虚、痞疾、脚气、脾泄诸症”。而封开由于经营开发的历史悠久，无关于瘴气记载。

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中亦提及宋代岭南广大地区瘴气之盛，人口稀疏的情况，按当时人口密度测算，处交通要道的几个县，当为无瘴区。例如贺江上游的贺县，是其中之一。^⑪据《梧州府志》记载：“贺与富川气候相类，昔时春秋雨水多，则有青

草黄茅之瘴。今民居稠密，瘴气全消，水土亦安”。可见封开和贺江沿线比梧州开发早，这也是广信县设治的条件。

2. 有关广信的文物和地名，梧州未有发现，封开倒有不少。封开县从杏花镇流入渔涝河再注入贺江那条河，至今还叫广信河，其出口处有座桥，叫广信桥。这座石桥本世纪 50 年代尚存，如今虽毁，河床上还残留着桥墩石。广信河两岸一带地方，1982 年以来，共发现山岗遗址七八十处，古墓葬百多座，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宋时期。可见唐宋及其以前的数千年间，广信河是人口稠密的地区，因而在建广信县后得到广信河的命名，并沿用至今。当地还收集到宋代和明代的大铁钟各一只，铭文铸有“封川县归仁乡广信里”字样（其中宋钟已上调北京展出），可见广信之名在当地广为留存。^⑫

3. 封开县城北面数公里贺江边，发现了勒竹口中石器时代台地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表明封开古人类走出洞穴，向江河大地发展的过程。县城周围的蛇冲山、丰沙、野矮岗，都发现了汉墓。当公元 10 世纪，岭南广大地区包括梧州地方还未充分开发之时，封开县城一带地方，五六千年以来却一直有人类活动，广信县治在封川选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⑬

4. 考古发现证实，封川 15 万年以来一直有人类活动，开发较早。据封开县博物馆统计，该县出土的文物以史前时代为最多，遗址数则以商周至隋为多，以上二者的出土文物数亦不相上下；唐朝以后则显著减少，这正符合封开县自古以来盛衰变化的情况。梧州方面，从梧州博物馆所列出的展品来看，史前时代及商周至隋的文物寥寥可数，而唐宋以后的文物则占大多数。

又据贺州市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张春云介绍，处在潇水封水线上的贺州，先秦时代文物丰富多彩。该博物馆收藏文物共约 10000 件，以汉代为最多。无独有偶，封开县博物馆的馆藏亦以汉代为最多，足以证明这条交通线汉时的兴旺情况，这是广信县治设置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我以为苍梧郡从汉初置起至南北朝，苍梧郡治、广信县治都在封川。南朝梁在封川改广信为梁信，是延续 634 年的广信县治的最后体现；隋苍梧郡设治封川，是延续 700 余年的苍梧郡治的最终体现（其间从公元 523 年至 589 年曾中断过 67 年）。至于刺史治，西汉州刺史是监察官吏，本来不是一级政权，但汉朝中央赋于南方新开的交州以更大权力，唐颜师古注《汉书》称“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汉书·地理志》上）。王范《交广春秋》记叙交州刺史治的迁移情况也说：“诏书以州边远，持节并七郡，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这样，交州州治就近似一级政权了。它不可能离开郡治所在另择地设刺史治，所以我以为交州刺史治也是在广信（封川）的。依汉至南北朝苍梧郡的概念，亦自然得此结论。王象之《舆地纪胜》封州和梧州两条，引证了许多资料，导致结论“所谓广信、梁信及成州之名，皆当隶之封州”，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他未能鉴别南朝梁普通四年之前和隋唐之后两个苍梧的不同概念，无区别地主张苍梧之名属梧州，并接受《通典》“梧州二汉为苍梧郡，兼置交州，领郡七，理于此”的错误判断。

三、苍梧是怎样从封川转到梧州地方的

苍梧之名原以封川为本，后来又怎

样从封川转到梧州地方呢？

梁普通四年（公元 523 年）梁武帝在今封开地建梁信郡，把广信县改名梁信县，均属成州；^⑭而原广信县剩下的今梧州地方仍叫苍梧郡，属静州。州治设在今广西昭平附近，并辖梁寿、静慰二郡，直至公元 589 年隋平陈止。于是梧州之地开始成为一个范围大大缩小了的“苍梧郡”治，其时间自公元 523 年起至 589 年止，共 67 年。这是封川和梧州第一次分开。封川新得梁信之名，而梧州地方承袭了苍梧之名。

公元 581 年，隋朝取代北周，因州郡机构重叠，开皇初，废天下各郡，只留州县两级政权。公元 589 年，隋平陈，原来属陈的南方诸郡，亦通通废掉。此时今封开地方有由成州改名的封州和封川县；而今梧州地方新置 67 年的苍梧郡亦废，只剩下苍梧县。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又废天下各州。大者如封州，改名苍梧郡；小者如静州，则不设郡，只保留龙平县。^⑮此时原属静州的苍梧县，并入封川为郡治的苍梧郡（辖封川、都城、苍梧、封阳四县）。于是封川与梧州地方再次由分而复合。

隋末唐初，萧铣在南方乘乱割据，建国号梁，岭南归其统治。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平萧铣，岭南又分立各州，同时兼具郡名。《新唐书·地理志》及一些志书记载，都有梧州苍梧郡、封州广信郡（天宝元年改为临封郡）等等。这是封川与梧州再度分开，以后亦不再复合了。

唐武德四年，建梧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梧州之名，而苍梧郡成了梧州的别名。时诸志均记“梧州苍梧郡”。这种州郡重名之制，普遍见于唐宋两代。^⑯及至明清一些地方，还遗留有其

郡名之称，但已不算政区名称了。可以说，苍梧郡成为梧州的别名直到宋亡，即从公元 621 年到 1279 年，共 659 年之久。此后虽无苍梧郡名，但苍梧之名为梧州地区专有，并一直至今。●

①（晋）孔晁《逸周书·王会解》。

②班固《汉书·地理志》。

③“封中”是西汉地图南越国范围的唯一标名，泛指封水（今贺江）流域，详情请参看拙著《“封中”试析》（《历史地理》第六辑）以及《“封中”史话·从世界第一幅地图的“封中”说起》。

④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⑤详情请参看拙著《“封中”史话·潇水封水古通衢》及《“封中”及其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广东社会科学》1988·4）。

⑥（唐）房玄龄《晋书·地理志》。

⑦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汉三国交州、西晋交州广州、南朝梁、隋岭南诸郡》。

⑧详情请参看拙著《“封中”史话·汉武帝管治岭南的重大举措》。

⑨详情请参看拙著《“封中”史话·湘桂“新道”和灵渠·封州的衰落和梧州的兴起》。

⑩详情请参看拙著《“封中”史话·缘何古封开多豪杰》。

⑪韩文详见《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⑫详见邓增魁主编《封开县文物志》。

⑬杨式挺《略论封开先秦历史文物在岭南的地位》，《岭南文史》1996·4。

⑭（清）郝玉麟《广东通志·沿革·封川县》。

⑮（唐）魏徵《隋书·地理志（始安郡龙平县）》。

⑯（宋）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元）托克托《宋史·地理志》。

岭南，中国和世界海洋农业文化的源地

□ 孙关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教授 北京 100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3-0069-05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名著《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业，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①200多年来，黑格尔的武断结论一直笼罩着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文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还认为中国只有大河文化（即黄色文化），没有海洋文化（即蓝色文化）。然而，岭南海洋开发的历史，充分说明黑格尔等人的观点是站不住的，岭南不但具有犹如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还有独特的海洋农业文化，而且是中国和世界海洋农业文化的源地。

一

岭南的海洋农业文化渊源流长，若从“耕海”说起，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据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527）在名著《水经注》中转引《交州外域记》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曰雒民”。②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清代《钦定四库全书》辑收失传的晋代裴渊的《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③成书于十六国时期的《十三洲志》

曰：“百粤有骆田。澍案：骆音架，即架田，亦即葑田也……。骆田仰潮上下，人食其田”。④宋代，梅尧臣（1002～1060）在《赴颍任君有诗相送仍怀旧赏因次其韵》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宋代骆田的发展状况，“雁落葑田阔，船过菱诸秋”。元代农学家王桢在名著《农书》（又名《王桢农书》）中指出：骆田在宋元时期多见于江东、淮东和两广地区。⑤及至清代，记录骆田的文献更多，以岭南为例，有清道光年间重修的《廉州府志》第四卷记录着钦州的钦江地区（今属广西钦州）拥有面积不小的骆田，第十一卷记收有廉州的廉江地区（今广东雷州半岛西北部）拥有大片的骆田；⑥清道光年间纂修的《番山县志》第三卷记述珠江口地区有大面积的骆田；⑦清同治年间纂修的《广东通志》第一一六卷记载着揭阳的南溪、北溪等地拥有的骆田。⑧可见，在我国以及岭南地区自晋朝以来各个朝代的史书都程度不同地记载着骆田，亦可以说：骆田的耕作在我国和岭南地区一直没有间断，自先秦以来代代相传。

在古代，“雒”通“骆”。雒田或骆田，即为架田、浮田，在长江流域又称为葑田。南宋农学家陈旉在《农书》（又称《陈旉农书》）中指出：“若深水藪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

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即指沼泽水乡之处无耕地可用，乡民以木桩作架，将泥土、水草置于架上，以种植庄稼。木架飘于水上，随水高下，庄稼不致于淹没。这种架田一能随时移动，二能随潮上下。王楨在其《农书》中称之为“括田”。在岭南则多建于河口入海处。岭南居住着百粤族，即百越族，而“骆者，越别名”也。^⑨所以，在岭南称架田，葑田为骆田或维田。

交趾在上古时指岭南之地，岭南的郡县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 214 年。^⑩“昔未有郡县之时”，指公元前 214 年之前，说明岭南百越人早在至少距今 2200 多年前已开始“耕海”，利用海洋，出现了“维田”。所以，有的书说 1149 年才在“中国南方出现架田”^⑪是不确切的，它比百越人在岭南所建架田晚了至少 1300 多年。维田或架田，是岭南人亦是中国人在土地利用上的一个创造，是耕海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岭南古代的海洋农业文化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耕海”的广度和深度亦已相当可观。

1. 蚝田。中国沿海很早便养殖牡蛎，宋代梅尧臣在《食蚝》诗中记述广东当时已创造了插竹养蚝法，“亦复有细民，并海施竹牢，采掇种其间，冲击恣风涛，咸卤与日滋，蕃息依江皋”。^⑫南方称牡蛎为蚝。清初以前，岭南已有相当规模的蚝田。据《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地区在清以前养蚝业已很发达：“沿岸浅水处多有堆石或蚝壳以繁殖之，是为蚝田或蚝埕。潮退时嶙峋突起，横亘达数里之广。此外，东里蚝町规模亦大”。^⑬蚝田“横亘达数里”，可见其规模之大。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则记载了岭南其他地域的蚝田：“东莞、新安有蚝田……”，“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其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一岁蚝田两种蚝，

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⑭由此可见，岭南当时已采用投石养蚝法。此法与前述的插竹养蚝法不同，李绸元在其专记岭南事物的《南越笔记》中对投石养蚝法有精彩的论述：“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谓之种蚝”。^⑮清乾隆年间，仅广东东莞县沙井地区养蚝面积即达 700 顷。^⑯以上充分说明岭南地区养蚝区域之广、产量之大。

2. 蛭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胡世安《异鱼图赞集》等书中均有人工养殖蛭的记载。《本草纲目》曰：“蛭乃海中小蚌也，……其类甚多。闽、粤人以田种之，候潮泥壅沃，谓之蛭田”。^⑰

3. 蚶田。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在清康熙时期，“惠、潮多蚶田”。^⑱“惠”指惠州府，包括一州九县：归善县（今属惠州市）、博罗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海丰县、陆丰县、龙川县、河源县（今属河源市）、和平县、连平州（今连平县）。^⑲“潮”指潮州府，包括一厅九县：海阳县（今属潮州市）、潮阳县（今潮阳市）、揭阳县（今属揭阳市）、饶平县、惠来县、大埔县、澄海县（今澄海市）、普宁县、丰顺县、南澳厅（今南澳县）。^⑳可见，惠、潮两府所占海域滩涂面积相当广大，“多”蚶田，说明了亦有相当规模。

4. 鲮池。明代黄省曾在《养鱼经》一书中指出：“鲮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为池鱼之最，是食泥”。^㉑黄氏所说的“潮泥地”凿池，即为河口地区。据明代胡世安《异鱼图赞集》记载：“流鱼如水中花，喘喘而至，视之几不辨，乃鱼苗也。谚云：‘正乌二鲮’，正月收而放之池，皆为鲮鱼，过二月则鲮半之。鲮食鱼，畜鱼者呼为鱼虎，故多于正月收种。其细似海虾，如谷苗，植之而大。流鱼正苗时也”。^㉒胡氏的记述很是科

学,至今在闽、粤两地渔民中,仍流传着“疍乌二鲈”的说法和做法,即正月采鲮鱼苗,二月采鲈鱼苗;又依据至今在粤地渔民中,把“流鱼”称之为“水中花”。所以,胡氏记述的畜鱼地,理应包括岭南。

5. 珠池。我国采珠、养珠业都发生在岭南,因为珍珠在我国只产于南海海域。据《尚书·禹贡》、《战国策》、《晏子春秋》等记载,先秦时期岭南已出现采珠业。现知最早记录采珠方法的著作,是东汉初期岭南人杨孚所著的《异物志》,时间为公元1世纪。据《后汉书》记载,“合浦郡土地硗瘠,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②说明当时合浦(今属广西)地区采珠业已相当发达,“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也似表明至迟在公元2世纪南海的北部湾已进行大规模的采集珍珠。

五代十国时期,南海采珠业出现高潮。以番禺(今广州)为国都的南汉刘氏王朝,曾极为奢侈地搜集珍珠以装饰宫廷。元代,在岭南的广州、廉州设立了专管采集珍珠的官方机构——采珠提举司。明代,采珠又一次进入高潮。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产珍珠达2.8万两。因此,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在《天工开物》中已指出采集珍珠不能过度,要注意保护珍珠资源,他说:“采珠太频,则其生不继。经数十年不采,则蚌乃安其身,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④

中国古代采珠主要集中在岭南三县:北部湾的合浦县、雷州半岛的遂溪县、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县。著名的珠池,有合浦县的本江池、杨梅池、青莺池;遂溪县的乐池;东莞县的媚珠池等。^⑤岭南出的珍珠质地很好,质量好于国外的许多珍珠,俗称为“南珠”。《广东新语》上有这样的记载:“合浦珠名曰南珠。”“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者青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⑥

人工养殖珍珠,至迟自宋朝已开始。宋代庞元英所著《文昌杂录》已有人工养殖珍珠的明确记述,其方法是先做假珠,待蚌蛤壳自然张开时投入,经两秋,便育成真珠。这一方法开辟了我国人工育珠的新路,扩大了珍珠的来源。以后岭南各地开始推广,并在清代形成珍珠的商品性生产。

6. 盐田。唐代刘恂在专记岭南的名著《岭表录异》云:“野煎盐,广人煮海其□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但将人力收聚咸地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田竹盘煎之,顷刻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铸表里,以牡蛎灰泥之。”^⑦可见,唐朝时期岭南已运用制卤煮盐方法,它比过去的直接煮海水成盐的方法先进。因为卤水是高浓度盐水,用来煎盐,时间大大缩短,效率大为提高,成本则大幅度降低。而在中国现知制卤技术始于唐时期的岭南。《岭表录异》还记录了目前我国所知的最早的卤水盐度测定法,“置饭粒于卤中,粒浮者即是纯卤也”。^⑧到清初据《广东新语》记载,广东盐场的卤水盐度测定法就有莲子比重计测定法、鸡蛋测定法、鸡子测定法、米饭测定法、小鱼段测定法,以及火测定法。这些表明岭南古时为高效生产高质量的盐,在卤水的质量管理上已运用了一系列方法和手段,可见盐田开发的深度。

7. 药田。从海洋中采集药物,岭南人也很早便有认识。唐末五代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波斯人后裔、到过广州的药物学家李珣,著有一部专记从广州输入海外药物和岭南海洋药物的著作——《海药本草》。书中记载了海洋植物石莼能入药,治疗风秘不通、五疝气、便不利等疾病;黄鱼亦能入药,治疗多种疮病,并指出珍珠是名贵药物,能明目安神,等等。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则认为玳瑁肉和盾片能“解岭南百药毒”。清初的《广

东新语》记载海南岛有加工琼枝（即石花菜，为海洋藻类植物）、草珊瑚（为海洋动物）的“棠厂”，其产品“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瘿气；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热……海菜岁售万金”。^{②9}

三

岭南先民在长期的耕海实践中，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海洋知识及其有关技术。例如，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东汉大将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在琼州海峡两岸所树立的供渡海之用的石刻潮汐表，^{③0}是现知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实测潮汐表。唐代《岭表录异》记载有“蚝即牡蛎也，……每潮来，诸蚝皆开房”等生物节律和报时现象。^{③1}宋代燕肃（960—1040）专门研究过合浦郡的潮候，著有《海潮论》，岭南人余靖（1000—1064）著有《海潮图序》。

又如：成书于唐代的《岭表录异》明确记载了水母与虾的共生关系：“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泛水上，捕食或遇之，即欬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③2}亦成于唐代的专记岭南事物的《北户录》则更明确地说：“水母……皆别无眼耳，故不避人。常有虾依随之，虾见人惊。此物亦随之而惊，以虾为目自卫也”。^{③3}裴渊的《广州记》记述：“鲔鱼长二丈，大数围，皮皆钝物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惊则还入母腹”。^{③4}《岭南杂记》曰：“凡鱼皆孚子卵生，唯鲨鱼胎生。鱼在胎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数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鱼，目未开，肉嫩中羹”。清代《南越志》云：乌贼“常自浮水，乌见以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乌，故名乌贼”。^{③5}清《南越笔记》载：“盖鲱鱼卵，雄者为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③6}上述虾为水母“耳目”、鲔鱼子惊入母腹、鲨鱼胎生、乌贼装死诱捕飞鸟、鲱鱼口中含卵等特殊生态、生理现象，都是今人知之甚少

的。

再如，2000多年前居于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汉王朝贡送了世间罕见的特大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号称“烽火树”。^{③7}汉尺相当于25厘米，“高一丈二尺”，折合约有3米之高；号称“烽火树”，可能是极为珍贵的红珊瑚。能从海底完整地打捞出高约3米、上有462条“枝叉”的珊瑚，其打捞技术是十分高超的。《南越笔记》云：“黄花鱼惟大澳有之……渔者必伺暮取之，听其声稚，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嘯子之候也……取鳧及黄皮蚬、鲚、青鳞，亦皆听取声”。^{③8}说明清代岭南的渔民不仅能用声音判断黄花鱼群是否存在，而且能辨其声音的“稚”、“老”来确定鱼群的动向；不仅能用黄花鱼声音进行捕捞，而且亦能利用其他鱼类（鳧、黄皮蚬、鲚、青鳞等）的声音进行作业。这种生物学捕捞技术现似也失传了。

四

20世纪70年代，当人类面对日趋严重的资源危机、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时，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海洋，提出了“海洋农牧化”的新课题，并很快在全球掀起了海洋开发热。而我们岭南的先祖却早在2000多年前实行陆地农耕的同时，已经开始耕海，开辟了骆田，以后又陆续开辟蚝田、蛭田、蚶田、盐田、药田等，并从“田”扩展到“池”，在岭南海洋开发史上又增添了“鲔池”、“珠池”等内容，并从中累积了大量的极有特色的海洋文化知识。骆田、蚝田、蛭田、蚶田、盐田等和鲔池、珠池等一系列名称，在岭南自古有之。按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算起，已有1400多年；按晋代裴渊的《广州记》记载来算，则在1600年以上。骆田、蚝田、蛭田、蚶田、盐田等名称中的“田”字，来源于陆地种植业的农田、稻田、麦田等的“田”字；

鲮池、珠池的“池”字来源于陆地渔业鱼池的“池”字。可见，岭南的先民在开发海洋中就是运用陆地农业的思想、方法进行的，是名副其实的“耕海”。而且运用的是大农业思路，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一起上，骆田为海上种植业；蚝田、蛭田、蚶田既是海上种植业，又是海上牧业、渔业；盐田是海上副业；鲮池、珠池既是海上渔业，又是海上副业。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早在一二千年以前岭南先民已进行了实实在在的海洋农牧化。说岭南是中国和世界海洋农牧化的先驱、中国和世界海洋农业文化的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46页。

②（北魏）酈道元：《水经注》，第37卷，“叶渝水”。

③④（清）《钦定四库全书》中的裴渊《广州记》。

④（凉）阚骃纂、（清）张澎辑：《十三洲志》。

⑤（元）王桢：《农书》，第11卷，“田制门”。

⑥（清道光）《廉州府志》，第4卷，“舆地”、第11卷，“经政”。

⑦（清道光）《昏山县志》，第3卷“水利”。

⑧（清同治）《广东通志》，第116卷“山川路”。

⑨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马援传》注，中华书局，1975年。

⑩孙关龙：《份分合合三千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⑪闵宗殿主编：《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

农学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⑫（宋）梅臣尧：《食蚝》，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160卷。

⑬《潮州府志》，转引自《中国海洋渔业简史》，第231页。

⑭（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23卷，中华书局，1982年。

⑮⑯⑰（清）李绂元：《南越笔记》，第13、10、10卷。

⑱张磊、黄明同、孙关龙等：《岭南文化志》（待出）。

⑲（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46卷，“介部”。

⑳㉑同⑱，第27卷。

㉒㉓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277—278页。

㉔（明）黄省曾：《鲙鱼经》，“一之种”。

㉕（明）胡世安：《异鱼图赞集》。

㉖同⑲，“陶璜传”。

㉗（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

㉘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㉙同⑱，第15卷，“珠”。

㉚㉛（唐）刘恂：《岭南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㉜（清咸丰）《昏山县志》，第11卷，“海黎”。

㉝㉞同⑲卷下。

㉟（唐）段公路：《北户录》，第1卷。

㊱《太平御览》第938卷，“鳞介部十”引《南越志》。

㊲（晋）葛洪：《西京杂记》，第1卷。

责任编辑：郭秀文

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

——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座谈会综述

□ 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74-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学术转型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为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而且在研究实践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其影响将近一个世纪。在新的世纪交替之际，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学术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能置身其外。如果说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在争论中逐渐摆脱了怀疑和困惑的话，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问题也同样摆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为此，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和《学术研究》杂志社于1998年11月9日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省内各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博士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具体内涵和操作规范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要求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命题，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珠海教育学院郭德茂认为：如何超越古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形态，突出它的当代特征，使它与当代生活和艺术接轨，使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促进当代艺术思维的发展、推动当代社会

主义建设的现实资源，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自觉思考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深圳大学黄金鹏也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形成了“无日不趋新”的思维定势。要想在前辈学者的丰硕成果基础上超越，就只有独辟蹊径，而当代意识正是我们超越前人的关键。每一时代都有它的独特性，这与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期待有关，如杜诗的地位在唐代就不如宋代。

《唐人选唐诗》(十种)，仅韦庄的《又玄集》收了七首，与杜甫同时代的《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并未收杜诗。而宋代杜诗被广为搜集、整理、注释，以至出现“千家注杜”的盛况，这与宋代社会特有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有关，因而使杜诗在宋代获得独尊地位。我们处于世纪之交，读者的期待视野也要求我们在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所以“当代性”的提出是十分自然的。

中山大学彭玉平则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古人早就提出的创作观念。在学术研究上，古人所倡导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也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所以我们提出

“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超前的话题，而是应时的话题。但学术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历史承传性。汉代的训诂、宋代的义理、清代的考据，侧重点不同，但对研究对象、研究格局、研究思路都有一个大致圈定的范围，是扬和弃的结合。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并非尽弃传统，另立新途——那是从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而是立足于当代，把当代的观念和方法与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学术品格、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

广州师范学院沈金浩对“当代性”的话题也表示认同。他认为当代性与国际性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术研究的国际性也必将日益增强。譬如就研究者队伍而言，中国学者出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愈益增多，而国外人士到中国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数也日见其多。因而研究成果的国际共享性自然愈益增强。在研究目的上，我们对中国文化既要视为本国文化，又要视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研究它，不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认识、启示、审美和愉悦，也要让世界共享。在评判的价值尺度上，应尽量体现出国际意识。国际意识正是当代性的主要内核之一。

中山大学康保成认为：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实际上已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讨论“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话题时，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超越了。作品注解、版本比较、作家生平的考证，这些看起来十分陈旧的形态，背后都蕴藏着研究者的当代意识。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考证工作，却往往是作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宏观判断的必要前提。所以“当代性”

的话题既是抽象的、宏观的，也是具体的、细致的。我们在追求超越古典形态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富有生命力的古典风范。

也有一些与会者对“当代性”的话题本身进行了慎重的思考。暨南大学徐国荣认为：当代性并不完全是时间上的概念。因为缺乏可以称述的典范性成果，使这一命题显得有些雾里看花，有急躁之嫌。古代文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特点所限制，相对于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显出滞后性，这其实是正常的。我们应努力谈出“新”的意识，让研究成果来逐渐显现它。所以，与其四脚踏空地谈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不如实实在在地培育一种问题意识，把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贯彻下来，或许更能见其成效。

与徐国荣的观点相近似，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也认为：应踏踏实实打基础，少奢谈当代性。近年来谈“当代性”，有炒作、包装的味道，一部分热心于现代转换的研究者，其目的往往是想使本学科成为社会热点，成为显学，而古代文学研究其实是不具备条件、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的。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的大发展需要风云际会的时代条件，而我们身逢平稳发展的时代，它的讲求实际，它的平凡，使我们成了大师后面修修补补的修理工。而古典文学精神以及在千百年实践中形成的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是不能随意转换和消解的。

暨南大学张海沙则折衷两种说法，她认为“当代性”有深刻与浮浅之别。在新的世纪之交，提出当代性的话题是自然而然的。但在如何理解这一话题上，可能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浮浅的当

代性其实就是实用性，这种应用型的当代性不仅会使古代文学的研究支离破碎，而且会对当代的读者对古代文学的接受产生误导。而深刻的当代性是建立在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之上的，这种关怀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古代文学及其研究对于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些永恒的问题具有永恒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说，古代文学研究无须转换便具有一种当代意义。

二

在如何确立“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话题的现实内涵上，与会代表也各抒己见。华南师范大学刘晟认为：文学观念、政治经济观念、研究心态、中外交流是体现古代文学研究当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文学理论的阐释模式决定了文学史规律见证的取舍范围、文学作品的评价、文学现象的描述与估量等，这一点古今是相同的。但在文学观念的当代性渗入古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古今文学观的差异、雅俗之争、文学生存背景的古今中外差异等，是我们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中山大学张海鸥则从文学遗产的根本宗旨，应是承传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审美情趣的角度，提出了当代性即传承高贵的话题。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遗产研究由于常常受到实用政治因素的影响，往往把高贵和高雅等同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从而与“人民性”形成对立，这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失误，应予纠正。对于以往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重集体轻个人、重大

众轻贵族、重通俗轻典雅、重质朴轻华丽、重思想轻艺术、重造反轻升平、重批判轻歌颂等倾向，加以一定的反拔和反思，即可视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内涵。

对于以当代的理论视野、观点和方法去诠释古代文学现象，从而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与会博士也大多持赞同态度，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广州师范学院纪德君以《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为例，认为传统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多偏重于将人物形象与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比较，看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有多大的概括性，达到怎样的典型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只涉及了人物形象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至于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心态、动机、审美意识，小说文本中其他人物的组合、情节的建构，与读者的审美文化心理、阅读期待视野等的多重密切关系，则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使得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不仅得不到充分发掘，而且还容易受到曲解。所以，研究者应努力拓展思维视野，借鉴一些切实可行的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才有可能突破前人和研究范围和局限，将研究逐步导向比较深广的层次。

五邑大学李立也主张对用国内外当代的文学、美学、语言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持宽容开放的心态。但他同时指出，借鉴外国的经验应与继承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方使“当代性”的内涵在创新的同时不失其稳重。譬如西方的阐释学与中国传统的阅读学就有不少契合之处。中国传统阅读学认为，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图与作者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意图三者是相同的，所以创作讲“诗言志”，而批评就

讲“以意逆志”。再如传统阅读学注重文字的诠释，以文字的解码作为阅读的开始，有比较强烈的语言意识，义理的阐发即建立在文字的诠释之上。这种阅读传统有一定的创作依据和理论源流。然而它忽略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字的诠释与义理的阐发在阅读活动中往往相互脱节，所以容易引起阐释的过度 and 偏差，导致牵强附会。而西方的阐释学与中国传统的解读方式适成互补关系。中西合璧，就能使这一长期困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格局的问题得到初步有效的解决。

郭德茂则把“当代性”理解为让中国话语参与当代世界话语语境。他认为，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的逻辑关系，它们既彼此相通又各具个性。当我们在世界语境中说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文论这些话题时，它实质上主要指中国古典的积累深厚的那一部分。要使这一部分进入当代世界语境，一方面是要传达“照着讲”，另一方面要以继承古代优秀文化的当代中国学者的姿态进入世界语境，讲出当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话语，参与对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这才是我们所要讲的，也是世界所想听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性与中国化是不可分割的。

暨南大学史小军对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泛文化现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能把这种泛文化现象视作“当代性”的表征。过分地提倡泛文化式的研究，势必使文学研究边缘化，淡化对文学本体特征的研究。如有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之广，几乎已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但悬案依然未解，这正是泛文化研究带来的尴尬局面。古代文学研究，有

些规律是不能随便改的，如对作品文本的研究、对作品文学性的研究等等，都不是一提“当代性”就可撇之一旁的。

当代性与当代的学术规范密不可分。当深圳大学郭杰在会上作“确立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规范”的专题发言时，引起了与会博士的强烈共鸣。郭杰认为：20世纪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重要时期，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带有直观感悟、点到即止的特征，便于读者的体悟和联想，但在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体系的建构、方法的自觉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不足。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确立起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学术规范，便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如在选题论证上，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检索体系，避免重复劳动。在研究方法上，概念必须经严格的界定，自说自话与“一家之言”是不宜划等号的。在治学态度上，用客观描述代替主观评价，因为情绪化会影响思想的清晰，等等。这些规范其实也是大多数治学者心明的，但一直以来却未能得到很好的遵循。现在提“当代性”的话题，应将这一内容包括进去，否则，“当代性”的根便无从立起。

当代性意味着对传统学术成就的深化、提升和整合。暨南大学聂巧平以杜诗学的发展为线索，充分论证了这一点。聂巧平认为：历史上有关杜甫诗歌的研究，各个时代各有其不同特色。宋代重搜集、辑佚、分类，在注杜上追求“无一字无来处”；明代主要表现在对杜甫解诗的选批上；清代重考证、编年和义理的阐发；而辛亥革命以来则注重文献资料的全面清理以及从目录学、版本学、史料学等角度对杜诗学史的研究多路展开，显示出研究局面的蓬勃生机。但客观地说，要将杜诗学的研究上升到

新的档次，尚有不少工作要做。譬如一部高质量的《杜诗学史》就是学界所期待的。“当代性”的话题可虚可实，但著实的“当代性”才能在学术史上留下深重的痕迹。

当今社会信息密集，变化纷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地球村从幻想变成现实。因而，如何运用当代的科技手段为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服务，也就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来。计算机在统计分析方面具有人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借助计算机对作品的词汇、语言风格等作统计分析，可以为历史上久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庄子》内外篇和《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的作者归属等问题，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证据。为此暨南大学赵维江就“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科技”的议题，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计算机技术对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可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其二可极大地方便文献阅读与检索。如南京师范大学陆续开发的《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计算机检索系统等，利用这些软件查找资料十分方便快捷。如果我们注意更为系统的开发，则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其三可提供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研讨的机会。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同行之间就某些具体问题可以在网上随时对话，且时间和人数都没有任何限制，相对于以往的集中一地，限时限人的研讨，显然要方便得多。“当代性”何尝不需要这种形式。

暨南大学程国赋认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还应该注重“打通”，消解以往学科分类过窄过细所带来的弊病，打通文史哲之阂，文学与语言学之阂，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阂。古代文学史研究则应

该打通各种文体的界限，打通文学史各时段的界限，以达到圆融无碍的研究境界。

三

古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以研究者为基础前提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话题自然也与研究者自身素质的当代性息息相关。因而如何调整研究者的素质和心态、完善研究者的自身人格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注意。康保成认为，应该培养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和学术品格，要摆脱功利目的。在社会上，需要营造学术研究独立的氛围。张海鸥认为：耐得住寂寞的高贵情怀是古代文学研究者能传承高贵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是令人景仰的。他那种坚守精神家园的文化使命人的自负，那种壁立千仞的文化守护人的自励，那种空谷足音般的独立学人的自持，还有他那些丰碑般的学术思想，永远感动着我们晚辈学人。他在《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圣贤精神，正是高贵的人类精神和学术精神在当代学人中的遗存，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和积极继承。

郭德茂则认为，学问境界说到底还是人的境界问题，所以，研究者的“真性情”，涵养首当其要。有真性情，研究自成高格。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等等，人格卓然纸上，思想力透纸背，真性情与真学问达到了高度统一。所以，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者，我们不当仅仅把古代文学研究看作是分工中的一门“工种”，“技术”中的一套“工序”，而应把我们的人间情怀渗透到研究工作中，使我们的

李大钊在《晨钟》报本事考信述要

□王 政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79-06

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8月15日——9月5日在《晨钟》报工作了22天，学界对这段时间李大钊的行动和思想状况一直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地位、《晨钟》的影响、李大钊的工作情况、交游情况以及他后来离开《晨钟》的原因等方面入手，一一考述梳理，以揭示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变化的面貌。

一

1916年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北上至京。①当时的《晨钟》报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进行编辑工作的。

关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职位，各种

年谱以及不少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总编”、“总编辑”或“主编”，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也称“总编辑为李大钊，经理为汤化龙的私人秘书刘道铿。”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则认为李当时是“副刊编辑”。但据黄河著《北京报刊史话》记载，“《晨钟》报是由蒲伯英主持，编辑主任为李大钊。”

按近代报社编制惯例，总编辑（社长）负责报社全盘的内政外交，确定办报的主导思想。蒲伯英（殿俊）资格甚老，曾当过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在民主党以及进步党内都是要员，而且在1896年就办过《蜀报》，对于报纸业务不是外行，故蒲作主持人（总编辑）的可能性较大。再加上《晨钟》报是

研究成为促进时代进步的精神需要。

从当前的社会环境来看，研究者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必须以牺牲其它利益为代价的。黄金鹏认为：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名利的巨大诱惑，“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功利主义，消解了学人献身学术的虔诚之心，使不少研究者缺乏前辈学者对古典文学从一而终的执着追求以及独立的学术品格。80年代前，学术曾一度沦为政治的传声筒，80年代后，又沾染上不少媚俗的习气，这与研

究者学术热情的衰退，学术品格的沦丧不无关系。所以目前研究者自身的当代性，是以重铸曾经流失的学术品格，积极修炼内功为迫切之事。

“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话题，不是几个人一朝一夕所能探讨穷尽的。就像研究成果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一样，“当代性”的话题也需要时间来显示它的生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陶原珂

政党报，报纸言论口径当然要统一在自己人手里，李大钊当时只是以汤化龙私人秘书（或“智囊”、“笔杆子”之类）的身份出现，担任总编辑一说恐怕难令人信服。至于刘道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至于经理一职在报社内向来是报业经营的财务负责人，不直接干预报纸内容。确定报纸风格，负责每天报纸编排发稿的是“编辑主任”，地位在主笔（评论员）和访员（记者）之上，故李大钊身当此任似较符合实际。②其地位应在蒲殿俊之下，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因意见不合而离去”一事发生。

《晨钟》报是进步党人物汤派的喉舌③，当时，汤化龙、刘崇佑④、蒲殿俊不管是在进步党内，还是在整个中国政坛上都是风云人物。有这些人在，李大钊尽管可以起一些作用⑤，但并不能完全控制《晨钟》报，因为其地位赶不上汤、刘、蒲。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晨钟》报于8月15日创刊。当时报界是相当繁荣的，其中著名的，北京有《国风日报》、上海有《时事新报》、天津有《民意报》、广州有《民生报》，其它地方有《天民报》、《平民报》、《湘江日报》。仅北京一市的报纸除月刊、周刊外，就有80余家⑥。

报界繁荣由两大因素使然，一是政治空气相对宽松。此时“癸丑报灾”已过，段祺瑞政府对报界的打击还未到来。《晨钟》报的起步阶段，正好处在两次“报灾”中间，各报持论还有一定的自由度。⑦

二是经济因素。据记载，“当时的报纸以每日1000份计，每月之印刷费一大张为150元，两大张为200元，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⑧汤化龙给《晨钟》报提供的启动资金是1万元，每月津贴是2000元，而且《晨钟》自身的经营情况也不错。其广告价目表如下：

每月1—3日，每字1分。4—7日5厘，

8—15日3厘，15—30日2厘。连续3个月9.5折，半年9折。

按每版4万字（4号字）计算（除去梁启超《冰室合集》征订启事和《刘崇佑律师事务所启事》），《晨钟》每日三版广告，月广告收入至少在1—2万元左右。当时《晨钟》的报价是送报每月大洋6角，自取5角，零售铜元3枚，就算纸费、稿费、通联费将报价大部抵销，该报的收入也在每月2万元左右。而其编辑部成员在中央公园的合影只不过14个人。

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外界因素，《晨钟》报就可以在京城打开局面了。

三

《晨钟》报的编辑部成员有李大钊、白坚武、郁崑等人⑨。《白坚武日记》里记载当时进步党人以及留日归国人员往来频繁，酬唱几乎日日不断。李大钊参与的就有宴宾楼、致美楼等几次。梁漱溟也说：“他（指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⑩9月7日，李大钊在老便宜坊宴请高一涵、秦立庵、田克苏，谈《宪法公言》主旨。⑪

《晨钟》报为日报，除创刊号、增刊外，每天六版。从广告可见，《晨钟》开张没几天，刘崇佑已开始与《晨钟》接触，而且因为他是进步党中汤系的重要人物，故广告位置也特殊一些。从报纸内容上看，《晨钟》二、三版最重要，有启事、社论、国内新闻（电稿，主要报道国内政局、议会消息）、国外新闻（电稿，主要报道战欧洲战场战况）、地方新闻等，分条述列，眉目清楚。与社论对角的压版部分为短评“法言”专栏，是舆论阵地。另外，二版有钟状题标，每期书一条警语。“铁肩担道义”就出自8月20日版上⑫。五版是文艺副刊（文苑），有林琴南的小说、陈石遗、宗孟⑬的旧体诗，皆为一时之选。白坚武还开辟了“知白室说乘”专栏。报底的“大鸣小鸣”专栏独具特色，一般采用来稿，内容是对时局的一些牢骚话，格言体，短小精悍，意趣盎然。

从发稿数量上看，8月15日—9月5日，

白坚武 23 篇，李大钊 4 篇，郁癡 9 篇，木公（木、木强、责公）6 篇。从风格上看，白坚武言辞最激烈，甚至有“怕起革命者必是专制魔王却是愈怕愈起，怕挨强奸者必是伪道学却是越怕越挨奸。”^⑭之语。郁癡素来“禀性狷介”，^⑮也是慷慨陈词，而李大钊较之持重得多，论述严谨，逻辑性很强。曹聚仁回忆说，当时报界流行文体有四类：一为严复的译文体，二为章太炎的古文体，三为梁启超的报章体，四为章士钊的政论体。李明显集梁、章（士钊）之所长，既汪洋恣肆又缜密谨严。

四

李大钊在《晨钟》所发的稿件，除一则启事和一则小说外，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评社论（包括发刊词）7 篇，另一类是新思想新人物介绍 5 篇。当时，去日本学政法归国的学生大多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制度抱以极大热情。这时的李大钊、郁癡等人也是通过有效的“法”来制约统治者，达到民主共和的目标。具体的政见是希望段、黎协调一致。要求“一、平息党争。二、不讦阴私。”^⑯甚至说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风雨飘摇之会。吾人对于国事之前途有一线希望者，异口同声曰惟二公是视。”^⑰这与当时进步党人汤派的初衷是一致的。^⑱故 8 月 22 日《晨钟》报警钟上写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子健（应为建）语。”但李大钊站得比较高，对问题的看法较宏观，视野更加开阔。他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明显有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影子，是希望国人“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在哲学上，《“第三”》的思想类似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若说是影射时局，那也是希望段、黎调和并且一同努力使中国更加富强，并不是简单地调和共处就了事。在现实问题上，除了批评“报馆太多”^⑲和提倡“政坛演说”^⑳外，还对宪法会议的召开表示“谨馨香顶礼以尽庆祝之诚。”并认为“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宪法会议者，宪法之所由生也。”^㉑但是，李大钊并未停留在当

时大多数进步党人迷信宪法的层次上，而是已经意识到了在“法制”背后还潜伏着更大的国民性的隐忧。他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专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除专制国民之根性。”^㉒

在五篇介绍性文章里李大钊介绍了与自己“青春”精神相近的人道主义者达科儿（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并且用很短的篇幅介绍了哲人尼采和培根的“偶像说”，宣扬用尼采式的否定精神来打碎“偶像”。在《奋斗之青年》里，李大钊介绍了美国《便士报》的创始人霍勒士·格里利，此人“公称是一个辉格党人，另一方面却为大众利益奋斗。”^㉓李大钊以此人为“奋斗青年”的代表，很可能是与自己也是出身寒微而且也投身报业有关。可见，这时李大钊对报纸的社会功能是相当重视的。

从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看，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爱国青年。大的政治抱负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现实关怀是希望段、黎合作，共谋国家大业。由于李大钊与孙洪伊“私交甚厚”^㉔，而且这一时期里过从甚密，^㉕已露出倾向于孙洪伊一派的端倪。

五

小说《别泪》，实际上是篇政治寓言。李大钊不是文学家，小说的艺术手法自可另论。对于文中人物各影射谁，学界中的各种说法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是说丙支少年迪穆为李大钊自况，陶菊隐甚至认为丙支就是暗指国共合作。^㉖众所周知，1916 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科学的方法是将小说还原到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去加以解读。

首先是小说的题目“别泪”，讲少女桐子与丙支少年迪穆分别，明显与李大钊离开《晨钟》报相对应，小说第一句“华氏，神京世族也。”当是影射北京的政党无疑。少女桐子自幼许给丙支，与华氏又是“姑表亲”，若知道李大钊曾任过汤化龙的秘书，则不难推断桐子

即指李大钊自己。那么从李大钊离开《晨钟》的行为可以知道丙支即汤化龙一派，而且汤化龙一派中也的确“多为文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李大钊借少女之口说：“君子昔时，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曾几何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谈，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这是暗指汤化龙以前曾与袁世凯合作过，而现在丙支与甲支要合作，是汤化龙要与进步党中“拥段”派合作，助段祺瑞这种“异姓之豪强”。李大钊是劝汤不要忘了“伤心之痛史”而重蹈“覆辙”。这样看来，“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的甲支是进步党中的“拥段”派，那么与甲支“势力相埒而不相睦”的乙支便是进步党中与“拥段”派相颉颃的孙洪伊一系。而且，“小孙系”也的确“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这样解说，似更合理。

小说最后说，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又“朱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而离去，后来丙支少年迪穆又得到桐子帮助，破镜重圆。小说很清楚地写出了李大钊这时复杂的心态，不愿意跟汤化龙走，又依依不舍。希望汤能迷途知返，自己以后还会效力并与汤共谋大业。这决不是有的学者想象的断然决裂和反目成仇。^⑦小说的题目“别泪”已蕴含了这层意思。

六

李大钊于1916年9月5日离开《晨钟》报，学界普遍认为是“意见不合”，到底是什么意见不合呢？学界目前尚无充分研究。

李大钊政治抱负上的大方向当然是与汤化龙诸人格格不入，这自不待言。具体政见此时亦分歧加剧。前文说过，汤派对段祺瑞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李大钊对时局，对段、对孙洪伊、对汤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从

《晨钟》报上反映出来。

《晨钟》报上除了李大钊、白坚武、郁崑的文章外，还有一位木公（此笔名又转化为木、木强、责公），当时汤派的进步党人中只有一位可能用这样的笔名。刘崇佑，字崧生，木公即为崧，他不光是汤系里的骨干，而且早在1911年就与林长民（宗孟）等人办过《健言日报》，“以发挥宪政精神，指陈地方利病为宗旨。”^⑧可见刘不光在办报上是内行，而且早就与后来成为“甲支”（拥段派）的林长民过从甚密。他在8月19日《晨钟》报上“法言”专栏有《佚辞》短评，说“今大总统不私天下，因事择人。但宜黽勉以从事，曾何感激之足云——共和国之官吏，全国之公仆也——感激下忱，当对四百兆之主人翁以一鸣谢，何至独向大总统。其为全国公仆之一（员）而出此丑态乎？是谓名不正，言不顺，而望其政事有成，得否也？噫！”，署名“木”。明显是攻击拥护大总统（黎元洪）的孙洪伊一派。更有甚者是：8月23日版的短评：

崧哉段总理

段总理以元老资格支持民国危局。思维前后，厥功甚伟。此次众议院以大多数通过，参议院当亦不甚相远。

天下事希望愈殷者，甚实践愈难。以往之丰功伟业敬闻命矣。今后更宜恢宏廓大。示国人以公勿偏勿囿，斯亦全国人所深望也。

这与前文提到过的白坚武的“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惟二公是视”的口径大不相同。一张报纸内，出现两种声音，其分歧可见一斑。前文说过，刘崇佑在进步党内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比李大钊要高，故在使李大钊“洒泪而别”的问题上，刘起了很大作用。段祺瑞系与孙洪伊系的主要分歧在于地方自治问题。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不到一个月就加入了《宪法公言》（主持人为孙洪伊，经理为秦立庵（广礼），并发表了《省制与宪法》等鼓吹省制的文章，也可说明李大钊的思想由协调段、黎，反对只拥段，发展到倾向于孙洪伊

是渐变的。事实上，李大钊离任的当天，“研究系”的干将陈光焘就接任李大钊的编辑主任一职，②⑨也可反映出汤、刘一系希望什么样的人担任这一要职。而且在李大钊去职一周后③⑩的9月16日《晨钟》报的报头旁，原来《律师刘崇佑启事》的版面较以前大了一倍，题为《律师刘崇佑事务所迁移广告》，说“鄙人现移寓丞相胡同晨钟报社内如有接洽事件者请惠临该处为幸。”并且，在后来的《晨钟》报上不时有刘的文章出现。刘还当过一阵子总经理。

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李大钊与汤、刘的分歧。就是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进步党人90多人在安庆会馆开会，成立“宪法研究会”，31日举行正式成立会并宣称“以自由精神按国情，察外势，据学理以研究宪法案。”9月2日的《晨钟》报刊载了详细情况。同日，以王家襄、陈国祥、蓝公武、林长民为首的180余人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声称“研究宪法、举其所得以供国会参考。”《晨钟》报不见登载，反而9月4日的《申报》上有报道。当时各报早已有电稿设备，说是《晨钟》无意漏报，似说不过去。若说前者因为李大钊与汤化龙关系不错而发稿，那么后者也是进步党内的大事，不见报，编辑主任应负其责。两个“研究会”在“拥段”问题上达成一致，再加上“先天本一气”③⑪，故于9月12日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这件事发生后，《晨钟》报于9月14日，《申报》于9月17日都发了稿，这时李大钊已离开了《晨钟》报，刘崇佑正好此日搬进来。

可以说，李大钊在《晨钟》报期间，正是进步党内汤派一系为了与孙洪伊一系相抗衡③⑫而合并调整，并由协调段、黎发展到“拥段”的阶段。李大钊此时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之复杂，是可以用一掬欲语还休的“别泪”来比况的。事实上，“丙支”无拳无勇，“多文弱书生，尚清谈”，主要是利用《晨钟》报等舆论阵地发挥社会作用。“喜

批评是非”的长处是用上了，故在段祺瑞执政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要角分任财务、内务、司法和教育总长，蒲殿俊出任内务次长，王家襄任参议院议长，陈国祥任众议院副议长。而且，这批人亦开始同段在政坛上共进退，《晨钟》报完全成了“研究系”的机关报。

总的看来，李大钊在《晨钟》的22天里，整个中国社会政局、进步党政团内部、李大钊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处于一种对应的动态过程。这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①见《白坚武日记》第31页。

②见《守常启事》言辞去“编辑主任”一职。《李大钊文集》第217页。

③《晨钟》报创刊时，“宪法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还未成立，更不用说二者合并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了，学界以为《晨钟》报一开始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不确。

④《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

⑤据《李大钊年谱》及有关研究文章，《晨钟》的名字就是李大钊起的。

⑥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编著，第一卷第七章。

⑦⑧⑨后来，《晨钟》报是在1918年9月被勒令停刊，12月1日，更名为《晨报》复刊。著名报人张季鸾入狱是在9月24日，《公言报》的黄希文、王德如被捕是在11月22日。

⑩据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说当时有200元就可以开报馆。

⑪高一涵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先生》里称：“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不干了。”云云。其实，李大钊在《晨钟》总共干了22天，不是两个月。《白坚武日记》里记载“9月2日，晚接高君一涵，车刻已改。……意见不合，脱离

晨钟报》关系。”是说自己（白坚武）意见不合，到9月5日，李大钊就离开了《晨钟》报，可见高一涵回忆有误。他并未参予《晨钟》报的工作，而是加入后来的《宪法公言》的采编工作。

⑩见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

⑪见《白坚武日记》。从白坚武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李大钊离开《晨钟》报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然不会马上谈到《宪法公言》的主旨。

⑫“铁肩担道义”与“妙手著文章”并不是出于同一天报纸。“妙手著文章”出自明杨继盛“辣手著文章”。一“妙”一“辣”，意味迥然不同。“辣”者体现出杨继盛对魏忠贤的愤恨，“妙”者体现出李当时意气较为平和。

⑬即林长民，后来也成为研究系干将。

⑭见《晨钟》8月20日“大鸣小鸣”专栏。

⑮见黄旭《郁崑文集》序。

⑯见《晨钟》创刊号，郁崑《晨钟》报立言之标旨》。

⑰见8月27日《晨钟》“法言”专栏，无题，署名“惺”，即白坚武。

⑱张国淦在《中华民国内阁篇》里记载当时汤化龙希望段、黎调和，因为汤与黎是同乡又同时发迹于辛亥。但“黎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延闿、孙洪伊诸人，对汤、梁（启超）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加之内务总长孙洪伊与汤早已势成水火，还有黎身边的人挑拨，……汤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划一切。”可见，汤化

龙一派从调和段、黎到“拥段”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⑲见《敎坛演说之必要》，《文集》第191页。

⑳见《祝九月五日》，《文集》第215页。

㉑见《叙》，《文集》第190页。

㉒见《美国新闻史》，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

㉓见高一涵《回忆李大钊同志》。

㉔见《白坚武日记》。

㉕见《蒋百里传》。

㉖《文集》第217页《李守常启事》说鄙人此后，倘于一事一理有所指陈，仍当寄登本报，就正当世。”也未看出有割袍绝义的意味。李大钊后来的确寄回过稿件，1919年2月7日的《晨报》上刊载《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落款是“守常投稿”。

㉗见方汉奇编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546页。

㉘见9月5日《晨钟》报《陈光焘启事》，其与《李守常启事》并列。9月6日版亦是如此。

㉙《白坚武日记》记载。“9月7日，——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说明李大钊已从丞相胡同搬出。

㉚见9月17日《申报》。

㉛孙洪伊一派于9月9日成立“宪法商榷会”，为国会内第一大党。但孙、汤的分歧由来已久，决不是在成立了党派以后才发生冲突的。

责任编辑：陶原珂

香港与内地社会媒体语用变异分析*

□何自然 吴东英 陈瑞端 黄子程

(香港理工大学)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85-07

一、两地社会媒体的语用变异特征

1) 词语创新

随著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不断出现词汇创新现象,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A. 新创词语

新创词语指为适应表达新生事物的需要而创造新词。香港和内地媒体在新创词语方面有明显的地域倾向。例如, 内地创造的“男阿姨”、“空嫂”等在香港媒体中就不会出现, 而“港男”这样的词, 却只有香港的媒体才会想得出来。《广州日报》97 1 12 第 1 页就有这样的报道:

① “男阿姨”从大学来一“幼儿园阿姨”这个固定词组, 近两年已被一群五大三粗的须眉汉改写了, 他们还以男性的刚阳气质和高出一个层次的文化素质而赢得了幼教“女儿国”里大人小孩的认同

“空嫂”从空姐一词衍生, 指一些比空姐年龄稍大、或已婚生儿育女, 但仍适宜从事空中服务的女士。此词首先出现于上海, 现似普遍被接受。

“港男”一词是最近在香港的媒体中出现的。它来源于一次竞选香港男士的活动, 是“香港男士”的缩略词; 它与竞选香港小姐活动中的港姐的说法相似。香港过去和现在都

不断在创造很多有生命力的词语, 我们常见的有: 大巴、中巴、小巴、电脑、廉政、炒鱿鱼、度假村、公关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香港人为丰富汉语所做的一点贡献。

B. 民俗、典故的利用

媒体语用中带民俗典故以求形象, 是香港媒体语言的特色之一。例如, 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见到一个别出心裁的禁烟广告:

②) 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是“三寸钉”! 立刻戒烟, 以免被烟钉死。

按粤方言区民俗, “三寸钉”指死人下葬前封钉棺木用的长约三寸的铁钉。广告将香烟比作“三寸钉”, 使人联想到死亡, 颇具宣传效果。另一个警示标语:

③) 坐地起价: 严禁坐于车厢地上, 违者罚款二千。

这里的“坐地起价”原出自民俗“就地起价”, 指商贩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临时提高物价的投机行为, 这里用来正面指出, 如乘客坐在地上, 就要罚款, 在略含幽默之中道出禁令的力量。

C. 委婉语的使用

经常使用委婉语是中国内地媒体语言的特色, 而在香港却比较少用。例如, 当前我们说的“下岗”在香港就直称失业; 菲律宾来香港应聘从事家务劳动的佣人, 香港直称

为“菲佣”，但中国内地把应聘佣人称为“保姆”。如今更不管男女都婉称为“家政服务员”或“家政人员”了。《北京日报》98 5 / 22 “京华周末”第 373 期就有两篇报道，一是“下岗男工干家政”，另一是“北京籍家庭服务员”。第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所谓“家政”就是帮人家干家务。

当然，香港媒体并不是完全不用委婉语。比较典型的有：“边缘少年”（意指问题少年），“办公室助理”（意指信差）等。

D. 利用某些词语的同音、谐音以求双关，并表新义。这是香港媒体最乐于使用的语用策略，特别是利用粤方言的同音、谐音现象创造新的说法。例如九广列车上有一条所谓“加減乘除方程式”的宣传标语：

4) 列车班次增 +

- 少服务延误

保障 × 客安全

÷ 机应变灵活

这条标语用数学符号表示“加”“减”“乘”“除”，用粤方音来说，基本能够明确表义，因为粤方言的“除”与“随”同音。

再如，香港的电视台有“港是港非”、“论尽都市人”、“98 世界杯晨话传真”等节目，都是一些利用粤语的同音、谐音而构成的双关语：“港是港非”谈的是香港社会的是与非。由于粤语中的“港”、“讲”同音，这个节目读起来就让人联想到“讲是讲非”。“论尽”有说尽、漫话之意。在粤方言中，“论尽”这个音还指人“易惹麻烦、碍手碍脚”。所以“论尽都市人”除了漫话都市人这个意思外，还表明这个节目谈的是市井百态，特别谈论市民惹上麻烦的故事。“晨话”自然是早晨节目，但粤语的“晨”、“神”同音，这也给世界杯赛的报道增添了一点神秘色彩。

当然，也有利用汉语标准语同音或谐音的。例如当地一个通过卫星转播的普通话电视节目就有叫“星闻报告”的。普通话的“星”与“新”谐音，因而听似“新闻报告”，

实专指有关影星、歌星的娱乐新闻信息。

再如，香港的电视台播放一个学习普通话的节目，取名为“唱谈普通话”，节目中有唱、有说。但大家都知道，汉语词汇中只有“畅谈”，而没有“唱谈”。

其实，媒体热衷于利用同音、谐音来新创词语并非总是好事。也许，偶而使用一下，会给语篇或谈话增加点幽默或情趣，但应当注意原则和把握分寸，确有必要而又不致于带来负面作用的才创，否则就不宜提倡。有些成语改造会误导学生，尤应禁止。香港学生的汉语错别字特别多，也许与媒体滥创新词语不无关系。这类语用现象在内地媒体中也曾出现，但因受到大众的批评而未获认同。

2) 外来词语的使用

A. 汉语中直接使用英语的小词：如 Yes, No, OK 或其他常用词和缩略语，在香港的媒体语言中十分普遍。如当地的一家通俗周刊《壹周刊》为号召读者加入该刊网络“壹络会”而作的宣传文字是：

5) 凝聚“壹”读者，网上生活更加 Yeah!

这里的 Yeah 是 Yes 的口头说法，有“惬意”的含意，它同时又与前面的“者”字的粤方言读法同韵，应该说这是相当生动活泼、而且很有香港特色的宣传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内地很多地区的媒体，首先当然是内地粤方言区的媒体，也开始效法起这种用法了。如《羊城晚报》96 / 12 31 第 13 页就以“新年 Party 新意思”为题，介绍说：

6) party 当然不能只顾吃，作为主人的你，预备一些游戏，会令 party 增加欢乐气氛。

其实，这些英语常用词语在汉语中早有它们的对应词语，本来没有必要直接写出英文来的。不过，两种语言所表示的事物，往往不是完全等同的，如 party 同“聚会”总有不同的地方，而 Yeah 同“是”有时更是相去千

里。也许，这正是人们乐意用这种外来词语的缘故吧。不过，如果两种语言的词语含义一致，实在没有必要来个“洋”的，如：

7) 氧吧，深圳说 NO。（《广州日报》97 4 12 第 9 页）

这同“氧吧，深圳说不”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舍此用彼呢？

B. 媒体一旦借用了某些外来词语（包括用英语直接表达的小词），就不一定保持它原来的意义，而会产生新的意义。

两地的媒体在使用英语的 OK 时，就有这种特征。我们知道，OK 常常用作形容词或副词，相当于 all right，有“对”、“好”、“可以”、“行”的意思。此外英语 OK 也可用作及物动词，意思是“在……上签上 OK 字样”，表示同意。可是，当 OK 被借用到汉语来，特别是用在香港和内地粤方言区的媒体中时，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意义和新用法。现归纳如下：

1. OK 在汉语里用作感叹词，表赞扬，相当于“好极了”的意思。例如，报章上就出现过以“令外国人连连喊‘OK’”为题的报道（见《广州日报》97 5 16 第 21 页《‘OK’并无赞意》一文）：

8) 一位外籍教师伸出大姆指连声对某人喊“OK! OK!”

其实，外国人是不会这样用“OK”的，这只是中国人借用“OK”来表示赞扬罢了，这可算是一种创意呢！

2. 英语 OK 作为形容词或副词所表示的“好”是作“同意”解的，但汉语借用 OK 表示的“好”却能指物品“质量上乘”。例如，一则黄金首饰展销广告（《广州日报》95 12 / 18 第 18 页《耍弄噱头弄巧成拙》）：

9) OK! ×店黄金确实 OK!

不幸的是，黄金成色是以 K 来衡量的，这就等于说这店铺的黄金是“0”（零）K 了。的确是弄巧成拙。

3. 汉语的 OK 用作形容词或副词时更有

“正常”或“不用伤脑筋”的意思。例如香港一个“营养节食中心”的广告：

10) 你体重 OK 吗?!

4. 人们利用 OK 的音，在汉语中更创造了一个与 OK 毫无关系、但无论香港或内地都十分流行的音译词：“卡拉 OK”。这词原于日语，其音为 Karaoke，现被半中半西地按音译成“卡拉 OK”，可谓奇特。媒体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更有省去“卡拉”而只说 OK 的。《广州日报》1998 3 5 第 13 页有一篇报道，就题为《酒楼 OK，住户不 OK；人声、机声，邻居有骂声》。

5. OK 在汉语里也被用作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但意思却是“成功”、“完成”。《广州日报》97 7 14 第 3 页就用了这个意义报道说：

11) 我国人工繁殖大熊猫——六年“OK”二十四胎。

也有人说：

12) 我这单生意 OK 了!

OK 的各种用法及其词义的引申，很符合语言变异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C. 香港媒体还使用一些一般人摸不清来历的、已本地化的汉译外来词语。例如，“高买”就是这类外来词，很不好懂。它是从英语 shoplifting（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一词谐音译过来的：shop 指商店，shopping 有“到商店买东西”的意思；而 lift 则有“抬高”、“举高”之意，于是，香港人将这个英语单词拆开翻译，但又合起来使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意指“偷窃”的当地特有委婉语“高买”了。漫步香港街头，当见到“高买罚十”的警示牌时，我们就要明白那是“偷一罚十”的意思。有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高买”似为“高价买进”的缩略，而“偷一罚十”的喻意又正好是“高价买进”呢！

D. 香港媒体有时会不顾译语可能招致误解，总爱将外来词语翻译为既可作为音译又可按音译来理解的词语。如英语表示“麻

烦”的 trouble 音译为“茶煲”；表示“失败”的 fail 音译为“肥佬”。于是，在香港的媒体语言中我们会听到或读到：“你真是‘茶煲’！”，表示埋怨某人给自己添麻烦，等于说“你真麻烦”；“你又‘肥佬’了？”表示听话人考试又一次不及格，等等。将外来词语翻译成这个样子，它不但是音译词，而且可以不看成是音译来理解，形成一个“音-义相关”的词语，它与单纯的音译词是不同的。

“音-义相关”词可以使人们据其原来的意义产生联想，结果产生“张冠李戴”的感觉”，显得滑稽可笑。正是这个特点，这类词语一般只用于日常谈话中，或者出现在一些较为大众化的报章杂志上。内地媒体对外来词语的翻译不会使用这种“音义相关”词语，以免产生联想。

音译外来词多用于书面语或出现在正式场合，它的变异现象也很常见。如“克隆”这个纯粹的音译词，它由英语的 clone（无性繁殖）音译而来。这个外来词融入汉语后，其用法迅速扩大，既可以用作形容词（如“克隆羊多利”）、又可以用作动词（如“可以克隆其他生物，但不能随意地克隆人类”）有趣的是，人们甚至将“克隆”用于转义，成为“抄袭”、“仿制”的同义词。如《广州日报》97 4 13 第 4 页的一篇题为《有感于克隆文》中就有“克隆文”的说法，并说：

(13) 小说《秋夜》从构思、人物、语言、情节方面均与 1990 年发表的另一篇小说《遍地萤火》“绝对地克隆！”

E. 内地粤方言区借用外来词语，除英语之外还有日语，但主要借用日语的词结构，例如“××大放送”，“×之×”，“××一族”（一群），“××直击”（现场直播或采访）等。于是，电视节目中有所谓“周末大放送”的说法，意为周末（放映）电影；“广之旅”、“洁之发”则分别是内地的一家旅游公司和一种洗发液的名称。日语词结构的借用源于内地的改革开放，是日商来华投资开设公司或

合作经营带来的影响。目前，这种东洋效应已逐步扩大，同类现象已相继出现在内地的非粤方言区。“×之旅”、“×之岛”、“×之韵”、“×之廊”等企业和商号，正点缀着内地各大城市中的繁华地段，与“松下”、“索尼”、“三菱”、“丰田”等牌子的商品相呼应。人们或许以为那些仿日命名的公司和企业同上面提到的东洋商品一样都是来自邻国日本的了。

3) 语码混用

语码混用是香港地区媒体语言变异的又一大特征。可以说，当地普遍存在汉、英语码混用现象，媒体语言是起着领头作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A. 过去殖民地的教育重英语轻母语，当地人习惯用英语称呼事物，对那些汉语里暂时还没有固有名称的新事物，用英语来称呼似乎更直接、更方便。如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就直接称它为 computer，用在篇章和话语中就形成了语码混用。到了“电脑”这个说法为我们接受之后就出现 computer 和“电脑”两种叫法并存的局面。此外，有一些已有汉译的日常生活外来词语，也会外、汉并存，如 buffet 和“自助餐”，quota 和“（出口）配额”等，到底该用哪一个，在篇章和谈话中到底用不用混合语码，那就因人而异了。这里要指出的是，香港地区使用的汉、英混合语码中的英语部分，随著使用人口的日益增多，时间长了就逐渐汉化，或者准确地说，逐渐粤方言化了。于是，order（订单）成了“柯打”，strawberry（草莓）成了“士多啤梨”，brake（刹车）成了“迫力”。这些音译外来词在汉语中到底是否被接受，需要经受时间和普及程度的考验。事实上，在媒体的作用下，香港已有不少这样的词语，如的士（taxi）、巴士（bus）、（酒）吧（bar）、三文治（sandwich）等，早已广泛流传，已不算混用了，有的甚至被汉语吸纳，进入规范领域。

B. 语码混用既然给交际带来方便, 当地人也越来越倾向于混合汉、英语进行交际。这时, 说汉语时用的英语一般都是单词或短语, 不过已经不限于新词汇和表示新事物的词语了。人们将语码混用作为一种语用策略, 在通俗报刊的文章或日常交际中出现于下面的场合:

1. 有意向听话人表现一下自己的“英语知识”, 或表明甚至抬高自己的身价;
2. 一时想不出合适的汉语表达方式;
3. 为配合或迁就谈话对象而有意无意地使用;
4. 一些不便明说的禁忌语或当时不宜用汉语直说等情形。

他们不但不避忌使用外来语码, 而且以母语中夹杂使用外语词语为荣。下面是一些例子:

(14) ……但你要记住, 世事往往 takes two to Tango, 事情能否照你的原意去发展就真的要看你们的缘份。(《香港经济日报》1993 8 27 第 54 页, 转引自 Li: 194, 1996)

(15) 人是 creatures of habit, 一旦习惯了做某事, 就很自然做了, 戒也戒不掉。(《明报》93 8 19 第 61 页, 转引自 Li: 198, 1996)

4) 方言词语的使用

香港媒体语言中夹杂大量的粤方言词语, 内地的媒体语言在这方面就比较规范一些, 用的基本上是汉语标准语, 不过近年来也有变化。夹杂方言的媒体语言, 当地人当然会乐意接受, 但外地人可能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试分析下面两则报道:

(16) 三老千出师未捷先扮蟹。(《东方日报》96 10 11 A11)

(17) 妻子数臭丈夫烂赌陀衰家。(《新报》96 9 21 A9)

如果不懂得粤方言的“老千”(= 骗子)、“扮蟹”(= 给人捆绑)、“数臭”(= 诉说某人的坏处)、“烂赌”(= 迷恋赌博)、“陀衰家”(= 拖累家庭)的含义, 这两则新闻标题是不

容易明白的。

再如, 香港有些“双层巴士”的两侧刷了一条大字标语:

(18) 小心过马路, 岂止系细路。

这里的“系”字原文是繁体, 粤方言是“是”的意思。这个标语难以理解或导致误解的地方是“细路”(小孩)这个词, 它与道路的大小风马牛不相及。

内地媒体夹杂方言的情况总的来说比香港少, 但也会出现一些让香港人不明白的词语。例如, 从内地的电视或广播中,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词语: 讨价还价说是“打价”; 价格太贵、物非所值说成是“宰人”。

内地粤方言区同香港地区的媒体语言不尽相同, 那里大都使用汉语标准词语; 近年来的媒体语言中夹杂粤方言词语的现象越来越多, 一些内地读者对此已有所反应。

三、两地媒体语言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1) 虽然香港与内地媒体语言有不少差异, 但从规范和变异的角度观察, 我们更多地感到的还是两地语用的某些趋同现象。趋同的表现有二: 一是两地媒体语用现象都有变异的性质, 二是两地媒体语用差异有日益缩小的趋势。

A. 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交际需求, “语言具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发展动力, 它不断地突破旧规范, 进入新规范。在社会交往空前繁荣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现代, 这种情形尤为突出。”(戴昭铭, 1998) 上述两地媒体语言在词汇创新、外来词的使用、语码混用和方言词的使用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对已有规范(包括语音规范、词汇规范甚至某些语法规范)的突破。应当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呢? 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语言常规和变异的关系。首先, a) 变异和常规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有常规便有变异。也就是说, 语言规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人们在言语交际中虽然受语言

规范的约束,但多数情况下是灵活多变的……。b) 变异与常规可以互相转换。一个时期是常规的言语表达形式,在另一时期可能是变异的,相反,一个时期是变异的言语表达形式,在另一时期可能又是常规。”(冯广艺,1992)因此,对于香港和内地媒体语用变异现象,只要其能够准确地表达说写者的思想,且不与已有规范冲突,造成难解或误解,就应该欢迎。其次,要认识到“变异可以仅是在语法允许的可能范围内,比正常语言使用更进一步的结果。”(查普曼,1998)从语用效果来看,变异能“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亚里士多德)

B. 香港和内地媒体语用趋同的表现是:一方面,香港媒体中粤方言的某些说法被广东媒体粤方言吸收使用,而随着粤方言的整体北上,其中一些语汇又被内地媒体广为应用,有些甚至进入了汉语标准语的范围;另一方面,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南下,对香港地区的媒体语言也产生了影响。至于哪个地区具有较强的语用影响力,则取决于两地的民众和媒体对对方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认同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感觉到的趋同现象,大都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语汇。

1. 香港的经济蓬勃发展,促使内地从事商务活动的人们仿效其语言并进一步“创造”。例如,“五星级”是国际宾馆同业之间按豪华条件分类中的最豪华一级。自从内地的宾馆也按国际标准定级之后,内地仿效香港,将“五星级”或“星级”同“最豪华”、“高级”等同起来,于是,内地不但有五星级宾馆,而且商品房宣传中还出现“五星级完美居庭”的广告(《广州日报》97 12 9 第12页),更有“五星级公厕”(《光明日报》96 / 1 26 第3页)等出现。

2. 前面谈到的人们在商业宣传中利用同音、谐音,以求达到商业效益的手法,以前多见于香港,但现在内地也学到手了。内地

商人使用这种手法进行商业宣传显得更加积极,他们甚至千方百计利用汉语成语和四字词组,创造出一些与之同音或谐音的四字词组,例如“无胃(微)不治(至)”(胃药广告);“天长(尝)地久(酒)”(酒类广告);“默默无闻(蚊)”(蚊香广告)等等。商人们认为这是商业宣传的高明手法,无可非议,可是他们这些“伪成语”一出现就遭到舆论的批评,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广而告之,就会谬种流传,中、小学生也就难辨真伪了。幸好,内地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传媒已拒绝接受此类广告,免致误人子弟。

3. 在寻找两地语言的趋同现象时,要注意同一词语表示的意义在香港和内地是会有差异的。例如,“充电”一词的使用差异。在香港,要报道某人紧张工作了一个时期,如今任务完成了,身心需要松弛一下,以求恢复疲劳,于是就有出外度假“充电”的说法。它还表示知识的补充,指人们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充实。如:

(19) 广州拨款 720 万建立转岗培训体系,政府资助八千失业者充电。(《广州日报》97 11 17 第1页)

同一词语竟有不同含义,说明两地的用词尚处于各有各的用法,互不通用的状况。不过我们有时会明显地觉察到,两地在使用同一词语时,其中一地会出现误用的情况。例如,“机会”一词,两地都说:

Q0) 你有机会赢!

Q1) 我们有机会再聚。

但香港地区的年轻人会说:

Q2)? 你有机会撞板 (= 倒霉)。

Q3)? 你唔(不)注意饮食就有机会生病。

这里有一个搭配的问题:“机会”能不能与表示贬意的词语连用?香港的年轻人可能受英语 chance 的用法的影响,因为英语的 chance 后接的词语无论褒、贬都是可以的,但汉语的“机会”就不同。如果后接的是一些贬意

词语，人们往往只用一中性词“会”或“可能”来搭配。如上面两例就要说成：“有可能撞板。”“你唔（不）注意饮食就会生病。”

“机会”一词则留给与高兴的事情搭配在一起，如：“有机会在香港见到你的老朋友你一定很高兴。”“你有机会读大学。”

2) 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忽视滥造词语、乱改词语及语用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词语的滥造、乱改是负面的变异，其产生的变体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和“效率原则—准确、经济、省力”（戴昭铭，1998）；词语误用、语用失误则是由于对语用原则的无知而造成的辞不达意、事与愿违的情形。两者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宜与积极有益的变异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媒体所起的传播作用影响深远，它所应用的语言自然应当正确、规范，足以供人们仿效、学习，甚至欣赏。但是，由于媒体制作的时限短，斟酌词句方面花的功夫相对较少，因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滥造乱改词语和语用失误。下面是一些较典型的例子。

在用词失误方面，香港的新闻报道就出现过“揭发”与“发现”混用的情形：“女死者母亲及胞弟到访，揭发两人并排仰卧床上，盖上被子，房内冷气开着，两人死状安详。”（《苹果日报》98 4 14 A1）

中国内地传媒的用词失误，也会令人读后不得要领，不知所云。例如《广州日报》97 8 16 第9页报道了我国设置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这个决定在广东省的反应，这条消息竟然用了这样的标题：

24) 广东呼唤教育界的 MBA—1998 年教育硕士招生前的思考。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是借用某大学副校长说的“教育硕士就是教育界的 MBA！”来立论的。可是，MBA 这个英文缩写是“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EDM）说成是“教育界的 MBA”，无论出自

何处都属负面的变异。

《北京日报》98 5 22 曾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朱镕基总理视察北京市级机关这条新闻。其通栏标题竟然是“朱镕基总理来京视察”！编辑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朱总理是中央机关的，他到北京市机关视察来了，于是就有“来”京视察的说法，可是作为这张报纸的读者，我们倒纳闷起来了：朱总理不是在北京吗？怎么说“来”京呢？我们认为，《北京日报》的“来”京是不妥的。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这是指示词语出现语用失误了。

尽管内地媒体语言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不规范的汉语的警惕性比较高，纠正和指引工作做得比较好。也许，这一点对香港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致力改进当地媒体语言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 本文由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赞助，特表谢忱。

部分参考文献：

Li, David G. S. (1996) Issues i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A Hong Kong Case Study.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冯广艺 (1992) 《变异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查普曼 (1988) 《语言学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

戴昭铭 (1998) 《规范语言学探索》，上海三联书店

何自然 (1997) 社会语用问题，《学术研究》97 3, (广州)

黄煜、卢丹怀、俞旭 (1997) “粤化、欧化与规范化—香港中文报章语言的个案评析”《明报月刊》97 11 (香港)

黄煜、卢丹怀、俞旭 (1998) 《并非吹毛求疵—香港中文报章的语言与报道问题评析》香港三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新路”是新的思路

——读曾牧野《新路》有感

□张 井

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92-02

我捧着牧野同志新出版的《新路》，边读边想，觉得“新路”就是作者新的思路，是写作发表时社会上新的观点。我们读牧野同志《新路》中的文章，必须留意它的发表日期，当时发表这些观点是很先进的观点。现在已经变成了多数人的共识。正因为后来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才证明先言者的先见之明。

一开卷就看到醒目的标题：《“恭喜发财”》、《再谈“恭喜发财”》。这是大家常说和爱听的吉利话，甚至电话、车牌号码，也花钱买几个“发”！“发”！“发”！可是牧野同志是早在1979年1月作为新春贺词在《广州日报》发表的，他听到微言和有褒有贬的议论后，在1980年春节，再发表一篇“恭喜发财”贺词，可见其先进性和坚定性。虽说是随笔，可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根有据的。他说发财的“财”是恩格斯说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剩余”。这个“剩余”并非资本主义专有的，而是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继续发展的基础”。这样的财为什么不应当大发特发呢。这个财不是恢复资本主义剥削之财，而是劳动剩余之财；不是两极分化之财，而

是共同富裕之财。后来他又写了一篇《一家富裕与家家富裕》，说的是顺德勒流林镜仔养猪发了财，又帮助17户农民养猪致富。牧野同志在1980年2月的《再谈“恭喜发财”》的文章中说“要富裕的社会主义，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个观点与一个月前，邓小平与美国吉布尔和加拿大林达光谈话，批判“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内容当时没有传达和发表。

经济学界多数人，是在1992年以后，为了认识为什么社会主义也要实行资本主义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才去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区别。而牧野同志却早在1983年5月，解释打破“铁饭碗”是否打破社会主义时，就从经济哲学层面上深刻阐述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他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属生产关系范畴，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内部层次的东西，比较稳定，如果改变了，社会经济形态也会改变。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属于经济制度，所以要坚持。而“铁饭碗”则是一种劳动用工制度，属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外部层次

的东西，是不稳定的，随着社会发展可以改变。所以“铁饭碗”可以破除，它与社会主义无关。这个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市场经济也是经济体制，所以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理论依据。

认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与牧野同志深交，知道他深受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影响。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牧野跟随卓炯，很早就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了。我认为，只要充分认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对商品和消费，而且对资源和生产，也起调节配置作用，不论他使用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概念，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把《新路》的文章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1987年底以前，牧野同志发表的文章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观点，其中最明显的是1980年7月的《破“茧”而出》，该文提到两个会议。一个是1979年3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讨论会”。他虽没有参加，但卓炯参加了，而且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不要搞计划经济，也不要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因为它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牧野同志一定是同意卓炯这个观点的。另一个会是全国十大城市机电产品交易会，会议在广州举行。它是交易会，而不是分货会、分配会。于是牧野同志借题发挥，批判斯大林关于生产资

料不是商品，只有商品“外壳”的观点，宣传市场经济观点。牧野同志把斯大林的“壳”变为“茧”，揭露“壳”论的本质是“春蚕结茧，把自己捆得死死的。”大声疾呼商品要“破‘茧’而出”。无锡会议是理论上破“茧”而出，广州会议是行动上破“茧”而出。怎一个“破”字了得，是市场经济破计划经济的“茧”而出。

从1988年1月开始，牧野同志就实话实说。名实相符地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内涵的文章。1988年是一个契机。牧野同志作为广东经济学界的带头人，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同志支持下，牵头在一年内组织举行六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讨论会。他在广东理论界共识的基础上，在思想斗争漩涡中，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公开主张和论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把市场经济作为综合改革的目标模式”。

牧野同志在书的前言中说：“读书，我一贯主张‘学以致用’；即要‘钻进去’，又能‘爬出来’”。《新路》反映了牧野同志已经“钻进去”又“爬出来”。书的第三辑，作者说是“怀念故人、追忆往事”。我却从中看到他是怎样“钻进去”的。如他在《问路》中说：“路途生疏，几乎每逢三岔路口便犹疑起来，停车问路。”“勤于问路，保证不会犯错误。”结果登上了“重山之外又重山”。书的第一、二辑，体现他“爬出来”，破计划经济之“茧”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天地来了！

责任编辑：韦前

经学为本 文体为干

——读邓国光先生论文集《文原》^①

□何志军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7326 (1999) 03-0094-03

邓国光先生新著《文原》集中体现了他90年代初以来研究古代文论的严肃思考。该书由14篇论文组成,通过个案研究、专题探索和专书研究,切实从中国文学和批评史实际出发,以经学与古代文论之间的深刻联系为基本线索,重新审视古代文学文体和文论的发展演变,指出古代文论的发展,不仅从文学文体本身的发展变化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同时贯穿着儒家经学顺流而下的巨大影响以及文论对经学的逆向自觉汲取,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古代文论与经学之血脉关联。这是近年来港澳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一部力作。

中国古代文学文体滥觞甚早,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考察古代文学的文体渊源,则《周礼》中所载的“六辞”,可视为除诗赋等纯文学体式外其它各类文章文体的起源。对于诗赋起源问题,学界论述已多;而要全面、历史地把握古代文学文体,必须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各类文章体式的萌芽,从总体上把握古代文体的原初状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周礼》六辞初探》一文正是由此切入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该文中,作者从文化史角度入手,通过对祝、巫、史、卜职能特性的辨析,指出祝是中国古代“文字型文化”形成的关键人物,而由祝所掌握的“六辞”撰作,不但是应国家政治、外交需要产生的文章,显示了熟练的文章写作技巧和文辞运用能力,而且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

作者结合现存先秦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的“六辞”作品,细致地从文体本身进行分析,说明了总体上具有“文雅”特点的词、命、诰、会、祷、诔在先秦有着各自的功能和特征。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周礼》“六辞”深刻影响了后世文章文体的发展:一方面担负着实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表情意向,构成了除诗赋以外各体文章实用性与文学性交织的特殊禀性。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的范畴包括了那些在今天看起来只不过是应用文的文章。此外,作者提出的祝官具有最早的文学集团性质的意义、六辞分类对后世文章体式以功用分类的影响等,都值得我们注意。

最初的文体萌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至汉魏六朝,文集日兴,文体渐备,更集中了文论家对文体的自觉考察,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向来是研究的重点。“文学的自觉”中最重要的两端即是对文学价值(包括文学家的价值)的醒觉和文体自身的醒觉。《魏晋南北朝的文原论》、《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经学演绎》、《文心雕龙》假纬立义初探》、《汉魏六朝辞赋与纬学》四篇文章,分别从经学、纬学角度重新考察本时代文论与文体意识的勃兴,凸现了经学、纬学及其融合给六朝文论和文体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可说深具识见。

六朝文原论的内涵至少包括两方面:或原文于经,或原文于情志。原文于经,有各

种不同的逆溯法，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与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就大相径庭。若仅从文体一一对应的观念出发，自然不能得其要旨。《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艺流别》提要对此就颇有指责：“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魏晋南北朝的文原论》一文指出，六朝文论的原文于经和原文于情志密切相关，其实质是通过原文于经而推求于作者情志，因而既重视文体与经的关系，又往往不为文体体式所囿。文体溯源意识和文体的辨析是建立在人的主体情志基础之上的。作者因而归结出一条古代文学批评的规律：“先秦以来的诗赋评论，归宿于作者的情志，关怀人的因素更甚于文辞体式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稟性。”（第54页）大体上来讲，这个提法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应注意的是，文体意识的勃兴和发展、大量辨体的经验和实践，使得文体观念在古代文论中的地位愈加举足轻重，深刻地推动了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经学演绎》一文深入论述了六朝文论与经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般认为，六朝文论的兴盛是由经学的衰微和玄、佛崛起而促成的，作者则别具新见，抽丝剥茧，追踪于历代经学的阐释、发展以及文论的发展，指出六朝文论的核心依然脱胎于经学。通过“原性情以立文体大本”和“崇文用以寄济世大志”两方面，历史地考察了《礼记·乐记》性情论的演变和儒家经学理想在文论中的反映，论证了六朝文论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性情入手，不仅要求文体归于正，而且要求文学作品及文论担负起纠偏导弊的教化作用，使整个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归于儒家理想的至善境地。本文不同于通常的观点的是，它不被六朝经学在政治势力上的表面衰微所迷惑，而是着眼于传统经学内在理路的发展演变，从文体和文用两方面分析其对于文论的深刻影响，因而能自出手眼，令人信服。

盛行于两汉的讖纬之学，在魏晋南北朝依然有相当的影响，直至隋代全面禁毁后才逐渐衰亡。正视纬学对文学作品及文论的影响，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是很有必

要的。范文澜先生作《文心雕龙注》时，就曾引用过不少纬书资料。《文心雕龙》假纬立义初探》和《汉魏六朝辞赋与纬学》正凝聚着作者对此种历史现象的严肃思考。作者通过对《文心雕龙·正纬》的分析，结合《封禅》等篇中刘勰对于讖纬之学的态度，指出刘勰一方面对两汉以来的阴阳灾异讖纬持批判态度，一方面又全面肯定符瑞纬学。他进一步论述了《文心雕龙》的枢纽观与纬学“配身取象”观念的密切联系，认为纬学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架构中有着提挈文学整体生命意识的作用。另外，作者考察了《文心雕龙》中申借纬文的情况。例如，《神思》篇之论想象，学者多以陆机《文赋》为先导，本文则引纬书《乐动声仪》“神守于心，游于目，穷于耳，往乎万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作为《神思》篇“神居胸臆”而无往不至、“物沿耳目”以搜求情貌的一解，颇为贴切。符瑞纬学与传统经学的融合使得它几乎成了经学阐释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经学理想的护持上，符瑞纬学发挥了深刻的作用，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纬学与文论的关系，并深入《文心雕龙》的理论架构思维，与那些仅以纬书之奇诡怪诞为文辞和想象之资的说法相较，这可说是别有新意和深度的。《汉魏六朝辞赋与纬学》一文则通过文体、题材、内容和赋心各方面的考察，指出当时纬学知识和观念已深入人心、文心，不仅存在着大量以纬学为直接题材的辞赋作品，而且即使是不直接以纬学为题材，也往往在名物运用、境界想象各方面渗透着纬学的血液。这两篇论文均涉及当时盛行的纬学，并且注意到了纬学与儒家经学的融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由此考察其与文学作品及文论的内在联系，不是抽象地奢谈影响，而是从文论和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从文体本身出发，钩稽比较，引证精详，因而言之成理，令人深受启发。

初唐大儒孔颖达奉敕纂修《五经正义》，折衷历代经学以作为权威解释，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永徽四年正式颁布天下，成为科举制明经科取士的依据，“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皮锡瑞《经学历史》）乃是

唐代士人科举必读书，其影响之巨不言自明。

《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正是由此出发，索隐探幽，钩稽排比，从中整理出一套系统的诗学主张，大胆地对唐代诗论的直接源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力求重新定位孔颖达及其诗学在文论史上的地位。作者从诗心、诗用、诗法三方面分抒愤言志、谏诤救世、六义兴象以构成孔颖达诗学的大体。在诗心上指出孔氏以《左传》六情六气相配说为基础，对情、志、气关系的理解发展了“诗言志”说，其志乃“作者所以舒心志愤懑”（《毛诗序》孔疏），而且不同于屈原、司马迁对“发愤”一词的简单运用，是在诗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上建立的原则。在诗用上指出孔氏秉持谏诤救世之旨，以诗人为大夫，以诗为“救时之针药”，诗心的缓、锐显示着病体的可救与不可救；孔氏以转训法训“诗”为“承”、“志”、“特”，即结合了诗心诗用与时运的内在关系。在诗法上指出孔氏不但重视“赋”之一义，而且从“兴”中发挥出譬喻和物象之义，并在具体的作品批评中加以运用，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作者认为，相较于后来殷璠的“兴象”说和高仲武的“兴喻”说，孔颖达从“六义”中引发的诗法论更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作者于元代选取了刘壘《隐居通义》和祝尧《古赋辨体》的古赋论为研究对象，于明代则揭出岭南大儒黄佐及其弟子所编撰的《六艺流别》的文体论，均以文体研究为本位，参合宋明理学之影响，揭示出自挚虞《文章流别集》以来，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和总集与批评相结合的形式对于后世文论的巨大影响，并且指出辨体观念和辨体方法的演进对于文体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治文体史的学者所不可忽视。而经学本身的内在发展以及理学家文艺观对于文论的渗透，则是一以贯之的，像黄佐本人就是一个理学宿儒。

《抉原》着重从文论发展与经学关系进行论述，同时，也非常重视总集形式与文论关系的考察，视总集为文论之母体。自《诗》、《书》、《文章流别集》、《文选》乃至后世大量

有影响的总集编撰，都灌注着编撰者严肃、周密的思考，凝聚了大量的心血，是一项极为用心的事业，其中往往蕴含着重要的诗学观念。自作者的博士论文《挚虞研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之后，本书《中国古代总集和文论》一文也表现出作者对此的一贯关注。

《抉原》还收入了《真的直寻：曹雪芹文心抉隐》、《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初探》和《二十世纪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篇文章，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邓国光先生研治古代文论，从文体论本身的发展出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着重于文化与文学、文论之关系，尤其是中国古代经学与文论的内在联系的考察。文化视角之宏阔独特使其文论研究受益非浅，《周礼》六辞初探》中对掌握六辞的“祝”之辨析即为一例。^②而在具体的论述中，间涉考证，亦颇出新意，如对六辞中“会”的考释，不取郑玄成说而从王引之《经义述闻》得到启发，印证先秦典籍和古代方言，证明“会”是古“话”字之假借，在六辞中是“告戒”之辞；并由此合理地解释了《文心雕龙·檄移》“三驱弛网，九伐先话”的微妙含义。邓国光先生治学，“由传统目录学把握门径，以历史复原为目标，有计划和有步骤地深入各个时代的文论领域，先完成个别的研究，然后综贯全脉，以完成一部以文体为本位的《中国文论史》”（《二十世纪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这部论文集集中的各篇论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说是“个别的研究”的聚合，宋代部分尚付诸阙如，乃是文论史写作的前期工作。这与一部“综贯全脉”、真正具有严密系统的中国文论史还是不同的，我们期待着邓国光先生完整的《中国文论史》早日问世。●

①邓国光《抉原》，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12月版。笔者此文得到吴承学先生指点，在此表示谢忱。

②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国光先生的专著：《中国文化原点新探——以〈三礼〉的祝为中心的研究》。

责任编辑：陶原珂